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张爱萍复职定「三抓」

从胡适说到周作人

冤案不平拒不出狱的陆定一

杨成武眼中的「杨余傅事件」

陈永贵禹作敏个人专权的悲剧

2第6期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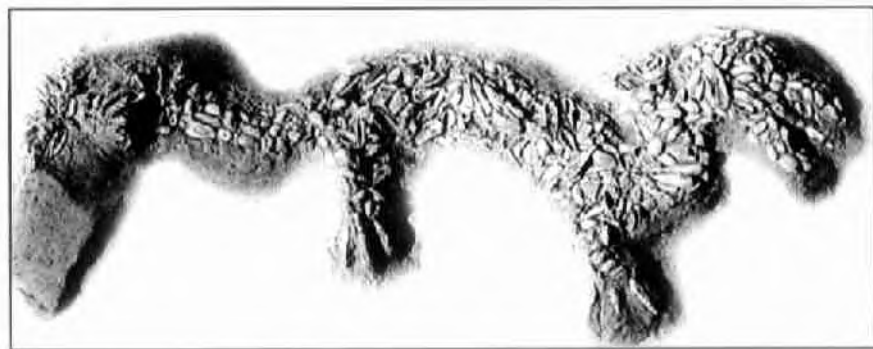
总第99期

「龙文化与现代文明」学术讨论会 在河南濮阳举行



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太平洋学会、中国侨联、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濮阳市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龙文化与现代文明”学术讨论会，于4月12日至14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名学者，就龙、龙文化及濮阳出土的至今6500年蚌壳摆塑龙的历史价值等，展开了热烈讨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发表了一些很好的意见。

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濮阳西水坡考古时发现，西水坡是一处内涵丰富的早期仰韶文化遗址。在此处的仰韶文化第四层下发现了三组用蚌壳摆塑的龙虎等动物图案。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测定，蚌塑龙的年代距今 6460 ± 135 年。由于蚌塑龙为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形象最逼真、龙文化内涵最丰富的龙形象，考古专家们称之为“中华第一龙”。



上图：学术讨论会
开幕式

左图：出土蚌壳摆
塑龙之一

炎黄春秋

春 秋 笔

- 2 张爱萍复职定“三抓” 东方鹤
6 杨成武眼中的“杨余傅事件” 陈 虹

求 实 篇

- 14 从胡适说到周作人 吴 江
18 “文革”中胡风不肯揭发周扬 晓 风
21 徐平羽在上海外事口不划右派 沈德汉
22 “红色资本家”到底是谁说的? 方 凌

殒 星 篇

- 26 冤案不平拒不出狱的陆定一 陈清泉 宋广渭
32 李竹如与白色恐怖下的《文化报》 李维民

人 海 浪

- 36 费孝通和他的三位兄长 余广彤
41 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其人其事 汪东林
46 清末民初的“五路财神”梁士诒 于庆祥

文 荟 苑

- 50 梁启超与京师图书馆 朱天策
55 难忘越剧大师尹桂芳 姚锡佩

沉 思 录

- 62 陈永贵禹作敏个人专权的悲剧 范银怀

遗 闻 录

- 67 国民党南运故宫国宝追记 宋伯良
70 天津市收容乞丐纪实 周利成

古 镜 台

- 73 读《中国反贪史》三叹 王春瑜
78 曹操焚书及其它 李文林

编 读 窗

- 25 营救刘尊祺出狱的是王卓然 丹 林 刘树云
80 胡均鹤与情报委员会 马 林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胡 绳
陈 沂 杜润生 **赵朴初**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其庸 曲润海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学勤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锲 张岂之
张国琦 欧远方 凌 云
曾彦修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长(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吴 思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陈 渊

理事单位:

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法律顾问:程振勇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581/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编:100007

电话:64072452 84020890

美术设计\激光照排:

北京瑞和轩盛经济信息咨询中心

紫东图文设计工作室

印刷: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

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网上书店

网址:www.dragonsource.com

gb.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价:4.80 元

张爱萍复职定“三抓”

80年代前期要完成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信卫星三项重点任务，解决远射程、大当量、广机动、高轨道的问题，使战略武器形成配套体系，航天技术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 东方鹤

动乱了十年的中国，终于趋归安定。

在监牢囚室、破房闲宅及招待所游荡、漂泊了十年的张爱萍全家，于1977年春节前夕，终于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被扫地出门的那个家。

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和熟悉。窗前的一片竹林万叶吐翠，郁郁葱葱。“快来看，快来看！这是哪来的一片竹林？”张爱萍惊呼。夫人李又兰笑答：“嗨，那不是你种的吗？红卫兵来抄家的时候，你怕被他们抄走，就把那盆看竹来了个送竹归土。”“噢，怎么长这么多呢！”这对素来喜竹、爱竹的张爱萍来说，无疑是一大意外收获。他辗转欣赏，诗兴大发，遂打起“油”来。李又兰在旁边给以补充、推敲，很快就形成了：

窗影千竿竹，傲霜十年重。
新笋破坚土，老干复葱茏。
飒飒凤尾动，翩翩日影中。
爆竹除旧岁，阵阵报春风。

此后，被抄走的东西陆续还了回来。张爱萍和李又兰，平日里就整理整理书籍，挥洒挥洒笔墨，沉静在这种以诗书为伴、竹兰为邻的幽雅生活中了。

1977年3月7日，中央决定叶剑英恢复主

持中央军委工作。9日，叶剑英便派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动员张爱萍回国防科委工作。徐立清连续三次登门诚请，均为张爱萍谢绝。叶剑英又把张爱萍请到了西山的临时住处。一见面，就开门见山：

“怎么了，反反复复地请你都不干，这么不支持我的工作！”

张爱萍说：“不是我不支持您的工作，是我没法工作。我的心脏也不太好。”

“怎么个不好法？”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连续批判，给批‘劈’了。”

“劈了”就是裂开了的意思。叶剑英笑了，为张爱萍的调侃带着心痛和辛酸笑了：“我了解你，只要你想干，什么困难都能克服。×××的问题，中央已经决定，最近就清查他，让他回地方去。中央也准备恢复小平同志的工作。拨乱反正，还是很需要把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家好好地整顿一下的，抓紧建设好，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他的后一句话又一次深深地打动了张爱萍。面对老师的一片挚情及共同的责任，怎么还能再无动于衷呢？于是，张爱萍只好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

叶剑英问：“你有什么要求吗？”张爱萍想了

想说：回科委工作，需要给我配个好政委。

叶剑英说：你挑吧，你挑谁给谁。

张爱萍在记忆的屏幕上搜寻了半天说：把李耀文调来吧。

叶帅说，这好办，马上就落实。

李耀文，原名张锡绅，自幼就伴着渤海的风浪成长。他是背诵着孙中山的遗嘱、受着国耻日的教育参加地下党工作的，19岁就加入了共产党，20岁参加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时，就担任了救国军第三军政治部教育股长。张爱萍在华东军区任参谋长时，他就是军政委了。张爱萍奉命到抗美援朝战场时，作为26军政委的李耀文，正率领部队进行金城战役。李还担任过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副政委，1955年被授为少将军衔。“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点名把他从济南军区副政委的位置调到外交部担任副部长、党组书记。当时在外交部任副部长级驻外大使，任满回国正等待分配工作。他曾要求回部队工作。

4月13日，经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批准，中央军委任命，李耀文为国防科委政治委员、国防科委党委第二书记。

接着，张爱萍就主持召开了一次党委会，研究制订了国防科委党委近期工作原则：“拨乱反正，全面整顿，加强统一，集中领导，同心协力，尽快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以及科技工业战线的十六字整顿方针：“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狠抓科研，加速更新”。之后，张爱萍表明了这样一个态度：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批过我、甚至整过我的人，除中央决定对×××审查外，既往不咎，一个不动，原来在什么领导位置现在仍然在什么位置，大家放心放手地工作；以前对我的批判、斗争，不是大家的责任，不少

的发言都是违心的；以后我们在一起，好好工作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后来，在不久召开的全委机关干部大会上，他又表示了这一态度。

尽管这样，在党委成员和司、政、后、科部门领导中，那些曾积极参与批判他、整理他《大字报汇编》、《右倾翻案言论》及提供“炮弹”的同志仍然还有顾虑；在委领导中，有几位甚至见他时总有些不好意思。

“大可不必！”张爱萍在公开场合多次说：“我以前就讲过，反对我没有关系，不算错。以后还可以继续反对嘛！这样，我不拿银子就可以买到批评。我怎么能不欢迎呢？”在做这安抚释疑工作的同时，他建议军委尽快重新宣布命令，以释疑虑，安定军心。在不久重新宣布的命令中，除政治委员易为李耀文外，原班人马一个未动，各居原位。

“复工”伊始，张爱萍又拿起了他一贯的“法宝”：摸准情况，突出重点，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以主战场带动分战场。征得常委们同意后，他把首先摸清情况的点放到了二机部和七机部上，然后再统一规划下一步的工作。

因为这两个部都担负着重点尖端武器的研制任务，这两个部运作得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个



张爱萍(右)与朱光亚(左)在会上谈国防建设

国防科技工业的进展。

七机部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灾单位,“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它雪上加霜。造反派头头舒某,死灰复燃,在“四人帮”的直接支持和指使下,一边对张爱萍大打出手,一边对拥护张爱萍搞整顿的干部群众大下毒手,以莫须有的罪名先后迫害七机部干部、专家、职工 16000 多人,其中 303 人被非法关押,两人被迫害致死。刚进入正轨的科研、生产,又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粉碎“四人帮”后,舒某负隅顽抗,密谋上山打游击,后被收审。1977 年 3 月 7 日,中央派出了由地方、军队干部组成的 600 多人的中央工作队,进驻七机部,进行二次整顿。

“反击右倾翻案风”致使原来确定的项目未能正常进行,有的还遭到了破坏。如研制通信卫星的三三一工程,仍停留在原来的决定上。但有的人却把它捅到国际无线电联盟进行登记,并大言不惭地宣称五年内发射成功。如果不能如期发射,必然影响国家的形象。张爱萍初步决定科委近年的工作规划就在原来确定的项目上进行调整,然后召集常委们进行研究、讨论。有的同志提出,张爱萍在整顿七机部时曾提出“一个目标”、“三年三步”的计划,已经被“风”吹到一边去了。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个规划。这正与张爱萍的设想不谋而合。一经酝酿,很快统一了意见。当即决定:80 年代前期要完成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信卫星三项重点任务。完成这三项重点任务,实质是解决远射程、大当量、广机动、高轨道的问题,使战略武器形成配套体系,航天技术再上一个新的台阶。这个奋斗目标一旦实现,必然大大增强国防力量,进一步打破霸权主义的核垄断,并能带动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鼓舞中华民族的斗志和勇气。

会上,张爱萍再三强调:对这三大任务要抓住不放,抓住时机,抓紧时间,一抓到底!马捷兴奋地一拍大腿说:“干脆把这三大任务叫‘三抓’吧!”大家一致赞同。自此,“三抓”带着一种使命感、责任感和神圣感,很快流传开来。后来有人说这是国防高科技的“三大战役”。

如何打好这“三大战役”呢?本着“缩短战

线、突出重点、狠抓科研、加速更新”的既定方针,张爱萍又率领他的一班人及有关专家进行了整体规划。一是确保重点,适当停缓。对不具备条件的工程,坚决停止或缓建。二是抓住重点,带动一般。三是重中有急,梯次进行。一个时期只能突出一个重点,从时间和力量的安排上,有先有后,有多有少,梯次渐进。四是坚持高、严标准,为自己施加压力。

有了这整体的规划和布局后,很快就上报中央专门委员会。

这时的中专委已经作了调整。华国锋为主任,叶剑英、李先念为副主任。成员由中央军委常委和国务院主管计划、建设和国防工业的副总理,总参谋部一位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国防工办的主任等 21 人组成。办公室仍设在国防科委,由国防科委主任兼任中央专委办公室主任,由国防科委一名分管业务的副主任和二、七机部的部长兼办公室副主任。8 月 6 日,中共中央决定,增补邓小平为中央专门委员会副主任。不久,中央专委就下发了个文件,文件称:“12 月 24 日中央专委批准,张爱萍兼中央专委办公室主任,李耀文、刘伟、宋任穷、马捷兼副主任。由国防科委科技部承办日常工作。”

七机部部长,张爱萍推荐宋任穷担任。

1977 年 7 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

9 月 16 日,经华国锋批准,中央军委任命,恢复了张爱萍副总参谋长的职务,兼任国防科委主任。

9 月 18 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国防科委关于“三抓”的请示报告。也就是说张爱萍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立下了“军令状”:在 80 年代前期保证拿出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信卫星。

前三次的核试验实践和三颗人造卫星的发射,使张爱萍清楚地认识到:“三抓”任务,技术新,难度大,周期长,技术密集,知识密集,设备密集,组织协调复杂,安全要求严格,是现代化合成兵团的科学会战,是规模宏大的空中、地面、水下联合立体战。远不像他当年组织指挥的陆海空联合渡海登陆战。数以亿计的零部件组合,有一个螺丝的松动、一个焊口的开裂、一毫

衔接的错位,都会导致国家巨大财产的损失、众多人员的伤亡,直至国际政治上的严重影响。因此,他的“战役想定”考虑得全而又全、细而又细。

在这科学大会战中,科学家是当然将领,没有他们为主体的指挥和攻坚,就没有科学会战的胜利。他

断然决定:建立一个以科学家为主体的坚强指挥部,形成高度集中统一、严密精确的指挥体系。

在研制工作方面,组成了技术和行政两条指挥线,建立总设计师制度和总调度指挥制度。总设计师系统,是一个跨建制、跨部门的技术指挥系统,按任务的总体、分系统、单项设备的序列,分别任命总设计师、主任设计师和主管设计师,负责研制设计技术工作;调度指挥系统,则是由研制抓总单位、承制单位的行政领导及有关部门的管理干部,组成行政指挥系统,负责计划调度、组织指挥和财务物资保障工作。总设计师系统是由科学家组成,全力投入科研项目的攻坚;总调度指挥系统则是由行政管理干部组成,全力保障总设计师系统,而且绝不允许动摇、干涉总设计师系统的意志、计划和行动。

应该说这两条指挥线制度,是张爱萍的又一大创造。这科学管理行之有效、完整系统的规章制度,使许多科学家至今对此制度还赞不绝口并深深地怀念他。

在“三抓”任务中,这两个指挥系统在国防科委和有关国防工业部的领导下,分工负责,互相渗透,互相支持,有机地联结为集中统一的、



1984年4月,张爱萍为北京同步地球卫星接受站题写“通天地”四个大字

畅通灵敏的研制生产指挥体系。

进入试验准备实施阶段后,又在北京开设试验任务指挥部,由张爱萍统管全局,直接领导和统一指挥整个试验活动的进行。各参试单位均纳入试验组织序列,建立分层分级的岗位责任制。研制单位提

供试验产品、技术资料 and 地面设备,提出试验大纲,派出试验队进驻试验场区处理产品的技术问题,协助试验部队共同完成任务。试验部队根据试验大纲的要求,制定实施方案和各项规则,组织实施导弹、卫星的飞行试验,完成测试、发射、跟踪、测控通信、气象水文、数据处理和其他勤务保障任务。使用单位也派出人员参加试验任务,参与试验方案的论证和试验结果的综合分析工作。在试验现场组成以试验部队为主,有研制、使用单位参加的发射场指挥部,实施现场组织协调。国防科委派驻工作组进行指导。

而张爱萍本人及他领导的一班人,经常穿行在各研制单位、试验基地、训练现场。依然采取他惯用的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见‘敌’则杀、碰难就帮的原则,为“三抓”扫除障碍、创造条件、提供营养。他要求他的一班人并多次向科学家们表示:“任何时候我们都是科学家的服务员,我们是做服务保障工作的。成功了,是科学家的功劳;失败了,则是我们的责任。”

这样,真正形成了万里连营布阵,千军万马协同,空中陆上水下,争当科研尖兵,“三抓”争分夺秒,齐铸钢铁长城的壮观局面。

(责任编辑 刘家驹)

杨成武眼中的 “杨余傅事件”

□ 陈 虹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68年3月24日的“杨余傅事件”，正是那段非常历史时期，由林彪、江青一伙“为反军乱军，篡党夺权”，“捏造罪名，突然袭击”制造的政治事件。尽管11年后（197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第28号文件为此案公开平反，尽管事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但它的内幕很多人并不清楚，它的严重教训还很值得我们研究。为此笔者采访了这一事件的主要当事人杨成武将军和有关同志，请他们较详细地谈了自己所了解的那部分情况。现整理成文，留给读者，更留给历史。

“杨余傅事件”的发生离不开“文化大革命”错综复杂的矛盾及尖锐激烈的斗争。

军队的稳定因素，成为林彪江青 一伙乱军夺权的最大障碍

据杨成武所知，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首先是毛泽东主席提出了1968年春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战略设想。1967年7月13日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118号召开的中央小碰头会上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这个会上，毛主席决定到外地去，并说：“杨成武跟我去。”

当天晚上就出发了。9月，毛主席南巡即将结束，返回北京途中在武汉停留，又根据各地情况指出：“全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文化大革命’要在1968年春天结束，或者稍迟一点，接着开九大，不能再搞了。”毛泽东主席曾几次谈过，要尽快把老同志解脱出来，以便他们被选为“九大”代表或进入中央委员会。回北京后过了国庆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宣布：1968年春季结束文化大革命，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主席明确指出：专案要尽快清理，除了有问题的，很多老同志都要参加“九大”，贺龙、邓小平、乌兰夫等同志都要当中央委员。并指示：恩来负责“九大”的筹备工作。毛主席召集的会议一结束，周恩来总理为落实毛主席指示立即召集杨成武等有关人员，在怀仁堂西厅开会。主要部署怎样尽快解脱老同志的工作。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决定把原中央专案组的其中十个专案，划分出来，组成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周恩来指示由杨成武负责“二办”工作，任“二办”主任。杨成武当即表示：“军队事情多，过去又没有管过专案的事，不了解情况，又不熟悉这项工作，要我负责确有困难。”周总理说：“我的事更多，你不清楚，有别人，又不要你具体管，你督促一下就行了。整个中央专案组长是我，你帮助我工作嘛，你比我年轻好多嘛！”周总理还说：把老同志解脱出来，有问题搞清楚了是你们的业绩，没有问题搞清楚了也是你们的业绩。

10月7日，党中央将7、8、9三个月毛主席

视察大江南北时的许多指示,转发全国。指示的中心意思是强调干部95%以上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号召各地两派群众组织进行大联合,搞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等等。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当时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由于有毛主席决策,老帅们都参加了1967年八一建军节的招待会,预示着老帅们已初步走出了困境。中央军委发了“八八”通令,禁止军队院校再搞串连。9月23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合



杨成武上将

发出《紧急通知》,规定在外串连的学生和在京上访的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革命大批判和斗批改,促进本单位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这一系列的措施促使那个时候的形势好转。这与大串连时期的大动乱比较起来,确实是开始慢慢地走向稳定了。

当时各总部各军种的主要领导状况是:

总参谋部是至关重要的部门,杨成武是代总长,还有几位副总长,在当时那样大动荡、大混乱的情况下,还是比较稳定的。机关里也没有分成保杨成武或反杨成武两大派组织。林彪感到这种形势对他篡军夺权不利,于是在1967年11月决定调温玉成任副总长,并指定他接管杨成武负责了十来年的作战系统。事后看来,林彪的这一决定,是他为夺总参的领导权而进行的组织准备。

总政治部那时分成了两大派,闹得不可开交。下属各部的部长、副部长已有不少被抓了起来。袁子钦副主任去世后,连个主持丧事的负责人都没有,要不要开追悼会,无人问津。还是杨成武给毛主席、周总理、林彪写了一个报告,毛主席批了,才争取开了追悼会。

总后勤部、海军、空军的主要领导权,被林彪死党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等把持着,这一点历史已经作了结论。

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也是林彪、“四人帮”不放心的地方。卫戍区司令员是傅崇碧,北京军区代司令员是郑维山。林彪认为这两个地方的领导权,均未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对北京军区不放心,实际上是忌恨长期领导北京军区的聂荣臻元帅。他对聂老总是既恨又怕。

在林彪、“四人帮”一

伙的眼中,军队的稳定因素,成为他们“阴谋夺权”的重大障碍。为了扫除障碍,他们捏造罪名,制造这样那样的事件,便成为必然了。

打倒杨余傅的背后 有着更为险恶的目的

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三二四事件”从表面看是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实际上他们有更阴险的罪恶目的。其实打倒杨、余、傅用不着开万人大会、10万人大会;用不着全国大城市武装游行三天;用不着接二连三地接见全军干部。杨成武说,“文革”中打倒那么多高级领导干部,他和余立金、傅崇碧,都没啥了不起,林彪、“四人帮”一伙所以那样兴师动众、声势浩大、凶相毕露、声嘶力竭,其目的从宣布“杨余傅事件”大会的口号中,即可以窥见一斑。“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没有好下场”;“杨成武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坚决揪出杨成武的黑后台”。这里他们已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几位老帅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三二四事件”发生后,聂荣臻元帅于4月6日给林彪打电话质问: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指

的是谁？接电话的叶群回答说：“并没有点名嘛。”聂帅说：“不点名比点名还厉害！我愿受明枪，不愿受暗箭！”林彪为什么要揪后台呢？因为老师们特别是朱德、贺龙、陈毅和聂荣臻元帅对林彪的底细最清楚。1955年授军衔时林彪在十个元帅中尽管位居第三，但他在这些资历深、功劳大的老师面前，总有一种受压抑感，有他们在，林就不能独自“指挥一切”，便想寻找时机，贬损他们，甚至罗织罪名，予以打倒。

杨成武恢复自由回北京后，叶剑英元帅曾对杨说：“打倒你那天的会，原先主席台上放有我们坐的椅子，临开会前他们把椅子撤掉了，让我们到台下就座。由朱老总、李富春带头，徐帅、陈老总和我依次从台上休息室出来，走到大厅中间坐下。会场里坐得满满的军队干部都见到老师们下台了。”叶帅接着说，在这次会上江青、叶群、谢富治在主席台上歇斯底里叫喊“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新反扑”，嗓子都喊哑了。叶帅说：“陈老总衣袋里装着糖，分给我吃。并说，我们吃糖，不听他们的。聂老总当时因为生病没有到会。”叶帅还说：“他们这种安排实际上是向到会的人暗示，坐在台上的是左派，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动一根毫毛；坐在台下的政治局委员、老师们是可以“炮轰”的、冲击的、打倒的。这种台上台下分坐也是他们蓄意策划出来打倒人的一种招法。”

“杨余傅事件”以后，整老干部的面更宽了，调子更高了，老师们的日子更不好过了。林彪、江青一伙在全国各地发动了对老师们的公开点名批判，各种罪名都加上了。大字报贴到了叶帅的院子里，卧室的电话也被撤了，向外界打电话，必须到前院经黄永胜派去的警卫参谋批准。实际上是将他软禁了起来。1969年林彪的“一号命令”又把多数老师赶出了北京。叶帅被赶到了长沙（后又到湘潭）；徐帅被赶到开封；朱老总被赶到广州从化。杨成武出来后，聂帅同杨说：陈老总被赶到邯郸，聂总被赶到石家庄。当时已发现陈老总有病，聂总主动提出同陈老总调换一下，让陈老总去了条件较好，便于治病的石家庄。

1967年3月24日会上林彪宣布：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温玉成任副总长兼北京卫戍司令。当时黄永胜就坐在台上，实际上三月十几号他就已经秘密地来到了北京。“三二四”之后，北京军区召开大会，黄永胜、谢富治、吴法宪等人都去亲自坐镇，林彪、江青等出马讲话，大批所谓“晋察冀华北山头主义”，诬蔑北京军区是“山头主义黑窝子”，“从聂荣臻、罗瑞卿、杨成武到郑维山、傅崇碧一代接一代”，矛头直接指向了聂帅。

强加给杨成武的种种 “罪名”与事实真相

杨成武将军在谈到林彪、江青一伙为什么非要把他打倒不可的问题时，杨成武说，那时他并没有看出林彪、江青一伙是坏人，是反革命，他们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彻底暴露，暴露了一些，也没有看出来，因为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杨说，过去也执行过他们的“指示”。对有的“指示”也作过一些抵制。他们非要打倒杨不可，只是他当时在自己的位置上传达和执行了毛主席、周总理的一些指示，做了他自己应该做的事。只是因为林彪、江青一伙怀有篡党乱军的罪恶目的，才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和对立，他才成了他们的眼中钉。杨成武将军几十年后，回头看当时林彪、江青一伙所以非把杨余傅打倒不可的事例，至少有如下几点：

一、林彪说杨成武是“彭黄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

杨成武是1958年调到总参谋部的。全国解放以后杨两度在华北军区任职，到1953年改为北京军区，杨成武是第一任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司令。1954年公布杨是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防空军司令，1958年底决定调杨到总参谋部，任常务副总长、代总长，1967年3月任军事常委、副秘书长，并主管作战系统，一直到“三二四事件”。

杨到总参的时候，国防部长是彭德怀元帅，总长是黄克诚大将。杨在他们的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三二四事件”林彪、江青一伙就说杨

是“彭黄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彭黄被打倒以后，罗瑞卿当总长，杨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在总参工作六、七年之久，1965年冬上海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罗瑞卿后，在北京总参党委扩大会上杨讲到罗瑞卿同志时掉了眼泪，说“可惜了”。后在北京批判罗瑞卿同志的会议上，吴法宪、温玉成等提出要开除罗的党籍时，杨又表示不同意，所以林彪、江青一伙在说到杨成武是“彭黄反党集团漏网分子”的同时，又称杨是“地地道道的罗瑞卿分子”。

二、林彪说：“杨成武封锁我！”

“三二四事件”后，聂帅曾当面问林彪：“杨成武是什么问题？”林彪说：“杨成武封锁我，从来不到我这里，他跟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三个月不向我汇报。”

根据杨成武回忆，事实是这样的：

杨成武随毛主席外出期间，做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联络员，经常往返北京、南方之间。毛主席做过多次重要指示。1967年7月下旬，毛主席要杨准备回京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杨成武如实向毛主席报告说：现在有人不赞成“八一”为建军节，造反派还要把军事博物馆的军徽砸掉。毛主席不解地问：“为什么？”杨回答说：他们提出要把9月9日，也就是秋收起义那一天作为建军节。

毛主席听后，很生气地说：“这是错误的。”“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八一’建军节是1933年中央苏维埃政府做过决定的。……这种事不能变。”并心情激动地叫杨记下他的话：“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打响的第一枪。”又指示说：“今年建军节招待会要搞好，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师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词。”并反复交代说：“今年是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老师们都要参

加，一定要向总理报告。”

杨成武又将在北京街头见到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说：“北京现在比较乱，老师们已受到了冲击。天天有人要揪斗陈老总，叶帅；炮轰聂荣臻的大标语，大街上不断地贴，有人贴徐帅的大字报要打倒他；连朱老总也有人要揪，老师们的日子很不好过。”

毛主席听后，沉默了许久，谈了他对老师们褒奖的话。

8月24日杨成武又从上海飞回北京参加由周总理召集的会议。会后，周总理叫杨留下，对杨说：“今天单独找你谈话，主要是有几个问题由你直接去向主席请示报告。”周总理首先向杨介绍了各省的情况，之后沉默了片刻，心情沉重地说：“还有件事，现在北京很乱，工作难做。”“王力8月7日在外交学院的谈话（中心内容是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夺陈毅元帅的权）及一封信，有些揪军内一小撮的味道。”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及借口揪刘少奇围困中南海等事件。周总理说：“这样下去了怎么得了！我耽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

周总理要杨成武立即飞往上海，直接向毛主席报告，并请毛主席指示。周总理特别向杨交代：“向毛主席报告，只讲情况，请主席指

示。”这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重要问题的处理办法无权擅自提出建议，不该参加任何意见，一切由毛泽东主席独立自主地作出决定。

第二天上午杨成武乘飞机到上海，按总理指示一向毛主席报告后，主席说：“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两天后通知杨去毛主席处，毛主席指示杨成武准备好飞北京的专机后，毛主席向杨讲了他对王力讲话及对王力、关锋等人的处理意见，毛主席说：“我考虑好



余立金中将

了,我说你记: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杨一字不漏地记下毛主席的指示,复述后并将记录请毛主席过了目。毛主席说:“就这样,你回去叫总理马上办。”8月26日中午杨成武回到北京,立即到周总理办公室,周总理正焦急地等待着上海来的消息。在杨单独向周总理汇报了毛主席的决定后,周总理想了想说:“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很快落实了毛主席的指示。

杨成武跟随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那段日子,毛主席的指示明确、具体,有的指示让杨只向周总理一人汇报,有的向小碰头会和军委常委传达,杨都按毛主席要求一一照办。

今天实事求是地说,林彪那时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全党唯一的副主席,林彪若真的要杨去汇报工作,杨成武不能不去。杨对林一向是尊重的,何况还有一个上下级观念和组织性问题。但是毛主席明确指示要杨成武只向周总理一人汇报的事,如逮捕王、关、戚,在没有落实前,没有得到新的指示前,他也不可能自作主张地去向林彪汇报。

至于毛主席在谈话中涉及到评论林彪的话,杨成武更不便向林彪讲了。如一次毛主席问杨成武:“你知道不知道是谁封我四个‘官’啊?”(指“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航手”,简称“四个伟大”),杨成武知道这是林彪为清华大学的毛主席塑像落成典礼题的词,1967年5月1日见报,而且林彪书写的这些字经常在报上刊登,毛主席也未必没有见过,但听毛主席问杨的语气,含有不喜欢“四个伟大”的口气,当时杨也不便说三道四,只是含糊其词地回答说:“报纸上早就登了。”再如,毛主席同杨成武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有不死的人吗?”并指示杨说:“你回去报告周总理,不要宣传这些,要宣传马克思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犯大错误吃大亏的。”

毛主席这些批评林彪的话,杨成武当然不能去主动向林“汇报”。甚至叶群多次向杨成武探问“主席讲了什么”、“主席说过林总些什么”等情况时,杨成武也从没有向她吐露过任何东

西。这大概就是林彪所说的对他实行“封锁”吧。由此可见处在夹缝中的杨成武尽管处处小心谨慎,仍然免不了遭受冤屈、关押之害!

三、林彪、“四人帮”一伙很不满意杨成武对老师和一些老同志的态度。

在“文革”初期,对刘伯承元帅,先安排到山东治疗眼病,后又到上海治疗;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老师都保护在西山军委的房子里,派两个营守卫;贺龙元帅保护在象鼻子沟,派一个营守卫。

林彪提出“批带枪的刘邓路线”后,他叫杨不要给叶剑英元帅再送文件。杨请示周恩来总理,根据周总理指示“照送”文件给叶帅。

武汉“七二〇事件”被林彪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后,毛主席随即要杨告诉周总理将陈再道接到北京,住京西宾馆保护起来。并要杨转告陈本人,毛主席关于他的问题的三点指示: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

黄永胜的儿子把造反派引到京西宾馆,抓了宋任穷同志后,杨成武根据周总理指示派人去保护起来。

林彪、江青一伙对这些非常不满。

四、杨成武不赞成黄永胜当总政治部主任。

1967年夏天,林彪提出要黄永胜当总政治部主任,问杨成武有什么意见,杨坦率地说黄永胜从来没有做过政治工作怕不合适。

毛主席南巡时对杨说,林彪提出要黄永胜当总政治部主任,我没有同意,我人都不认识。杨说,黄在长征前当过总部特务营长,在晋察冀时,犯过乱搞女人的错误,聂帅很严肃地批评过他。

五、杨成武不同意吹捧林彪。

1967年春,吴法宪在空军首次提出“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提法,杨知道后对吴法宪、余立金说:“你们不要这样提,还是要以中央的提法为准。”后来余立金告诉杨,吴坚持他的提法,这个提法并在当年五一节正式见报;不久,空军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当时吴法宪不在京,余立金把文章送给杨看,杨只看了标题,

就对余立金说：“最好不要用‘光辉榜样’的提法提林彪，那毛主席呢？如果要这样提，最好报告毛主席、党中央批准。”余立金表示同意，并转告了吴法宪。后来听说吴又告诉了林彪。这篇文章后来刊登在1967年8月13日《解放军报》第四版上。吴法宪神气十足地说：“他杨成武不同意，文章还是发表了。”

1967年秋总参机关召开第四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闭幕口号中有“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一句，因为此前毛主席同杨讲过“什么永远健康，难道有不死的人？”的话，杨不便再呼这样的口号，引起也在主席台上的叶群不满，到了休息室，她拍拍胸，瞪着杨说：“杨代总长不喊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没关系，他还是健康的，林彪同志的内脏都没有病。”

六、杨成武签报王飞等人问题严重。

1968年春，空军有人写了一些检举信，揭发王飞、何汝珍、周宇驰、于新野几个人胡作非为。杨当时并不了解这些人，更不知道他们与林彪的关系，便写了一个条子，说“这些检举信反映的情况很严重，如果情况属实要严肃处理”，报林彪批示。对此，林彪说杨成武要将这些人打成反革命。成为杨一大罪状。历史事实证明，这些人的问题确实严重，其中有的后来成了林彪阴谋集团谋害毛主席小舰队的重要成员。

七、杨成武婉转谢绝为叶群作证，激怒林彪。

1968年3月上旬的一天，林彪叫杨成武到毛家湾他家的会客室很客气地对杨说：“现在有人说叶群历史有问题、不清楚，讲叶群1936年入党是假的。上海、南京、南昌等地写的百多份材料都证明：叶群历史是清楚的，36年入党是真的。但写证明材料的都不是主要负责人。现在叶群在你领导下的军委办公厅工作，你是总参党委书记、军委办公厅党委书记，你给她

写一个证明最合适。”杨成武万万没想到作为党的副主席的林彪会直接出面干预妻子的历史问题，杨成武面对林彪这突如其来的无理要求，顿时脑子紧张，渗出一身冷汗。杨成武参加革命在中央苏区，长征到陕北后在保安红军大学学习。而叶群原在白区，直到1960年杨在协和医院养病，叶群受林彪委托去看杨，他们才第一次见面。杨成武怎么能为她写抗战以前的人党证明呢！杨成武必须坚持原则，但此刻又不能当面拒绝，便说，先将这些材料拿回去看看。

这样的结局是林彪始料不及的。善用心计的林彪由此断定杨成武是不按他的指挥棒转的，“事情没有办成，反而泄露了天机”的结果使林彪愤怒已极，因而对杨也痛恨已极，认为杨完全不可信了。林彪在“三二四”大会上宣布

杨成武所谓“罪行”时，恶狠狠地说：“从一个人身上的一滴血，就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全身。”由此看来，就是“作证”的事促使林彪下决心把杨成武搞掉。

八、江青说杨成武“三次下令武装冲击钓鱼台”。

江青说杨整了她的黑材料，还说“杨成武三次下令给傅崇碧武装冲击钓鱼台”。“四人帮”被粉碎后，这些玄乎其玄的编造，很快被当事人揭穿。

1968年3月9日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突然给杨打电话，让他到钓鱼台，说

傅崇碧冲钓鱼台。江青大发脾气说：“傅崇碧没有得到许可，冲进钓鱼台，你们军队这么干太胆大包天了，这是什么地方？你们不知道？”并说：“对于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必须进行严厉的批评。你们是老关系，你去狠狠地批评他。”

杨成武认为，傅崇碧作为卫戍司令有进出钓鱼台的资格，无可指责。有问题要批评，要



傅崇碧少将

讲,也应该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政委的事。杨成武严肃地说:“应该找谢富治同志。”江青一听暴跳如雷,说杨“狂妄”。还说:“你了不起,是个红小鬼。”周总理见此情况,设法缓解,说:“成武啊,你还是和谢富治去一下,开个会,你主持,谢讲话,他兼北京军区政委嘛。”

杨成武遵照周总理指示,先去京西宾馆,向傅崇碧了解事情原委。原来是:许广平同志给中央文革写了一封信,提出鲁迅先生的四箱手稿叫造反派抢去了。江青要傅崇碧过问此事,傅查清手稿是经戚本禹存放在中央文革保密室,当面来向江青汇报的,而江青却颠倒黑白污蔑傅是冲击钓鱼台……

至于林彪、江青一伙为什么要把杨、余、傅连在一起?据杨成武将军分析:

傅崇碧原来是抗大的,后到晋察冀,后在华北军区的六十四、六十三军工作,再以后是北京军区。选调北京卫戍区司令时,三个人中间选了他。“文革”中傅同杨一起执行了周总理、叶剑英的指示,办了许多实事。傅在北京卫戍区这样一个要害部门工作,必然受到林彪、江青等的忌恨。余立金过去是南京空军的政治委员,来自二方面军的干部,杨同他不认识。1967年,毛主席派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到西南的云、贵、川诸省处理“文革”的问题。“七二〇事件”前又把他們叫到武汉。当时,周总理、余立金和杨住在一栋楼里,吃饭也在一起,后来周总理让余立金留下,带着空军作战部长石国英,是为了毛主席乘飞机方便,安全保证也更好些。毛主席到上海,杨和余立金住在一起,毛主席同杨成武等人谈话,余大都在场。余立金当时同意杨成武在宣传上不提“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意见,也支持杨对“光辉榜样”那篇文章的观点。吴法宪问余立金毛主席南巡讲了什么时,余以“没有传达任务”回绝了吴,引起吴法宪对余立金的强烈不满。余立金是贺龙专案组的组长,因他知道毛主席讲过“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子,将来还要当中央委员”的话,所以余对审查贺老总的问题是不积极的。

大概就是基于这些事情,用居于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全党唯一的副主席林彪在“三二

四”大会上的话说,“是材料很零碎,东拼一点,西拼一点,不准确,不全,也没有很好地整理,也是信口开河”地为杨成武网织了三条“罪名”:一、搞晋察冀、华北山头主义;二、勾结余立金要打倒吴法宪夺空军的权,勾结傅崇碧要打倒谢富治夺北京市委的权;三、把王飞、何汝珍、周宇驰、于新野打成了反革命。

当然,仅凭这三条是打不倒杨成武的。他们又捏造出:杨成武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彭真的死党”;“排挤许世友、黄永胜”;“五一六的黑后台”;“曲解马克思主义”等等政治帽子,毛泽东主席又一时受了他们的蒙蔽,杨成武无法抵挡住这“文化大革命决战的第五个回合”,他没有那么大的能量。

杨成武被抓经过与 事后的彻底平反

1968年3月11日,杨成武因交感神经失调,迷走神经亢进的老病复发,在家休息。20日杨的父亲去世,至火化时杨也因病未能与遗体告别。22日晚约12时半,他服安眠药入睡不久,林彪派张云生和于运深两位秘书来说:“林副主席非常关心杨代总长的病情。”非见杨不可。虽经杨的秘书再三婉谢,二人还是硬进了杨的卧室。看见杨确实躺在那里才离去。

一个多小时后,23日凌晨,几辆小车开进了杨的院子,把房子包围了起来。走进屋的是李作鹏、邱会作、王新亭等人。邱会作先向四周看看,然后假惺惺地对杨说:“杨代总长,现在请你开会去!”杨成武此时已经完全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挣扎地坐起来,因已躺了十几天,衣服一时都找不到,只好穿了件警卫员的棉大衣。杨成武想打电话,电话线已被全部切断了。顿时,杨成武怒火中烧,边走边大声斥责说:“你们少来这一套,你们要有党性;没有党性也要有人性嘛!邱会作,你也要有点良心啊!”走到楼下,杨成武发现他的母亲、妻子、孩子、秘书、警卫员、炊事员统统都被抓起来,关在客厅里。杨成武要去看他们,邱会作不让看。杨不顾一切推了警卫团副团长一把,猛地把客

厅门打开。当时，他母亲、孩子都在哭，母亲说：“我的儿子不会是反革命，他从小跟毛主席干革命，他有什么罪？”

杨成武安慰母亲几句，便被推进李作鹏的吉姆车内，李、邱坐在两边。到了人民大会堂，把他关在新疆厅边上的一间屋子里。当天晚上开会，由林彪宣布杨的“罪状”，并当即命令黄永胜当参谋总长。温玉成接着发言揭发杨包庇罗瑞卿；康生说杨、余、傅有后台；江青说杨整了她的黑材料。面对这些责难，杨成武要求说几句话。江青站起来蛮横地下令：“不要说了，散了。”杨看着周总理，问：“怎么办？”总理向大家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主席来电话说不要揪斗杨成武，杨成武有病，要他去休息，有错误可以检查。”

会后，他们用飞机把杨成武送到武汉山坡机场，一个人被关在山沟里头。两个多月后又用飞机把杨送到郑州，后又转到洛阳，转到开封，转到山西侯马。杨和孩子前前后后写了几十封信。第一封信是5月份写给毛主席的，杨要求与毛主席面谈，如果主席没有时间可派可靠的人来谈。信的最后一句是引用中国的成语：“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杨成武所有上送的信，都石沉大海。

杨成武自1968年3月23日凌晨被抓到1974年5月22日回到北京恢复自由，前后被关押了七个年头。一，始终没有一个人来找他面谈，查问他的问题，也没有人出提纲要他写材料；二，全家被关押，老母亲、妻子、孩子、妹妹、侄子无一幸免；三，全家有母亲、大女儿和内弟三人先后被迫害致死；四，牵连广，不仅总参系统，还包括原华北军区（北京军区）的部队多有牵连。这些，就是杨成武被打倒所具有的特色。

1974年7月31日下午，国防部为庆祝“八一”建军节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通知杨成武出席。在宴会前，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洪文、邓小平、叶剑英、张春桥集体接见他。宣布“杨余傅”一案彻底平反。宴会后，周恩来总理要杨留下，说：“我有话同你讲。”杨随周总理来到北京厅，总理单独同杨说：“‘杨余傅事件’我也说了错话，办了错事，我向你作检讨。”周总理要杨

记住：“把一切仇恨集中到林彪的头上，一切幸福来自于毛泽东主席。”周总理真诚地同杨讲：“成武，还要告诉你一个不幸的事，本来我不想说的，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告诉你，你的大女儿杨毅被他们整死了……杨毅的事原先我知道一点消息，她正在写揭发林彪、吴法宪罪行材料，纲目已列出了四十多条，文字尚未完成就被害了……当时正值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忙于接待，我没有来得及及时处理，结果出了事。后来我作了批示：一不许火化；二要化妆；三要用木棺埋葬，并做好标记。待你们出来后处理这件事。将来叶剑英和空军党委就有权处理这件事。我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周总理讲完这些，又意味深长地对杨成武说：“你回来是不容易的啊。是毛主席救了你，如果没有毛主席救你，你可能不在人世了。他们（指林彪、江青集团）由康生、陈伯达署名写了一个报告，要组织一个秘密的、小型的军事法庭把杨成武处决，把杨成武的妻子赵志珍秘密押到北京审判。这个报告毛主席和我没有理它，一直压在那里。如果没有毛主席，今天可能没有你了。”周总理还告诉杨：“你的问题毛主席早就在中央的一次会上说过，这是林彪搞的，我（指毛主席）偏听偏信，听了一面之词，一个人一辈子有几次偏听偏信，就要犯大错误。杨成武一案要彻底平反。”周总理说毛主席这最后一句作自我批评的话，用英文、中文重复了三遍。

杨成武听完周总理这一番感情深沉而又真挚的话，不仅深刻理解总理为什么要自己记住“两个一切”的意义，也使他完全理解总理当时的处境。所以对历史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要实事求是，离开了当时的背景是不行的。在那种复杂的条件下，谁也不敢说谁一贯正确。问题在于是不是搞阴谋，搞阴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今天回顾起这一事件，冷静地想想，这种仅凭个人意志，信口开河，罗织罪名，愚弄群众的做法，实在是太荒谬。它的后果使党的威望、团结、凝聚力等等遭到严重损害，代价是很沉重的。

（责任编辑 洛松）

从胡适说到

周作人

□ 吴江

周作人和胡适不能相提并论。两人虽同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名人，但两人的地位、作用、声望悬殊，经历差别更大，主要是，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周作人叛国附敌，为虎作伥，而胡适则无论如何乃抗日阵营中人。两人对民族国家有忠奸之分，有爱国卖国之分，为人有正邪之分，岂能同日而语！我提起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我写了论胡适的文章（载《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之后，有友人向我提起，从80年代起就有一阵“周作人”热，有人属文说周作人虽有附敌之举，但他的一生主要也是一个文学家、思想家，因此应该和胡适一样，主要以文学的思想的标准去衡量他，不应“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对他七折八扣”，要有“宽容精神”云云。并说，这是舒芜先生在他写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这篇文章登在1995年第12期《读书》杂志上。对舒芜先生，我只闻其大名，却素不相识。舒芜先生当然可以谈他自己对周作人的看法。很抱歉，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有必要在这里再商榷一下。好像已经有人写过表示不同意见的文章。我准备先把问题谈开一点。

首先想起一件事。这几年很有些人为了抗日时期当过汉奸的人说话，甚至包括汪精卫等人在内。我所认识的

香港一位颇有名气的专栏作家张文达先生，1996年6月11日在《信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说到：“这几年来，从台湾刮起一阵风，说什么‘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忠奸之分’，大写文章，其目的只有一个——为汉奸翻案。”1999年3月10日张又在同一张报纸上撰文举出实例，说：“何弼先生转述汪精卫对亲信陈公博、林柏生、何炳贤（何弼先生的父亲）讲的话：如果再没有人出来拯救沦陷区的老百姓，同胞将活得更惨，死得更多，他要跳进这个火坑去救中国人，他明知这样做，在历史上必定会遗臭万年，但他已决定跳进这个火坑。何弼先生又转述他父亲为何要跟汪精卫跳火坑：‘汪先生是他的朋友和上司，对上司忠贞，为朋友担当，义之所在，视死不畏’。”

文达先生接着有一段以下的议论：“汪精卫‘跳火坑’的第一椿事，是和日本签订了一个十足的卖国密约。这一密约全文本当时就由高宗武、陶希圣从上海带到香港，在报纸上发表了。何弼先生何不去查阅一下，看看汪精卫汉奸政权是如何‘救国救民’的。……何弼先生以‘纪念父亲’为名，根本否定汪精卫汉奸政权的性质，这是连胡兰成都做不出来的命题。和汪精卫同时代的法国贝当、赖伐尔组成卖国政权，战后被



任北大校长时的胡适

判死刑,他们的后人倒没有出来为之翻案。”(吴按:欧洲著名的卖国贼除法国的贝当、赖伐尔外,还有挪威的吉斯林少校、奥地利的被人们称之为第一号吉斯林的赛斯——英夸特等人。威廉·夏伊勒在他的名作——《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一书中写道:“这个人(吉斯林)的名字很快就在各种语文中成为卖国贼的同义词。”)

我提这件事,自然不是说舒芜先生也想翻周作人汉奸的案,我相信舒芜先生并无此意,他只是把周作人当汉奸、丧失民族大义这件事看轻了、或者说冲淡了。他主张对周作人应主要从文学家方面去衡量他,这也并非舒芜先生一家之言,另有人也认为周作人之附敌是出于对中日两国文化之认同,并公然标榜周之附敌也有“文化选择”因素在内。我想舒芜先生也未必会附和此说而曲为之辩吧!我这里主要是想提请大家注意,从台湾刮起了一阵所谓“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忠奸之分”(也就是说,中国人从来不讲民族大义),倒很值得我们注意,这股风究竟为何会从台湾刮起,以今日之情势想想这个问题,并非没有现实意义。

大凡叛国投敌者都可以冠上卖国贼的名字,但具体的人也须作具体的分析。就说周作人吧,周作人的罪孽自然不能与汪精卫和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等人相比,但在“文人”投敌者当中,周作人却又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且正因为周作人原是中国一位文化名人,所以他“叛国助敌”所起的恶劣作用又非一般投敌的文人所可比拟。试看周作人投敌后在日本皇军麾下和汪精卫卖国政权中的地位 and 某些行状吧。这里,我且抄录楚庄先生在《民主》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周作人与〈四室同堂〉》)中所提供的有关周作人在这方面的资料:

“1940年12月29日,汪伪‘中央政治会议’‘特任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及宪政实施委员会常务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是王克敏,‘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长是汪精卫,同列‘常务委员’的有‘五院’院长陈公博、王揖唐、梁鸿志等原是军阀余孽、党棍政客的南北大汉奸。至此,周作人在敌人的

卵翼下正式沐猴而冠,成为傀儡政权的群奸中具有名流学者、名作家声望的身份最高者。周作人对伪政权的点缀、粉饰也即帮闲、帮忙甚至帮凶作用,是张资平、穆时英之流的附逆文人所不能比拟的,因而周作人卖身也得到了最高的身价(‘特任官’)。以后,在敌寇挥舞屠刀,一次次进行武装‘扫荡’(华北叫‘强化治安’、江浙叫‘清乡’)加强文化统制声中,周作人又被封为‘促进国民觉悟,自动担负大东亚战争的责任,实现东亚共存共荣’的‘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长为汪精卫,同列常务委员的有王揖唐、周佛海等),此外还有北京图书馆馆长,日本情报机关所属的‘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理事长是日军中将森冈皋),‘中国文化振兴会’名誉顾问(顾问是桥川时雄等),华北‘新民青少年中央统监部’副统监,‘华北作家协会’评议主席,以后又经汪伪‘国防会议’通过,选任‘国民政府’委员(特任一级待遇),为了多拿兼薪,又兼华北咨询会议委员。身兼伪职多、地位高、任职时间长,在华北群奸中是名列前茅的。”

接下去还有这么一段:

“滞留在沦陷区而继续执教、治学、著书,或是为生活而谋个一般的职业,这和卖身投靠当汉奸完全不同。甚至一些学者文人被迫在伪组织什么文教团体中挂上虚名,也不应苛责。但周作人和以上两种情况都不同。周作人不仅在汉奸政权中任高官,而且是积极为敌伪‘督办’、‘促进’、‘统监’的。在敌伪的‘治安强化运动’(苏浙地区名为‘清乡’)中,周作人于1941年7月在伪中央电台播讲《治安强化与教育之关系》,1941年11月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去苏北视察,1942年4月第四次‘治运’期间到保定、定县视察,1943年11月第五次‘治运’期间又去河北井陉、河南彰德一带视察。1941年春就任‘督办’后就去访问日本,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参拜‘靖国神社’。1942年5月,随汪精卫访问伪‘满洲国’,庆祝伪满成立十周年,并参加日本炮制的‘东亚教育大会’。1942年12月9日,配合‘新国民运动’,周作人穿日式军装、戴日军战斗帽在东单练兵场和天安门参加主持、

检阅青少年训练结成式’（冈村宁次等日酋参加）。1943年4月又去南京、苏州等地……。这期间还要找门路、拉关系、谋官职、争高薪，真可谓宵衣旰食，勤于王事！”

楚庄先生还特别提到在当时敌人入侵、国土被强占、同胞被屠杀的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久居华北的一大批在政治上、学术上具有不同观点不同派别的学者、教授、作家（如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闻一多、朱自清、杨石先、顾颉刚、丁西林、钱穆、马约翰、冯友兰、张季鸾等）都脱离敌人控制，纷纷南下到大后方从事本职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就是滞留在沦陷区的多数学者文人也坚决抵制敌伪的威胁利诱，如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拒绝担任“东亚文化协会”会长（此职后来由周作人担任）及其他一切伪职，坚持辅仁大学不向敌伪注册，不挂日本旗，不受敌伪津贴；邓之诚等粗衣粝食，不和敌伪发生任何关系；又如齐白石闭门谢客、梅兰芳蓄须明志等等，都是在极为艰险的条件下坚持了民族气节。

拿周作人同上述那些坚持民族气节的人们相比较，其忠奸之分、正邪之分是很显然的。谁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忠奸之分”呢？

为了让人们看到历史的真实，我们还可以抄录国民党南京政府最高法院当年对周作人案的处理判决情况。这段历史目前已鲜为人知，原载1946年11月17日南京《新民报》第三版，1999年4月24日始由上海《文汇报》再度披露出来，这也算是保存了一条重要的文学史资料。原报道如下：

“本报讯：文化汉奸‘知堂老人’周作人，昨晨在高院宣判，庭长葛之覃，推事葛召棠、申屠宸，检察官王文俊升堂宣读主文：‘周作人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权十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葛庭长宣读判决书时并称：‘按该被告在各大学执教历有年资，我国人受其薰陶者，不知凡几，被告又具相当学识，过去著作不少（即在战时所著中国思想问题一书以忠恕为我国固有中心思想亦颇有见地），我国人对其景慕者，又不知凡几。被告居领导群众之地位，负最高政

府教育之重责，应如何抱大无畏之精神坚持到底，保名全节，以扶民族之正气，乃意志薄弱，一经遇刺即中途变节，投伪附逆，腆颜事敌，只图个人偷生苟安，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不能不负刑事上之责任。综合各种情况，自应减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褫夺公权十年，以维法纪，而昭公允。’（新民报编者按：周作人今年已65岁）”

但是还有下文。法院第一一审判决后，又有前辅仁大学文学学院院士沈兼士等人出来为周作人说话，他们联合起来上诉最高法院要求为周作人减刑。法院最后的判决是：认定周作人应负汉奸罪自无疑义，认为周作人在伪职内聘用日本教授，改编中国教科书，推行奴化教育等方面均有充分表现，有言论、有行动可证明；但念其所担任之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并曾营救过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故将原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改为十年。（按：此判决后，周作人于1949年1月获保释）

南京政府最高法院庭长在宣读判决书时，当众指称周作人在战时所写中国思想问题一书以忠恕为中国固有中心思想为“颇有见地”，这个“忠恕”当时究竟为谁立言，不问可知（至于庭长先生之意则不便推测），而其整个量刑判决的“宽容精神”则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知道，国民党当时对于汉奸特别是和自己有特殊关系的汉奸（甚至对于日本大战犯）的处理，一般采取从宽发落方针，对周作人亦不例外。但即令如此，宣判词对于周作人的“汉奸罪”即卖国罪是确认无疑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作人认罪的态度应当说是较好的。他对于自毁名节未尝曲为之辩，认为自己罪有应得。后来新中国政府在他服刑期满后也允许他搞翻译、写文章，并允许他出集子，有人为他作传也不加干涉。除此以外，当然对他不可能有什么“礼遇”。

周作人出狱后与各方面的关系一直有种种传说，尤其是对周作人与胡适的关系。但所传多不足信。读者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查阅1997年3月13日《文汇报》上《关于周作人二三事》一文（倪墨炎作），文中说：当时有传闻说“胡适们”保释周作人出狱，文章举出事实证明此说不确，事

实是,确实有人劝胡适出来替周作人说话,但胡适一概置之不理。胡适不做何炳贤,不为已沦为汉奸的朋友“担当”。这正是“义之所在”为民族正气而置朋友旧谊于不顾。舒芜先生发表文章是较后的事了,不过是发一点议论,主要是拿周作人和胡适相比较,说周作人有叛国附敌的历史,胡适在政治上也有附蒋反共并支持蒋介石“勘乱”的不光彩的历史。不错,这说的都是事实。但问题是,舒芜先生将周作人的叛国附敌和胡适的附蒋反共两事并举,“各打五十大板”,显然甚为失当,因两者性质实有大差异,前已说过:一为卖国贼和民族叛徒,一毕竟是中国人内部不同思想不同政见不同党派间的内争。舒芜先生未加深思将周作人与胡适两人的事相混淆,显然是一大败笔。而且,即使在文化学术成就方面,胡周两人也不能并论。胡适乃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一代宗师、名动历史的文化巨匠;周作人虽也是“五四”时期一位文化名人,参加过文学研究会工作,他的关于“人的文学”的见解,他的散文艺术、文艺评论观、翻译理论等都可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但他最后自毁“民族气节”(这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则已将自己从原来与鲁迅、胡适、章太炎、刘半农等文学研究会同人相同列的地位排除出去了。再者,就周作人本人而言,虽说不能将政治问题与文化上的成就完全等同,但两者毕竟是有牵连有影响的,



周作人

这种例子在中国历史上所在多有。这里且不说中国历史上许多有文才的人因做了背叛民族大义的事最终落个终身骂名,君独不见明末清初的钱谦益这位大诗人的遭遇吗?钱不过做了几天清朝

官,不久即辞退,而周作人的罪孽显然要比钱谦益深重得多。况且钱的失节在今天来看还只属于中华民族内部、一个国家内部前朝和后朝的事,不过其中夹杂着民族矛盾,而周作人则是为外国侵略者充当内奸、当卖国贼,这两者是有重大区别的。这样说,大概不算是“七折八扣”吧?现在若有人意欲为周作人争“世纪文学大师”或“世界文化伟人”地位,我看未免过于失当,因为这既非历史之真实,亦非周作人的人格道德所能承担(周的汉奸行为显然是丧失人格、国格之举),对此,人民和历史自然是不会同意的,如果勉强做去,反而会使中国文学史蒙受耻辱。

文章写到这里该结束了,但既然提到胡适,我还想趁此再添一笔。谁都知道胡适自始至终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并一直附蒋反共,认共产党为自己的政敌。但胡虽持反共成见并赞成“戡乱”,但不写污蔑谩骂共产党的文章,也不造谣攻击共产党,这也是事实。在周作人问题上,胡适不像台湾中研院某院士那样故意生造出所谓周作人投敌乃是“中共地下党奉命促成的”这类谣言来污蔑共产党。胡适虽反共,但他尚不屑于干这类“小人”卑劣勾当。

最后,我还得说明一下,我这篇文章并非专对舒芜先生而发,只是因为最近有人向我提起舒芜先生的文章,我才说了上面这些话,我的话如有什么不当,舒芜先生可以批评。但我更由此想起另一件事,那大概是去年吧,香港的报纸还有内地的文摘报都报道某一位文学家说过一句惊人的话,他说依他看来,以今日中国人的状况,如果再有外敌入侵,当汉奸的人可能会比抗日期间多得多。我不知道此话是否属实,当时也弄不清这话究竟何所指。今天回头再想一想,憬然有所悟,心想:这位文学家如果真说了那样一句话,以今日的实情观之(如有人大唱“中国人自古以来无忠奸之分”,有人不顾历史真实任意为汉奸卖国贼写翻案文章,有人将“经济全球化”现象视为“世界大同”即将到来,而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有关民族大义的教育则做得很不充分很不得力),那倒真是颇有一点过人的见识的。

(责任编辑 洛松)

“文革”中 胡风不肯揭发周扬

□ 晓 风

1967年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这是姚文元继《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评“三家村”》之后,他的第三篇由向文艺界发难开始,进而全面开花指



1966年2月胡风被“监外执行”时在寓所前

导当时“文化大革命”进程的“巨制宏文”。

面对这篇大有来头的文章,正在四川省公安厅下属的一个劳改茶场服刑的胡风陷入了沉思。

1955年5月,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开始,胡风夫妇及与他有关系的一些朋友便陆续被拘捕。直到10年后的1965年底,胡风方被半公开地判处14年徒刑,不久又被批准为监外执行,由公安部门送往成都市内一小院看管,以服满自1955年5月起的其余刑期。妻子梅志则在被关押了70个月后恢复了自由,说是“免于起诉”,此时仍戴着“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帽子。她自愿陪同前往以照顾胡风的生活。到了1966年9月,成都的“文化大革命”形势日益激烈,公安部门又将胡风夫妇送到了地处深山的苗溪劳改茶场,住在山上一所孤零零的小屋里。由于情绪不好和生活秩序被打乱,胡风身心交瘁,到此后不久,便病了一大场。多亏妻子的悉心照料,方转危为安,得以康复。当时主要是休养,另外当然还得要有看报学习、思想汇报等。

姚文元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看守所的×所长就拿着报纸来找胡风了。

×所长开门见山地问他:“你读过姚文元同志这篇文章了吧。说说感想嘛。”

胡风沉吟了半天才回答:“读过,没什么感想。我只知道,许多是不合事实的,但我不便

说。”

“没关系，说说你的看法嘛。你应该重视这篇文章啊，姚文元可是代表党中央的。”

胡风一听简直快要压不住火了，他抬高了声音：

“我不认为他这看法是代表中央的。因为这种说法不公正，不符合党的实事求是精神。他怎么去评周扬我不管，但他硬将周扬和我拉在一起，什么‘一丘之貉’，这种说法我不能接受……反周扬是我的罪名之一。他文章所引的‘断句’，说周扬早就在运用我的文艺观点，那与我无关……”

这位所长还算有涵养，并没有发火，仍在客客气气地慢慢劝说他：

“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通过姚文元的文章，你对你自己的文艺观点也应该有了新的看法吧，也应该有所进步吧！”

“不，我理解不了，我又不会趁风转舵赶时髦。我还是那句老话，我愿意老老实实地服刑，绝不再谈文艺问题。除非中央命令我说明我的文艺理论观点，绝对不写一个字，不说一句话。”

他的话已经说绝了。所长碰了这么一个钉子，只好拿着报纸离去了。

所长走后，胡风气仍未消，转身对妻子说：

“你看怎么办，步步紧逼呀！在成都就一再要我表态，我没能如他们的愿，今天又用姚文元来进攻了。再判我14年，我也不会向姚文元这类拉虎皮做大旗的人低头投降的……”

在周扬的问题上，胡风这已是第二次拒绝与当局合作了。

第一次是在数月前的1966年7月，胡风还在成都的小院里，当时，报上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艺黑帮”的文章，否定周扬

们这17年间的全盘工作，指责他们“反对”《讲话》，是执行了一条“文艺黑线”。

众所周知，自20年代起，周扬和胡风在各方面就有着不小的矛盾，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到定为“小集团”、“反党集团”以至“反革命集团”，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他们间的矛盾有关。现在，周扬被揭了出来，“四人帮”自然想从胡风口中得到周扬的一些材料，作为攻打“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炮弹，他们也相信胡风一定会这样做的。

于是，省公安厅的负责同志特地来找他谈话，一见面就很严肃地问胡风：

“最近重新发表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对周扬他们的揭发、批判文章，这些你当然都看过了。有什么感想呀？”

胡风沉默着没有回答。他又接着说：

“这可是对你的一次考验。你对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怎么理解的，你可以说说嘛。还有，你和周扬他们从30年代起就在一起共事，对他们的问题，你可以揭发，甚至可以控诉。这可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你应该表现得才好才行呀！”

胡风很明白，这番话的潜台词就是鼓励他趁此机会“立功受奖”，如果能按他们的需要揭发周扬的“罪行”，那就是表现得很好，可以极大地改善自己的处境，甚至可以减刑。



1949年9月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几位作家合影（前排左起：艾青、胡风；后排左起：巴金、赵树理、周扬）

面对这难得的机会,胡风的答复却是:

“我是判了刑的犯人,早已没有了谈文艺问题的资格。”

“不过,这次运动将触及每个人的灵魂,你怎么能无动于衷呢?”

无奈,胡风只好写了一篇题为《欢呼》的思想汇报交了上去,勉强应付了过去。生活在“井”里,虽然对外界发生的事情除了从报上读到的以外,别无所知,但身为犯人的胡风处理事情自有自己的准则。他对妻子说:

“不管报上说得多么吓人,我应该有自己的看法,决不在这里为某个人说一句坏话或一句好话,问题是怎么样就说怎么样。今天,周扬虽然拎出来示众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文艺理论,尤其是整个文化界的问题,可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必须做过细的工作,展开自由、广泛的讨论,而不是像这样靠大批判能得到结论的。像这样来批判周扬,是言过其实,难以服人。”

早在30年代初,当时都是意气风发的青年理论家,胡风和周扬就因“典型”问题有过两个回合的论争。由于鲁迅对胡风的器重和信任,最后,因为那场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更是深化了彼此间的矛盾。新中国成立后,周扬成了实际上的文艺界领导人,对胡风文艺思想和文学活动的批判却逐年升级,他的文章难以发表,他和朋友们的书难以出版,直到因胡风向党中央提出“三十万言书”,对建国以来的文艺实践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终于触怒了最高领导,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受到了惩处。

但胡风绝不因此而同意大批判文章中所说的,周扬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怀有刻骨仇恨”。他一直认为,周扬的问题主要是组织作风上的宗派主义和理论上的教条主义。不管如何,都应该对事不对人,没有证据不能任意上纲上线。自己虽然被冤案所系,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决不愿周扬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四人帮”倒台后的1977年12月,胡风在狱中曾写过一篇十多万字的思想汇报《简述收获》。其中关于此事他有这样的表述:

“文化大革命起时,我就交代过,除非受到中央的直接讯问,我不愿或者也不应该说到周

扬什么。前几年交代历史情况时,也只提提事实而已。”

正如前所述,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即使在高压和诱逼下,胡风也没有按照“四人帮”的口径来揭发周扬,提供不符合事实的材料。

胡风恢复自由后,1980年9月与周扬第一次重逢。周扬对在重病中的胡风说:“你受了很多苦,现在平反了。这一切都由中央来承担。我也被关了几年啊。”当时,无论是胡风还是梅志,对周扬都没有提到过一句“文革”中的上述情况,后来也没有向他人提起过。这也是他们做人的原则。直到胡风去世后,梅志才在她的回忆录《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中首次披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史实。

(责任编辑 徐 孔)

~~~~~

九十述懷詩  
九十猶期日,新詩書萬卷,欲通神耳聾。  
不畏迅雷言美惡,敢違客親曾助新。  
軍旗鼓舞力摧謬,論海天清千年盲。  
聖教邪淫往來事,差堪啓後生。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襟初

惊悉本刊顾问、著名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同志,因病于2000年5月21日逝世,特发表赵朴老《九十述怀诗》一首,谨致悼念。

# 徐平羽在上海外事口 不划右派

□ 沈德汉

徐平羽同志去世十多年了。

30年代，徐平羽在上海从事党的文化工作，抗战中去新四军，50年代在上海任市府秘书长。1955年反胡风，在整理的胡风材料中提到白丁，见报时先注“白丁，即徐平羽同志”，不久成书出版，改为“白丁，即徐平羽”，去掉了“同志”二字。徐平羽因胡风案牵连受审查一年多，1959年以后在上海任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长，后调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文革”中受迫害致残，1989年去世。徐平羽去世后，上海文化界纷纷写文章悼念，称他平生豁达大度、有胆有识、尊重知识分子，爱护干部。

但是，这里我要写的，是徐平羽一件迄今为止不为人所知，又决不当被湮没的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这就是，1957年反右派中，徐平羽作为主管上海外事口（包括市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即后来的市外办、市外事处、市对外友协、市专家工作处四个部门）的负责人，在对外事口干部定性上报时，力排众议，坚持外事口干部中没有右派，不划右派。由于徐平羽的坚持，市委黄庆熙同志表示，“尊重徐平羽同

志的意见”，因而，上海外事口未划右派。这在“浊浪排空，惊涛裂岸”的反右派运动中，特别是在以“左”闻名全国的柯庆施领导下的上海，徐平羽这样干，需要有多大的胆识和勇气，是可以想象的。特别是他刚因胡风案被审查回来，就顶住压力，敢于这样做，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黄庆熙同志这样做，也是很不容易的。

徐平羽在上海外事口不划右派，保护了一批干部，这不仅在上海是绝无仅有的，恐怕在全国范围也是罕见的。这是大好事、这是奇迹，不应当被湮没、被遗忘。我们亲身经历过反右的

人，对反右是不会忘记的。事实上，在上海外事口，也跟其他部门一样进行了反右，给一批干部定了性，只是由于徐平羽的坚持，才未划右派。而原来属于外事口的国际旅行社上海分社，此时已划归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就划了不少右派。

当年在外事口直接参与此事全过程的龚炳孙同志（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已经去世三年了。去世前曾跟我说，要我有机会写出来，来纪念徐平羽同志的功德，不使湮没，特写如上。

（责任编辑 舒元璋）



徐平羽

# “红色资本家”

## 到底是谁说的？

□ 方 凌

最近读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一书，其中谈到刘少奇在“文革”中惨遭厄运，夫人王光美苦受株连的情况，有一大部分是记载北京红卫兵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私设公堂，对王光美进行非法审讯的经过，地点是在清华大学中央主楼，时间是1967年4月10日晨六时许。“井冈山兵团”的机关刊物《井冈山》刊登这场非法审讯的笔录，恰好成为迫害忠良的自供状和“四人帮”罪行的铁证。《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一书将此材料全文收录。

在对王光美的非法审讯中，重点问题之一，是逼她交代刘少奇“吹捧”其兄、当时任天津市工商联主委和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的王光英是“红色资本家”的经过。当时这被列为刘少奇“美化资本家”、“复辟资本主义”的大罪之一。现在，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当年非法审讯的有关笔录：

问：刘少奇宣扬“红色资本家”，说剥削好，也是主观上走社会主义道路吗？

答：刘少奇是讲了许多错话，你们指的是1950年他在天津的讲话吧，当时我也在，我知道的，有许多话是很错误的。当时天津有一种过左的情绪，不少人要消灭剥削阶级，是毛主席派他去纠偏的；他的一些话是纠偏讲的。现在大字报上的话与他讲的有出入……

问：“红色资本家”是谁提的？

答：不知道！反正不是刘少奇。他只说“进步资本家”。

那么“红色资本家”到底是谁说的呢？

“红色资本家”是毛主席说的——毛泽东说的！

当年我亲耳听周恩来总理向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元帅谈过此事，并已在“文革”中作了证明。

那是1957年春，我国刚刚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当时苏联对此是持保留态度的。因为俄国在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党对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律没收，将他们“扫地出门”。因此，中国在1956年提出“赎买政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帮助他们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并欢迎他们参政，安排他们在各级政府机构中任职，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与苏联的模式完全不同。这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不小的震动，并议论纷纷。

就在这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来中国作正式国事访问。

当周总理陪同伏罗希洛夫从广州飞往上海途中在天津停留时，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

举行午宴欢迎，天津工商界一些上层人士应邀作陪。我作为新华社记者，从始至终在现场采访了全过程。

在宴会接近尾声时，周恩来总理以手掩口，装作剔牙，向坐在另一席的王光英打手势，让他代表天津工商界人士向伏罗希洛夫主席敬酒。

当王光英端着酒杯来到伏罗希洛夫席前时，周总理对这位苏联元首说：“请允许我来介绍一下，他是王光英同志，是天津市工商联主委。他是北京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毕业后在天津开办了一个化学工厂。王光英同志很爱国，一向要求进步；解放前，曾经受过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迫害。解放后，他很积极，要求把自己的化工厂无偿地献给国家，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感到这涉及到我们的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问题，很重要；于是向主席（毛泽东）报告。主席说：‘那怎么办呢？社会主义时期也还要有红色资本家嘛，他们还可以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做工作，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作用嘛。’所以王光英同志在这次社会主义改造中很积极，起到了带头作用……”

这时，王光英举杯向伏罗希洛夫敬酒，并说：“我们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我们工商界人士最光明的出路……”当时在场的毕鸣歧、朱继圣等工商界知名人士，也都走过来一起同伏罗希洛夫碰杯。

伏罗希洛夫当时很激动。他说：“我很高兴能在兄弟的中国看到了社会主义的资本家。回国后，我一定要把这次的所见所闻告诉给我的人民……”他接着“祝中国的社会主义资本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贡献”，于是亲切地同他们挽臂，让记者们拍照。

周总理就是这样成功地做了工作，使这位苏联元首和苏共元老终于以肯定和赞赏的口吻表示了态。对此，我在发往北京新华社总部的电讯中作了详细报道；同时还发了“内参”。

周总理上述那段话，是“红色资本家”之说首次在外事场合中公开。很显然，毛主席当时所说的“红色资本家”，是在我们中国特定的历史

条件和社会情况下，广义地就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言的，并不是专门指某一个人。

然而“文革”爆发后，不知是什么人却硬把“红色资本家”之说当作整人的大帽子，强加在刘少奇的头上，并说是刘少奇对王光英的“吹捧”；无非是想利用刘少奇和王光英的亲戚关系来加重他“美化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我也曾看过刘少奇在1950年来天津公干顺访王氏一家时的谈话记录，从头到尾都没有谈到所谓“红色资本家”问题。但刘少奇还是受到了最残酷的迫害！

在正常情况下，每一个知情人都会站出来说明真相。但在“文革”那种无法无天的特殊时期，哪有真理可言？当时我已被扣上各种可怕的帽子，打入另册，若一旦揭露真相，人家说你“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不仅是杀头的死罪，更重要的是极易给居心叵测之徒以口实，去炮打周总理；这是绝对不可轻举妄动的。何况当时稍有一点理智和分析能力的人都可以看得出，运动一开始，矛头就已对着刘少奇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但我们深信，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1969年冬，我被放逐到设在北郊区赵庄的“天津市新闻系统五七干校”劳动。有一天，来了两位穿军装的外调人员找我了解这段情况，他们没有像其他外调者那样命令我站着“老实交代”，更没有拍桌子威胁我若不老实就跟他们“去走一趟”；而是向我交代政策，要我解除顾虑；他俩在为我选读了几段关于忠诚老实和实事求是的毛主席语录之后，就等着听我的了。

刹时间，我的脑子里出现一片空白，但很快便恢复运转，希望能多少分辨出一点对方可能给我带来的吉凶；然而他们的沉着老练、不露声色，使我无法搞清他们到底是何方神圣，并感到时间紧迫已无法回避，联想到他们或许已从我的报道中发现了线索，更不知道王光英被捕后会怎样“招供”，所以只能直面人生，实事求是地将上述经过和盘托出。

他俩在听了之后，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当时周总理所说的“向主席报告”，这个“主席”是不是指刘少奇？我作了果断的否定。因为刘少奇是在毛泽东于1959年宣布自己不再担任国家主

席之后，才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主席；而且从延安时代——甚至可以上溯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之后，直到“文革”时期，“主席”一直是党内外人士对毛泽东的通称。刘少奇即使在当了国家主席之后，也从未享有过这一尊称，而只被通称为“少奇同志”。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第二个问题是，“你能保证自己的记忆不会有错吗？”我当即作了肯定的回答，并建议他们到新华社去查阅我当年所发的电讯和“内参”原稿。

打倒“四人帮”，王光英从秦城监狱获释，并给予平反、恢复名誉后，曾同我核对了当年的情况。原来他在被“造反派”拉去批斗、以及在监狱被逼供时，都坚持说不知道“红色资本家”是谁说的。但是他在记忆上确有出入，只记得听周总

理讲过此事，却忘了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那段重要情节。

1980年5月17日，中央统战部三局徐华同志通知我参加中共中央于当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那是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礼堂第一次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如此规模的隆重丧礼，人们凝视着刘少奇的遗像和他那覆盖着党旗、在打倒了“四人帮”之后才找到的骨灰盒，各有所思；整个大会堂都沉浸在庄严肃穆而又无限悲痛的气氛中。

我有幸参加这次追悼大会，同在“红色资本家”到底是谁说的这个问题上的直言，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当我面对刘少奇的遗像时，我为自己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感到心里很踏实。

## 人民币上知识多

### □ 夏 峰

人民币，几乎人人都要使用。然而，你可曾知道，人民币的票面图案上，还有很多学问呢。

**人民币上的花鸟** 1980年起发行的人民币，10元券的花鸟图案是“凤凰戏牡丹”，5元券的花鸟图案是“仙鹤青松”，2元券的花鸟图案是“绶鸟翠竹”，1元券的花鸟图案是“燕子桃花”。

**人民币上的水印** 1980年起发行的10元券上有头扎白羊肚毛巾的农民头像图案的水印。1987年起发行的100元券上有毛泽东侧面头像浮雕图案的水印；50元券上有钢铁工人头像图案的水印。

**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6个字谁写的** 中国人民银行自1948年成立以来，共发行了4套人民币。第1套纸币上“中国人民银行”6个字由当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同志题写。第2套人民币是1955年发行的，这套纸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6个字是当时人民银行总行的研究员马文蔚先生所写。以后的第3套和第4套人民币都一直沿用这一标准字体。

**人民币上的文字与头像** 人民币在票面文字设计上，除了印有全国通用的汉字外，还有4种民族文字，依次是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和壮文。此

外，1980年版人民币从1角到10元的各种面值的票面都印有民族人物头像：1角票面的是高山族和满族；2角票面的是布依族和朝鲜族；5角票面的是苗族和壮族；1元票面的是侗族和瑶族；2元票面的是彝族和蒙古族；5元票面的是回族和藏族；10元票面的是蒙古族和汉族。

**人民币上的风景名胜** 1980年起发行的人民币1元至100元券背面图案上，都有一幅特定的名胜古迹风景画：1元票面印的是万里长城；2元票背面是“南天一柱”风景画。（在距海南省三亚市20公里处“天涯海角”风景点中，有一尊独立的圆锥形石柱，上刻着“南天一柱”四个大字）；5元票背面是长江三峡中段的巫峡风景图；10元票背面是珠穆朗玛峰；50元票背面是黄河壶口瀑布风景图；100元票背面则是人们熟悉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风景图。

**人民币上的面值数** 我国现行流通使用的人民币共有12种面值，这就是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和1分。从所发行的人民币中，人们清楚地了解到没有3、4、5、6、7、8、9这些数的面值。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1—10这10个自然数里，有“重要数”和“非重要数”二种，1、2、5、10就是重要数。用这几个数就能以最少的加减，组成另一些数。如 $1+2=3$ 、 $2+2=4$ 、 $1+5=6$ 、 $2+5=7$ 、 $10-2=8$ 、 $10-1=9$ 。如将四个“重要数”中的任何一个数用“非重要数”代替，那将出现有的数要两次以上的加减才能组成的繁琐现象。

# 营救刘尊祺出狱的是王卓然

《炎黄春秋》编辑同志：

你刊1999年12月号载有《蒋介石逼杀潘东周》一文，其中说：中共北方局“遂让潘东周找到黎天才。在二人的办理下，……刘尊祺等6名共产党员得以顺利出狱。”这一说法至少有两点与事实不符，作为刘尊祺的亲属，我们愿把所知的事实披露于下。

一，潘东周、刘尊祺是同志和朋友。

他们间的交往大致是：1931年春，因叛徒出卖，顺直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时任省委宣传部长的潘东周遂由天津逃到北平，通过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的领导人赖德结识了刘尊祺。当时刘尊祺已是共产党员，在苏联塔斯社北平办事处工作。是年7月，赖德被捕叛变，出卖了刘尊祺；接着，在刘住处“蹲窝”的特务又诱捕了潘东周。几天后，刘在东北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的一次放风中与潘相遇，潘悄悄地告诉刘：有叛徒在，我无法隐瞒身分，只好有条件地自首了，但决不参与捕人、不指证他人。由于潘东周已自首，当时党组织不可能托他去营救仍在狱中的同志。

二，营救刘尊祺出狱的是张学良将军的外交秘书王卓然。

《王卓然史料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编）中收有王卓然先生于50年代中期的一份《我的简历》。其中第8段为：“1933年，先是孙宋庆龄夫人在上海组织民权保障大同盟，派杨杏佛北上调查政治犯情况，我受张学良之命，招待参观陆军监狱，于狱中得识青年刘尊祺，于3月张学良将军下野，我趁机保释刘尊祺出狱。”“文革”中，王卓然先生因受诬陷，被捕入秦城监狱，后因病保外就医。当时得悉刘被诬为“叛徒”，长期系狱，备受冤枉，立即奋笔直书，写出《刘尊祺是怎样出狱的》证明材料，长达12页。这是1975年1月10日的事，20天后他就溘然长逝了。证明材料详述了1933年3月10日（即

张学良通电下野的前夜）凌晨，王向张求情释放刘的过程。王在张首允后立即起草保文，并盖上自己主办的外交月报印刷所的印章，张在保文上批示“准保释放”后还要王“勉励这些青年，要百折不挠地做抗日救国的工作，不过要小心些”。

1979年1月2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79〕批字第11号文件批准的外文局领导小组《关于刘尊祺同志的历史和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中关于出狱一事，明确写道：“刘尊祺于1931年7月在北平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近两年。1933年5月底经王卓然等人无条件地保释出狱。”

丹林 刘树云

## 作者来信更正

编辑同志：

你刊今年第3期刊登我写的《胡耀邦最后的27个月》一文中，引用了陆游的两句诗。现核对陆游原著《剑南诗稿》，发现我的原稿有误，请予更正。

一、人生失意须为乐，

甲第朱门祇自囚。

应是：

“人生适意方为乐，

甲门朱第祇自囚。”

二、民望藏饥渴，

公行胡滞留。

应是：

“民望甚饥渴，

公行胡滞留。”

敬礼

张黎群  
5月9日

# 冤案不平 拒不出狱的陆定一

□ 陈清泉 宋广渭

1968年4月下旬，距离五一劳动节还有两天，陆定一被移到秦城监狱。这是他第一次尝了牢狱的滋味。革命40多年了，在白区做秘密工作随时都准备进监狱，但终于一次次地化险为夷。这次真的进了监狱了，不幸的是，他进的是共产党的监狱。

这座监狱是50年代建造的，专门关押判处重刑的政治犯。“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不少人被关押在这里。陆定一对我们说了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事情：这座监狱是原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主持建筑的，文革中杨奇清也被抓到这里来了。

陆定一被两个汉子挟上一部吉普车，风驰电掣地来到秦城监狱，一道门、两道门、三道门都过去了，车子停在院子里，下了车后，他环顾四周，弄不清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但没有等他看清究竟，他就被带到一间屋子里。

在这里，陆定一脱去身上的衣服，换上黑色的囚衣，钢笔、手表也都被留下了。这里有几座楼房，他被带进其中的一座，楼中通道两旁，铁门上都挂着一把锁。押送他的人把一个小门打开，“哐当”一声，铁门又关上了。陆定一心里明白了，他已经成为真正的囚犯了。

实际上，他失去自由已经两年了。1966年5月8日他从安徽回到北京，住在安儿胡同1号，他开始被软禁，后来又被送到看守所以及几处

叫不出名字的地方，更是没有任何的人身自由。这次被关进监狱，成了名副其实的囚犯，却没有过一纸判决书，也不知道自己犯的是什么罪，只有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的一个同意逮捕的批示，就被抓进了监狱。

陆定一愤怒了。“嘭、嘭、嘭！”他敲打着牢房的门，大声喊道：“我犯了什么罪？岂有此理！”

没有人理会他。只听到“啪搭”一声，牢房里的电灯亮了。一个灯泡高高地悬在天花板上，发出了并不太亮的灯光。

牢房的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68164”。它有特定的含义：68——入狱时间，1968年；1——特等犯人；64——这个囚犯的编号。

在这个监狱里，陆定一的名字被这个68164所代替了。

牢房大约只有6平方米，是个单人的囚室。靠墙放着一张木板小床，床很低，离地面只1尺左右。角落里有个小水池，供盥洗之用，没有马桶，只是在水池边设有一个水泥便池，大小便之后，舀一勺水冲就完事了。房有两道门，里边是铁栏门，外边一道是木头门，门有窥望孔，下面有个6寸见方的小门，用来打水打饭。一个很小的窗子，高高在上，站在地上伸手也够不着。装在天花板上的电灯，开关却安在门外，由看守控制。这个电灯彻夜不关，以便于看守看到囚犯是在睡觉还是在干什么。

每天供应三次开水，每次一杯。



出狱不久的陆定一（摄于1979年）

囚犯要严格遵守作息時間，每天早上7時哨音一响，即起床，晚上9時听哨音睡覺。平时不能躺在床上。

每天有一次放風，地点在牢房外地坪上，用牆隔成許多小格，犯人单独地放出来，走进自己那个小格里，谁都见不到别人。兩行小格，一个挨一个，活像猪圈。只有站在高处的看守人员能看到犯人們的活动。

犯人的伙食极坏。1981年7月我们随同陆定一同志到青島，住在八大关的宁武关路12号。有一天吃饭时，每人有一小碗西红柿鸡蛋汤。老人用调羹在汤里晃了几下，感叹地说：“在牢里要有这一碗汤喝多好啊！”西红柿鸡蛋汤，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东西了。我们问：“你在牢里吃什么？”他说：“平时是粗飯淡菜，窝窝头白菜帮，只有春节时能吃一次饺子，或者有两个狮子头。”又说：“我12年没有吃过西瓜。”

但是在监狱里也有好处。陆定一说过，在牢里比在外面接受“群众专政”、“红卫兵审判”要

好些，牢里多少有个规矩；而“群众专政”、“红卫兵审判”无法无天，任意打骂侮辱，不少人就这样被整死。我没有死，算是幸运。

陆定一进了监狱，而审讯他的专案组却一直沒有撤销，审讯也仍在继续进行。有时三更半夜突然要提审他，仍然是那几个老题目。讯问完叫他回牢房写材料。有时材料写好了，交给专案组，专案组的人看也不看，当着陆定一的面把它撕掉，简直是在耍弄人。

这样的牢狱生活一年、两年、三年，周而复始地过着，没有正式审判他犯了什么罪，也没有说明判多少年，要坐几年牢，就这样不明不白当无限期的囚徒。他没有书可以阅读，也看不到报纸，与外界完全隔绝。但他不会没有思想活动，党怎么样了？国家怎么样了？作为曾经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共产党员，他很自然地要想到这些。想起自己的这些遭遇，他不禁喟然长叹：国法何在？正义何在！

他继续写申诉，连自己也不知道已写了多少次了，但他还是写，又同样的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

有一次，专案组看到他的申诉，暴跳如雷，大骂他企图翻案，决定要给他一点颜色看。

于是，陆定一被第二次带上手铐，连吃饭、睡觉、大小便都不给松铐，只有在半个月一次的洗澡时才被摘下来，半小时后洗完澡又立即被带上。铁铐套在手腕上，皮肤被磨破，露出鲜红的肉，钻心一样地疼痛。他把衣袖塞到手铐里，连衣袖也被磨破，殷红的血水渗在袖上。

长期囚禁在单人牢房里，容易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缺乏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精神会失常；二是除了审讯之外，没有人和他说话，可能失去说话的功能。陆定一也担心他会出现这种现象，于是他想办法避免。办法之一是他常想一些可笑的事情来哈哈大笑，想不出什么可以笑的，就学京戏中的大花脸，发出哈哈的笑声。办法之二是唱京戏，既发出声音，又让舌头转动，因此他蹲了十几年监狱，并未失去说话的功能。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监狱的看守以及专案组，一直对陆定一保密，因为他的罪状中就有一条“对林副主席刻骨仇恨”。如今这笔账怎

么算，专案组颇感为难。因此干脆不提，好像没发生这件事。但是总不能长期瞒下去，他们自己也透露出来。陆定一很长时间才知道这件事。

1972年12月，有一天，陆定一被传唤到了监狱的办公室，那里有三个人等着，向他传达说：中央接到反映，说监狱里有人搞法西斯，搞法西斯是不对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有最高指示：法西斯式的审讯制度应该废除。今后如有打骂、刑讯逼供等情况，你们可以讲出来，也有权直接向中央控告。

陆定一立即不客气地说：“有呀！我意见多得，动不动就给人带手铐不就是法西斯。多年来专案组的负责人法西斯罪行很多，刚才说的只是一个例子。”

后来他才知道，被关在这座监狱的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仁，戴了两年手铐，被活活铐死了。

陆定一思忖，有谁能关心秦城监狱这些囚犯？原来是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被关押出狱后，冒死上书毛泽东，将监狱里种种残酷现象和刑讯逼供等一一揭露出来，周恩来才派了人来，不准在秦城监狱搞法西斯。

然而监狱里的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善，因为林彪死了，还有“四人帮”在横行霸道。

寒来暑往，春去秋来，陆定一的囚徒生活，年复一年，除了审讯少了些，没有什么变化。

1975年，中国大地有了一点春的气息。邓小平复出并且进行了“全面整顿”。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在落实政策、解放干部方面采取了重大步骤，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大多数被关押审查者予以解放，搞清楚的予以平反。这使300多名高级干部获得解放，其中一些人还陆续被分配工作。

但是，解放干部受到很大的阻力，阻力来自“四人帮”。这年4月，《红旗》杂志发表了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气氛又紧张了。江青大肆鼓吹“反经验主义”，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11月初，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国又是寒凝大地了。

11月1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陆定一的问题。会议给陆定一定下三条罪状：一、阶级异己分子；二、反党分子；三、内奸嫌疑。会议还作出“永远开除党籍”的决定。这次会议周恩来因为病重没有出席，邓小平与众不同，提出“还是留在党内”，但他孤掌难鸣，这个意见没有被接受。

这个决议被作为中共中央1975年25号文件下发全国，党内外都传达了，直到居民委员会，范围之广是少有的。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对陆定一作出如此严厉的处置呢？因为他一直拒不承认强加给他的罪名，那时又在批判“右倾翻案风”，江青一伙要“杀鸡给猴子看”，就从陆定一开刀。

这份红头文件同时也决定：释放陆定一出狱，离开北京，放回原籍，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养起来。

自从1966年5月8日被软禁算起，到此时已经9年多了，能够出狱回家，这不是好事吗？不，你要出狱，先要对这些决定签字，这就等于承认自己是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陆定一拒绝签字。

监狱外的儿女们望眼欲穿，希望能见到父母，但是九年了，音讯杳然，听到传达文件，希望仍然落空。

他们向有关组织写信，一封封都没有回音。兄妹们觉得用老办法没有什么效果，得有新招，他们想起直接写信给毛主席。

这时已是1975年，陆定一失去自由已经9年了。兄妹们打定这个主意后，就商量信怎么写法。他们想起毛主席的文章和诗词里不是喜欢用“典”吗？我们何不也找个“典”呢？

他们苦思冥想，终于找到了“典”了。“涸辙之鲋”这个典用上去，或许能感动毛主席，只要他老人家发发慈悲，父亲也许有出狱的指望。

兄妹们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向毛主席披沥自己对父母的怀念，经历一个通宵，字斟句酌，终于把信写成了。

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写这封信，泪水同笔墨齐下！

我们是陆定一的三个子女。自“文革”一开



1994年3月16日，陆定一同志与前往医院探视他的江泽民总书记亲切交谈

始父母便受到隔离，至今九年，杳无音讯。我兄妹只有相对悲咽，告诉无人！

但我们深信，父母是忠于党，忠于您老人家的。即使犯了错误，决不会是反革命。记得父亲被抓走时，对我们讲：“如果我倒了下去，便是爬也要跟党走的……”

如今他身陷囹圄，重病在身，恳求您准他出狱治病，则恩同再造。

涸辙之鲋，但求升斗之水。只要能家人团聚，终老于林泉之下足矣！

临书涕泣，不尽禀诉！

敬祝毛主席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陆 德

陆 健 敬上

陆瑞君

兄妹们的这封信，毛泽东还真看到了，并亲笔批示：“陆定一、严慰冰严重的政治和历史问题，其子女不受牵涉。”

看了25号文件，兄妹们都哭了。戴了三顶帽子，开除党籍，政治生命是结束了。但能够放出来，有一条生路，总比关在牢里好。他们盼望

看到父亲。但是在北京，没有看到父亲出狱；打听故乡无锡的消息，人们都回答“不知道”。

问专案组的人，他们说：“他自己不愿意出来。”

坐牢的人不愿意出来，哪有这等咄咄怪事。原来事情是这样：

1975年12月24日，专案组全体6人来到秦城监狱，由组长向陆定一宣布：“中央政治局于1975年12月11日开会通过决议，开除你的党籍。”

他的罪状共三项十三条：

第一条罪状：世代做官。

第二条罪状：陆的父亲说过一句话：“两面有人也好。”

第三条罪状：陆在20年代写给叔父的信上有“光耀门第”一句话。

第四条罪状：陆写了一个字据，接受父亲的遗产。

以上四条罪状，合成第一顶帽子：“阶级异己分子”。

第五条罪状：说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做了好事，又说秦只有17年。

第六条罪状：1959年庐山会议前，在火车上彭德怀找陆谈过话，陆向他提供材料。

第七条罪状：陆对其弟陆亘16岁时的变节行为写得轻了。

第八条罪状：陆说严慰冰不是反革命而是精神病。

以上四条罪状合成第二顶帽子：“反党分子”。

第九、十、十一、十二条罪状，各说一个特务头子每人有一句或半句话，与陆在刑讯时的假供词有相同或相似之处。

第十三条罪状：1933 年上海共青团中央被破坏，是从陆所知道的惟一的机关开始的。

以上五条合成第三顶帽子：“重大内奸嫌疑”。

就凭这些捕风捉影的罪名戴了这三顶大帽子，显然又是一起“莫须有”的冤案，陆定一当然不能承认。专案组向他宣布：中央决定放你出狱，离北京回老家，每月发给 200 元生活费。自由诚可贵，政治生命更重要，陆定一当时即向专案组人员提出质问：

“‘重大内奸嫌疑’——‘嫌疑’怎么可以定罪？怎么就能开除我的党籍？还要不要证据？”

专案组张口结舌，无言以答。他们要陆定一回牢房去，陆定一继续义正辞严地逐条驳斥，专案组招架不住，自己走了。

稍有法律知识的人都知道，这些罪状是不能成立的。举几个例子：“世代做官”，怎么也能构成罪状呢？陆定一对我们说过：“专案组的人告诉他，从他这一代往上数第六代，在清朝当过兵部尚书。我没查过家谱，不知道有无此事。即使有此事，也不能算我的罪状。”“接受父亲的遗产”，1937 年他从陕北到南京治疗痔疮，家里给了他二千多元。当时中共南京办事处刚建立，缺乏经费，他拿一千元作为党费交给南京办事处；拿一千元给唐义贞的亲属作为去找女儿陆叶坪的费用，还有几百元零钱，作为治病的开销。这能算是“阶级异己分子”吗？

说“秦只有十七年”。庐山会议前和彭德怀谈过话。说“严慰冰是精神病不是反革命”。这些都谈不上是“反党”。陆定一多次说过，他请教过医生，确实有这样的精神病，平时一切正常，发作时候精神就错乱了，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严慰冰正是属于这样的精神病。

1933 年共青团中央被破坏的事，陆定一没有被捕，没有任何错误行为，和内奸嫌疑根本挨不上边。

陆定一坚持申辩、上告，只好在监狱里再蹲下去。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垮台了，中华民族经过十年的大动乱宣告结束。陆定一以为，他的冤案昭雪有日了。哪知道一直毫无动静。

陆定一提出要直接写信给华国锋，进行申诉，并要求恢复党籍。专案组听说后，于 1977 年 4 月派人到监狱讯问他写信的内容。

陆定一说：“我要看有关开除我的党籍的文件，这是我的权利，符合党章。”

专案组回答：“这个文件，全国任何人都可以看，只有地富反坏右和你，不能看。”

“向华主席申诉，是我的权利，符合党章的。”

“开除你的党籍的决议，是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毛主席圈过的，不准申诉。”

这年年底，陆定一的心脏病又犯了，必须到医院治疗。这是他第二次走出秦城的高墙。他说，第一次他被送到医院时，乘一部吉普车，两个大汉把他夹在中间。途经天安门时，他凝视着这座久违了的城楼。每年“五一”节、国庆节，上城楼观礼已经无数次，这次竟连看它一眼的权利都没有，两个大汉把他的头往下摁，当时他十分气愤。这一次经过，押送的算是客气了一点，没摁他的头了。

没有想到这次离开秦城，竟是他告别这个蹲了 10 年的大牢。但他并非获得自由，而是被安排在复兴医院监狱病室就医。病房也是牢房，有铁门，有看守，有监规，也实行放风制度，放风地点在楼顶上。

病稍好了，陆定一继续进行申诉。他一再与看管他的一位公安部的看守交涉，终于要来了纸和笔。1978 年 8 月 13 日，他写了一封给中央政治局的申诉信，并附上了一份答辩书，对三项十三条所谓罪状进行逐条的驳斥。他在申诉书中写道：

三项十三条，或者通俗点说，三顶帽子十三根棍子，不敢再说我是匿名信的指使者，是叛徒、特务、内奸了，不敢说我的工作有路线错误了，也不敢用陈伯达、“四人帮”给我加的许多顶帽子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已经把这些否定掉了。但“×××××第一委员会”也不敢在文件中公开否定这些错误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把把这些错误的东西公开否定了，岂不就把专案组的刑讯逼供，陈伯达、“四人帮”的造谣污蔑这些宝贝的东西都否定了吗？那怎么行呢？



1946年春，  
中共代表团成员  
在重庆留影。左  
起：吴玉章、陆定  
一、周恩来、邓颖  
超、董必武、王若  
飞、秦邦宪

三项十三条最奥妙的，是把“嫌疑”作为可以据以开除党籍的罪状。这样，嫌疑=罪状，那么罪状就无须证据了，可以开除党籍或者关进牢里去了。毛主席说的“重证据，轻口供”就不要了，毛主席的肃反路线就可以推翻了。

谎言拆穿了，太丑恶了，令人寒心！

结论应该是，不要相信“××××第一委员会”。他们提出的文件是弄虚作假。我的党籍不应该开除，应该恢复。

我的冤案应该平反，我应该释放出狱。

信交给那位公安人员，请他转交给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那位公安人员满口答应保证送到。可是过了两个月，仍无回音。一问，那位公安人员才告诉他说：“信被专案组拿去了。”陆定一说：“你们公安部和专案组不是一个系统，你怎么让专案组把信拿去呢？”那人把手一摊：“他们要拿去，我没办法。”

专案组非把陆定一置于死地绝不罢休，否则他们多年来的逼供信，算是功还是过？

陆定一说：“我再写。”

这次他写信给公安部部长和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请他们转呈中共中央。

这时已是1978年11月，中央正在召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工作会议。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讨论了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同时提出：完成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此，必须落实党的政策，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之前，陆德也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申诉父母冤情和请求两位老人出狱》。《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顶住“两个凡是”的压力，力排众议，将陆德的这封信在“内参”发表，并在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前，送给了在京的领导同志和中央委员。

当时胡耀邦正在抓紧处理老同志的冤假错案。陆定一的案子，他非常重视。中央组织部作出解放陆定一的决定，并报请中央批准。1978年12月2日，陆定一终于在这一天重见天日了。一位中组部的副部长和一位公安部的副部长驱车来到复兴医院监狱病室，把陆定一接出去了。从1966年5月8日被软禁开始，后又蹲了10年大牢，失去自由的时间前后将近13年。

两位副部长和陆定一谈话，告诉他中央将为他平反。

他说：“能为我平反，这不简单，不简单啊！我的案子该叫冤案吧？”

“是错案。”

陆定一出狱的前一天，严慰冰出狱了。

1979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经中央批准，印发了文件。

同年6月8日，中共中央[中发(1979)44号文]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为陆定一的错案作了彻底平反。

(责任编辑 程 度)

# 李竹如

## 与白色恐怖下的

## 《文化报》

□ 李维民

1936年，正当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加紧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时，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公开出版了一份四开铅印的《文化报》。报头由蔡元培先生题写，下面印着：“中宣部登记证中字 2872 号 内政部登记证警字 5706 号”。先后参与这张报纸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的，总共不过五六个人，除一名做事务工作的青年学生外，都是早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知识分子。先父李竹如是该报主编，他于 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南京中央大学中共地下支部书记，参与领导过九一八事变后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后回山东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济南创办过《新亚日报》。娄凝先是 1928 年在北大读书时加入共青团的，曾任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高清远（李光灿）是 1935 年入党的。还有一个朝鲜族的日本共产党员罗中敏（李明）。另外还有 1926 年入党、当时在北平左联工作的边帅之（边伯明），担任《文化报》驻北平的通讯员。

1983 年，我在北京图书馆找到《文化报》合订本，并且全部复印下来。从昔日的报纸上可以看出，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文化报》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倡导民主自由，宣传抗日救

国，做了大量工作。《文化报》不仅在上海发行，还发行到北平、山东、山西、江苏、河北、河南、陕西等地。80 年代初，河北省副省长王克东、中组部副部长赵振清、建材部副部长丁原等许多老同志都对我讲过，他们参加革命前，都曾是《文化报》的热心读者。1984 年，娄凝先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时，经常到北京来，他多次向我谈起当年办《文化报》的情况。他看到《文化报》的复印本，心情非常激动。这年 11 月的一天，他打电话要我抽空去看他。两天后我去天津驻京办事处时，没想到他已在头天突发心脏病去世了。事后听他的女儿说，那天晚上他看《文化报》看得很晚。后来，他在《文化报》上发表的文章收入到薄一波同志题签的《娄凝先纪念文集》之中。

《文化报》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创办的。报社设在上海萨坡赛路兴业里 22 号的一间旧式楼房底层的统厢房里。编辑、发行几个人吃饭、睡觉也都挤在这一间房内，生活环境的困难还好忍受，最艰难的是国民党特务与法租界当局互相勾结，实行白色恐怖，报纸要在严厉的控制、阻挠和威胁下生存，而且要讲实话、真话，反映群众的呼声。《文化报》不仅有一批热心的读者，而且团结了一批作者和朋友。当时在上海的



李竹如

艾思奇、周文、夏征农等都曾为《文化报》供稿，夏征农的《野火集》出版后，《文化报》还刊登广告宣传。李竹如撰写的沈钧儒、范长江、金仲华、刘良模等进步人士的访问记，先后在报上发表。《文化报》还设专栏，介绍了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等几十位进步作家和学者。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加紧侵略，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压制人民的抗日活动，对报刊实行了种种严厉限制。《文化报》创刊后接连发表了《对于缓远抗战应有的认识》、《为国牺牲》、《抗战》、《缓战的前途》等社论，公开提出“联合一切有抗战决心的人民，发动整个民族抗战的伟力”。然而，报检当局不准许报纸出现抗日言论，甚至规定不准使用“抗日”等词汇。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报》采取了一些巧妙的应对措施。例如，把“抗日”改为“抗×”，“日军”改为“×军”，“日方”改为“某方”，这样并不影响读者了解文章的内容。再一种办法就是，报检当局删除文章中的一些内容后，留下空白“开天窗”，让读者去领会文章的原意。例

如，“终可以汇成抗日巨流”、“负担起抗日的重任”中的“抗日”两个字被删去了，但留着两个字空，读者仍然能明白是什么意思。

《文化报》几乎每期都发表时事述评，有时一期发表两三篇。当时人们最关心的是亚洲的日本和欧洲的希特勒的侵略动向。《文化报》的许多论述非常精辟。1936年10月24日《文化报》发表的《日本侵华的新形势》一文，尽管被当局删掉几乎一半，留着一大块空白，仍可看到这样一段话：“日本侵略的企图已经是再明显不过了。无论报纸的沉默，官方的宣传，以及半官方人士的解释都不能掩盖了。中国当局努力调整的失败，尤可证明此点。”1936年10月27日以李竹如笔名发表的专论《目前的世界新形势》一文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做了这样的预测：“现在距世界大战已没有多远的路途，只要意、德两国和他们东邻方面的朋友稍稍用力便跑到战争的爆发了。……法西斯的魁首非常明白，每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每一个有地位、有金钱的绅商，都惧怕苏联的强大，都惧怕因苏联的胜利增加了本国人民革命的决心。”文章并预言：“在意、德称霸之后，最先受害的未必是苏联，而是临近苏联，而又临近德、意的小国，甚至在法国孤立的时候，他们也未必不先闻闻这位巴黎姑娘的香味。如果具体点说，法西斯魁首的真意，是在削弱了苏联的势力以后，先用各小国（或者英法的一部分）的土地财产，把他们自己养肥，然后再与苏俄作决定的战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情景，正如这篇文章的预见。

《文化报》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经常揭露国民党腐败的独裁统治，倡导科学民主思想。从1937年1月21日开始，李竹如在《文化报》上开设“寄青年友人的信”专栏，每期发表一封，用与青年拉家常的形式，宣传民主自由思想。开始，只谈些读书、生活、交友、恋爱之类的话题，慢慢深入下去，在五四运动18周年，即1937年5月4日发表的第34封信中，他写了这样一段话：“就现在各国的情形说，有独裁政治，有民主政治。独裁政治便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随意来支配大家的事。民主政治，由大家按着自己的意思选出总统或官吏，叫他们按照大家的意思，替

大家办事。……只要稍有头脑，当然容易明白独裁政治容易流为个人专制或寡头专政，只为少数人谋利益，牺牲了大众的幸福。民主政治便没有这种危险，因为大家推举的人当然能为大家谋利益，如果违背了大家的意旨，人民还可以把他罢免，这是一种最好的政治。我们明白了民主是最好的政治，便可以看一看目前的政治是否民主，并要力争民主政治的实现。”

面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37年2月6日李竹如在《文化报》上发表的致青年友人的信中，委婉地鼓励读者：“严寒曾经磨难着人们，但严寒的后面就是和暖的春天。记准吧，年轻的朋友们，严冬并不能永远统治着世界啊。”1936年9月，丁玲被国民党囚禁三年多后逃离南京，于11月辗转到达陕北，很快担任了中国文艺协会主任。由于国民党特务造了许多谣言，上海文化界许多人都关注着丁玲的命运。《文化报》准备在1937年5月19日发表一篇反映丁玲在陕北情况的文章，但报检当局禁止发表，《文化报》上留下一千多字的空白，然而编者巧妙地留下一个标题：“丁玲胖了”。读者从这四个字可以想像到丁玲的脱离虎口，以及她在陕北的境遇，给那些准备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热血青年以鼓励。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以非法组织上海各界救国会的罪名逮捕了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联合红军、一致对外的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七人，人称“七君子”事件。《文化报》迅速作了报道，并多次发表社论、评论，声援七君子。在七君子被关押期间，《文化报》发表了李竹如写的“沈钧儒先生印象记”，称赞沈钧儒的爱国奋斗精神。介绍了王造时自五四运动以来积极参加历次爱国民主运动的事迹。针对国民党政府强调所谓“思想统一”，而取消言论自由、镇压民主人士的倒行逆施，《文化报》于1937年6月13日发表题为《思想自由、思想统治与思想统一》的文章，指出：“思想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不过是现实的反映。现实不是以钳制和压力所能歪曲。利用权威虽然一时可以指鹿为马，但鹿终是鹿，马终是马，终不能长久的歪曲。任何势力在现实的面前总要失掉他的势力。因此

违背现实的愚想，也终难因箝制与压力而统一。”文章举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例子，指出：“如果思想可以用政治的势力统治，则目前的中国，或者还在秦始皇后裔统治之下，不但上无唐汉，而且也近无民国。但秦始皇的天下，也终于二世而亡！……用信仰维系一时的统一，固非绝无可能，但只是一时的、脆弱的。”

《文化报》不顾当局的威胁、恐吓，发表了许多呼唤民主、反对独裁统治的言论。同时用不少篇幅，反对旧礼教，提倡新启蒙运动。1936年五四纪念日前后，在上海、北平等地出现了一场提倡和反对新启蒙运动的风波。上海文化界首先提出新启蒙运动的口号，艾思奇、何干之、夏征农、陆贻等为此召开了座谈会。北平文化界的黄松龄、张友渔、张申府、张郁光等积极响应，并成立启蒙学会，提出“反对盲从，反对武断、反对迷信”，倡导民主政治。而维护封建礼教的北师大教授杨立奎竟然公开发表通电声讨。随后，张申府发表谈话，李何林等发表文章予以驳斥。《文化报》对这场风波作了连续报道，并发表评论表



《文化报》

# 李竹如同志是我 党宣传新闻战线上 一位杰出的组织者 和活动家

徐向前

一九八一年一月

徐向前题词

明支持新启蒙运动的立场。

《文化报》很少发表长篇大论的文章，唯有一个例外，就是在鲁迅先生去世后，《文化报》以很大的篇幅介绍鲁迅的贡献，并且详细报道了鲁迅先生去世后从入殓到发丧全过程的每一个细节。譬如，1936年10月22日下午2时参加送葬的有：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胡愈之和日本友人内山丸造等；扶柩的是：黄源、姚克、孟十还、田军、胡风、欧阳山、聂绀弩、巴金、靳以、吴朗西、黎烈文、张天翼等14人。在有六七千人长达一二里的送葬队伍中唱的挽歌是：“你的笔尖是枪尖，刺透了旧中国的脸。你的声音是晨钟，唤醒了奴隶们的迷梦。在民族解放的斗争里，你从不曾退后。擎着光芒的大旗，走上新中国的前头。啊，导师！啊，同志！你死在艰苦的战地。你没有死去，你活在我们的心里。你没有死去，你活我们的心里。你安息吧，啊，导师！我们会踏着你的路，那一天就要到来。我们站在你的墓前，报告你我们完成了你的志愿。”这篇占了将近一个版的长篇通讯《鲁迅先生之丧》，是李竹如亲自到现场采访后

撰写的。

《文化报》于1936年7月创办，至1937年7月停刊，共出版112期（三日刊），每期四版，约两万字，一年共二百多万字。报社人员有晚来的（如娄凝先）早走的（如李光灿），担负日常编辑工作的只有两三个人。而且一般稿件都经报社编辑人员自己撰写或编写。我粗略统计了一下，李竹如在《文化报》上发表的署真名或笔名的文章共有二百多篇，平均每期两篇多，就是说三天要写两篇文章。娄凝先发表的署名文章也有数十篇。同时他们还要参加报纸的编辑、排版、校对和发行工作。每期报纸都要自己包封、打捆、送邮局，经常工作到深夜或通宵达旦。

1937年7月4日，《文化报》发表“本报为暑假暂时停刊彻底革新紧要启事”，准备进行短暂整顿后于8月复刊。不料，三日后发生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又进攻上海。李竹如与一部分朋友一起奔赴延安，行至山西后留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做宣传和民运工作，不久创办晋冀豫区党委机关报《中国人报》。李竹如任社长兼总编辑，后任《新华日报（华北版）》副总编辑，1939年随徐向前、朱瑞同志到山东，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民运部长、宣传部长，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省政府）秘书长，并兼任山东《大众日报》社长、新华社山东分社社长等，1942年11月在反扫荡战斗中牺牲。娄凝先到山西参加牺盟总会工作，后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晋察冀日报》主编等职。解放后曾任天津市政府秘书长、副市长。李明同李竹如到山东，曾任敌工科长，后回朝鲜，50年代初曾随金日成来北京访问。李光灿先期离开上海到延安，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代理党组书记，曾兼董必武办公室主任，后来成为著名的法学家。1985年我访问他时，他是南开大学法学研究所名誉所长，1988年6月病逝于北京。80年代初我在上海见到边伯明，当时他正在住院，是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党委书记，不久后去世。

《文化报》虽然只有一年的历史，但它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责任编辑 洛松）

# 费孝通

□

余广彤



1957年费振东、费青、费霞在太湖

## 和他的三位兄长

1949年三四月间，海内外爱国民主人士从各地云集解放后的北平，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际此大好春光，诗思泉涌的柳亚子先生给费孝通教授的二哥费青写下了一首七律：

松陵门第旧高华，三凤齐飞汝最遐；  
季子北平同讲学，长君南海早乘槎。  
交情远溯追名父，亲谊还应念舅家。  
漫笑文人封建习，一诗题赠喜天涯。

原来，柳亚子和费氏一家都是吴江的望族。柳亚子家在黎里，费家原住同里，后迁松陵。两家是姻亲世交。柳亚子的母亲是费孝通的一位远房姑奶奶。柳亚子小时候常到舅家去，与比自己大几岁的费孝通的父亲费朴庵是好朋友，情谊笃深。

北平解放前夕，费青和费孝通都住在那里，

分别在清华、北大当教授；4月初，大哥费振东作为海外华侨代表也从香港来到北平，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住在六国饭店。三兄弟久别重逢，格外高兴。他们一起去拜望了柳亚子先生。费氏三兄弟在各方面均有建树，故柳诗中称赞其“三凤齐飞”。其实，费孝通还有一位三哥在上海，兄弟一共四人，还有一位姐姐，著名的中国蚕丝业先驱费达生在苏州。柳亚子仅称费氏“三凤”，大概是因为当时在场的只有三人吧？

### 二

大哥费振东生于1902年。据说当时父亲正要到日本留学，所以给他取名为振东。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费振东已经17岁，正在苏州草桥中学读书。他最早接受民主科学思想的熏陶，和同学们一道上街游行、讲演。他还常把《新青年》等杂志带到家中来看，使三个弟弟都受到

新思潮的影响。

1922年,费振东在河北唐山读完交大预科后,直接升入上海交通大学,攻读四年制的铁路管理科。当时中国正处于大革命时期,上海的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费振东是交大学生会的活跃分子,积极发动和组织学生团结救国,抵制日货,支持工人运动。在震惊国内外的“五卅”惨案中,他们的学生队伍在上海南京路英国巡捕房门前游行示威,巡捕房警察向学生开枪,走在他身边的一位同学中弹身亡,他自己也险遭枪杀。他们这些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被当局认为是危险人物。所以到1926年毕业时,江苏督军孙传芳下令不准他和另外六位同学(其中包括陆定一)在铁路部门工作。他在上海一所学校教了半年英文,便远走南洋。

二哥费青此时已在苏州东吴大学医预科读书。在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浪潮中,他是苏州各校学生联合会的活跃分子。他请恽代英、萧楚女等同志到学校来讲演,创办了平成工人夜校(后来他给儿子取名平成,以纪念此事),并帮助纱厂工人罢工。1926年暑假,他被选为江苏学生代表,去广州出席第八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革命中心的广州,他受到极大的鼓舞。回到苏州后,遭到军阀孙传芳的通缉。但他在军阀的白色恐怖下仍坚持斗争。次年3月,同侯绍裘等一起组织群众欢迎北伐军进入苏州。在哥哥的影响下,正在东吴大学附中上学的费孝通革命热情也很高,一度担任苏州《民报》的编辑,负责编辑副刊。然而,好景不长,形势逆转,蒋介石背叛革命,实行清党。费青、费孝通兄弟只好逃往吴江农村躲避。此后,费孝通回到苏州继续读高中,费青则转入东吴大学法学院(设在上海)攻读法律。



费青1929年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到上海暨南大学任教,同时开办律师业务。当时蒋介石一面加紧对红色根据地的围剿,一面镇压各地的革命活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那时上海租界当局逮捕的所谓共党嫌疑分子,都要先经过

“特区高等法院”过堂,再引渡给南京政府。因为律师们都知道这过堂只是形式,辩护也无用,搞不好还会引火烧身,所以大多采取回避态度;而费青却以高度正义感和“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承接这类案件,挺身而出,据理辩护。一次,有一位小学校长和两位教员以共产党嫌疑被捕。“证人”自称是一个已经自首的共产党员,说自己曾经和这三人在他们学校里开过秘密会。费青看出“证人”是假的,当庭请求法官令他把学校位置画一张简图。然后,命捕人的巡捕也画一张。果然两张图全不相同。费青当即指出:“证人”根本没有去过这个学校,完全是伪证,要求法庭将三名无辜被告释放。他发言时,旁听席上一片肃静,国民党政府人员怒目而视,法官十分尴尬。尽管如此,最后只释放了其中一人,把另外两人交给了南京政府。

由于办了几件为共产党人辩护的案件,遭到国民党的嫉恨,费青在上海已难以存身,便到北平燕京大学当“特别生”,和费孝通同学。后来又朝学院当教授,兼做《晨报》编辑。他一面工作,一面还坚持学习,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学资格,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法律哲学。

费孝通在清华研究院毕业后,也考取了公费留学资格,于1936年到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这年寒假期间,他从伦敦到柏林去看望二哥。两兄弟漫步柏林街头,心系万里之外濒临危亡的祖国,决心学成归国报效国家和人民。



费孝通在伦敦完成了学业,于1938年回到祖国大后方,在昆明云南大学讲授社会学,并克服困难,到云南农村进行社区调查,撰写《绿村农田》等书。费青也于这一年自德国东返,经苏门答腊棉兰看望了大哥费振东后,即于年底抵达昆明,受聘于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开设“国际私法”、“法理学”等课程。弟兄俩并于此时先后结婚成家,在文化巷租了房子,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可是不久日军飞机轰炸昆明,小院房屋炸塌

了一角，所幸人们到城外躲避空袭，无人受伤。此后，费孝通和他的研究室搬到了呈贡城外的古城村。费青因不能适应昆明的潮湿气候，哮喘病时常发作，一发病便无力跑出去防空，所以一度回到上海租界内的东吴大学法学院担任教授、系主任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全力准备内战，扼杀一切民主力量。昆明是全国民主运动的中心之一，几个大学成了著名的“民主堡垒”，许多教授成了著名的“民主教授”。费孝通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经常出席群众集会，发表激情的讲演，痛斥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他主编的《时代评论》则鼓吹民主进步思想，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费青也是一位“民主教授”，经常在《时代评论》、《民主周刊》发表文章，推进民主运动。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大批军警特务袭击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等学校，殴打师生员工，并投掷手榴弹，炸死四名学生，数十人受伤，这就是举国震惊的昆明“一二·一”惨案。惨案发生后，费氏兄弟和许多教授一起签名发表“联合声明”，向国民党提出强烈抗议。费孝通置当局的压力于不顾，编辑出版了《时代评论》悼念专辑。费青起草了一副挽联，刊印在这期专辑的封面上：

此处是民主堡垒，贫贱未移，威武不屈，更使尔碧血英魂常共守卫；

空负了锦绣河山，豺狼当道，鸱鸢飞天，当此际阴风惨日无限悲怆。

惨案发生第二天，西南联大教授会召开紧急会议，当场推选钱端升、费青等5位教授组成法律委员会，调查惨案经过，搜集证据，控告罪犯。

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各校相继复员。费青、费孝通也随校回到北京，继续并肩投身民主运动。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弟兄俩多次同其他教授联合发表声明，声援学生的正义斗争。费青还以律师身份，出庭为被捕学生邓特、孟宪功等辩护，并帮助、掩护被国民党追捕的学生去解放区。他还与吴晗、袁翰青等教授创办《中建》月刊，自任主编。刊物因鼓吹民主，很快就被北平当局查封；直到解放后才得以恢复出版，改名为《新建设》，费青仍任总编辑。

费振东在南洋20年更是经历坎坷，备尝艰辛。他1926年底到达苏门答腊的首府棉兰，曾做过苏门答腊《民报》的编辑，教师，后来又担任棉兰中华商会秘书主任。1937年7月国内抗日战争爆发。当地广大爱国华侨心系祖国，为避免当地政府的干扰，用“筹赈难民”的名义，成立了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筹款支援抗日。会所和具体日常工作附设于中华商会，秘书处主任由费振东兼任。他组织了人数庞大的青年募捐队，开展大规模的募捐活动，所收的钱款均汇回国内。同时比较隐蔽地开展抵制日货运动。1941年底，荷印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宣布费振东为不受欢迎的人，请自由出境，实际上就是驱逐出境。

1942年初，费振东携带全家到达英属新加



1951年大哥费振东、三哥费青与费孝通在北京合影

坡，与人合伙试办化学椰油工厂。到了年底，日军侵入马来亚，新加坡危在旦夕。他又乘机帆船渡过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东海岸附近一个名叫石叻班让的小岛避难。在那里隐姓埋名过了三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后来得知日寇占领新加坡后，曾大肆屠杀华侨，与他合作办厂的叶文英就被日寇杀害了。

日本投降后，印尼宣布独立。费振东回到棉兰担任华侨总会秘书主任。他是华侨中民主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在政治上拥护中共反对内战、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支持印尼人民的独立运动。他和邵宗汉等人组织成立了苏岛华侨民主同盟，后与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取得联系，改组为民盟苏岛支部。他们的活动使国民党驻棉兰领事恨之入骨，促使印尼政府宣布将费振东、邵宗汉两家驱逐出境。据说按照国民党驻棉兰领事的计划，要把费、邵两家人押送到汕头，交国民党特务处置。由于中共方面在香港做了工作，他们在途中得到通知，可以在香港登岸。轮船抵达香港时，民盟负责人周新民、萨空了在码头上迎接他们。不难想象，当他迎着新中国喷薄欲出的曙光到达北平，又和两个弟弟重逢，该多么高兴啊！



解放后，费氏“三凤”齐集北京，有过一段各展其能、欢快腾飞的日子。

费振东作为华侨代表，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被任命为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宣传司司长；又是民盟中央常委。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的工作，为团结广大华侨贡献力量。

费青作为著名法学家，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委员、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法学院副教务长，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发挥作用。

费孝通作为著名社会学家，在坚持教学调查研究的同时，也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担任政务院专家局副局长、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民盟中央常委、文教部长等重要职务。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会议开幕，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第一

个五年计划。费振东、费孝通均当选为人大代表出席会议，费青作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也列席大会，共商国是。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们常相聚一起，游园赏花，纹枰对弈，谈笑生风。可是，好景不长，1957年一场急风暴雨便袭来了……

费青患有哮喘病，解放后因肺结核又动手术切除了一叶右肺，身体常不好。1957年春季，正住在无锡大箕山疗养院休养。费孝通“重访江村”结束后，和姐姐费达生去看望他。他出示了自己在疗养中的一些诗画作品，其中有一首《病

病牛不寐  
五湖风雪滿歸船，  
木葉而來不意惆。  
然久病唯難詩，  
是伴無眠怕度秋。  
為年鶴鷗肺折滿，  
月馬山南萬香。  
殘妻逝川無後，  
寧帶往日淚零帷。

中不寐》(七律):

五湖风雪满旧船,求药南来意惘然;  
久病惟余诗是伴,无眠怕度夜如年。  
鹧鸪肺折沦凡鸟,菡萏香残委逝川;  
无复峥嵘往日泪,寥惟起坐看霜天。

费孝通从苏南回到北京没几天,反右派斗争突然开始。据说费青的好友吴晗写信给他,说“北京气候不好,暂时不要回来”,使费青躲过了厄运。弟弟费孝通则作为“章罗联盟的军师”被点名,报纸上的批判文章连篇累牍。大哥费振东对华侨学生的教育、工作分配提了意见,被说成是在华侨学生中“煽风点火”,向党进攻。大哥小弟均被打成右派。费青心情抑郁,疾病日益加重,不久病逝于太湖之滨,年仅51岁。三兄弟遭此厄运,正应了费青的诗句:“鹧鸪肺折沦凡鸟,菡萏香残委逝川”。



费青病逝后,骨灰运抵北京,8月11日于嘉兴寺殡仪馆举行了追悼大会,但正在接受批斗的费振东、费孝通兄弟却未能去参加。被打成右派分子后,费孝通的行政职务及民盟内的主要职务均被撤销了,只留下个教授头衔。费孝通曾说:“实际上我喜欢这个角色,在中央民族学院当一名教授简单得多。”可是既无课可教,又不能去做社会调查、写东西,那孤寂清冷的生活可想而知。到1959年4月第三届政协第一次会议,才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可以参加政协组织的小组到外地走马观花地去看看。

费振东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后,行政职务和民盟内的主要职务也被撤销了,待遇由行政10级降为12级,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当编辑。1962年春节期间,费孝通去给大哥拜年。费振东知道弟弟爱好写作,笔头来得快,问他写什么东西了。孝通回答只翻译了几本书,没什么好写。言外之意写出来也没有地方发表。费振东说你把留学英国的经历写一写,我们需要这类稿件;这些是重要的文化教育史料,对后人是有用的。费孝通回去后写了《留英记》交给大哥,刊登在《文史资料选辑》上。这是沉默几年后

费孝通发表的一篇长文。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兄弟俩都受到了冲击,家被抄了几次,联系被迫中断。直到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后,费孝通从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回来,军代表才告诉他可以与亲戚朋友来往,并派了一辆小车让他去看亲戚朋友。他首先到了大哥家里。此时费振东已70高龄,面容苍老,身体瘦弱,心情也不好。他1975年患直肠癌去世。四年之后,错划右派的问题才得到改正。



费孝通的三哥费霍,1926年毕业于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土木建筑科,跟着舅舅、建筑学家杨锡镠在上海、柳州、南京等地当技术员。抗日战争前,进入南京中央政府参谋本部城寨组工作,参加长江沿线国防工事的构筑。修筑滇缅公路时,云南人迹罕至的高山峡谷密林中留下他的足迹。日本投降后,他到上海市工务局(解放后改为市政工程局)当工程师。在费家四兄弟中,唯有他默默无闻地从事技术工作。大概正因为如此使他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未受到大的冲击。

费霍比费孝通大三岁。小时候很调皮,常和二哥费青一起逗孝通玩,逼得他到妈妈跟前告状;他们想要什么东西,也常支使孝通去对妈妈提,因为知道妈妈偏爱小弟弟。孩子们曾问费霍:“伯伯叔叔都上了大学,为什么只有你进了专科学校?”他笑一笑回答:“我老实,你祖母就把我留在身边。”其实是父母亲考虑到子女多,负担重,想让他早点工作,以增加家庭收入。他确实用自己的劳动收入帮助青哥、孝通弟完成了各自的学业。解放后,他和在苏州的姐姐费达生一起照料父亲晚年生活,使其余三兄弟在外能安心工作。1966年他患高血压中风病逝。

岁月流逝,如今费家四兄弟只有费孝通教授健在。年近90高龄的他从国家领导人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学术园地里辛勤耕耘着。

(责任编辑 吴思)

# 张学良胞弟 张学铭 其人其事

□ 汪东林

## 抱病讲衷肠

全国政协机关办公的那个大院，原是清朝顺承王府，是张作霖的公馆，真正在这里办公、生活过的是张学良先生。我初到政协机关工作时，一位老同志曾领我参观了一遍。张学良先生现在在大陆还有一个姐姐，七个弟弟，五个妹妹。最重要的有两位，一位是张学思，行四，我人民海军少将；一位是张学铭，行二，与张学良一母所生，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城建局副局长。张学铭平时也常来政协礼堂开会、吃饭。

“文革”十年，张学铭大部分时间是在天津度过的。他的遭遇，我仅事后有所闻。只知道“文革”后期他一直患病，日子过得很艰难。

1978年2月召开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张学铭是特邀小组的成员之一。这个小组是以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委员为主体的，小组里的大多数人历尽劫难，见面都有隔世之感。组内不少委员向我询问张学铭来不来？我专门向大会总务组打听情况，答复说，张学铭委员患肝硬变，有腹水，随时有发生食道静脉大出血的可能，医生不让出院。这么说，张学铭真的参加不了这次会议了。

出乎意料的是，在政协大会开幕的前一天，张学铭竟拄着拐棍，在家属的陪同下，出现在我的面前。大会总务组负责人赶来劝说，张学铭一口拒绝，最后他站起来十分坚决地说：

“我只能感谢领导和医生对我的关心，但这个命令我不能执行。政协大会十多年不开了，我是老政协委员，协商、讨论国家大事是我的职责。我还要会会那些同我一样在林彪、‘四人帮’魔爪下死里逃生的老朋友们。就是死在这个会议上，我也心甘情愿，他人不用负责！会议不闭幕，我决不回医院去，谁来动员也不管用。”

他讲得斩钉截铁，大家只得作罢。

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次政协大会的气氛十分特别。无论是大会会场的间隙，还是小组会上的发言，常常是一会儿喜，一会儿忧，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笔者所在的这个小组，这种气氛尤其突出。常常是高兴处，当场吟诗歌唱；伤心处，则出现一人痛哭失声，许多人落泪奉陪的场面。这感情上的大起大落，对重病在身的人是不利的。小组召集人程思远先生因此几次同张学铭打招呼，关照他控制自己。张学铭每次只是频频向组长拱手点头，并不直接答话。等到他发言时，却果真控制住自己，如诉家常，平心静气。但到了发言的后半部，一提到敬爱的周总理，张学铭终于哽咽起来。程思远先生立即打断他，说：“张老，你身体不好，不宜激动，就先讲到这里吧。”不少委员也随着劝阻，但他摆摆手，掏出手绢捂了一会鼻子，随后猛吸了口气，又接着说：

“请组长和诸位放心，我能控制住自己，但话不讲完，更憋得难受。同在座的诸公一样，周总理的大恩大德，我张学铭也是一言难尽的！我大哥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至今，已经是第42个年头了。当初他要能听从周总理的话，也不至于落得这样长期的骨肉分离，这是一；再说打西安事变至今，周总理一直惦念着我大哥，关怀着我们全家，为我们全家人操碎了心！如今，我们一大家子都好，只有弟弟张学思在‘文革’中被林彪迫害致死，最后还是周总理亲自主持，为他的冤案平反昭雪。今几个我大哥几十年身陷囹圄，一个人孤零零在台湾，与我们一大家子隔绝，苦



张学铭

度晚年，我能不日夜思念他吗？蒋介石这老东西死了，他的儿子蒋经国仍没有给我大哥自由。岁月不饶人啊，我们弟兄都老了，难道要我们都到了阴间才得以骨肉团聚吗？祖国统一，亲人团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除了我张家弟兄，全国还有千千万万个破碎的家庭要团圆！我每每想到这些，就气不打一处来，心里实在不是滋味，我……”

张学铭讲不下去了。他脸色通红，气喘吁吁，老泪纵横，我立即请来了驻会的医生，把张学铭送回了卧室。

## 旅途话往事

一年后张学铭的健康状况略有好转，全国政协组织委员们就近到任丘、大港两个油田和天津市参观，他执意报名参加。参观团允许他带

人陪同，乘坐一辆小卧车。在这次历时半个月的参观考察中，笔者作为工作人员，曾有几个夜晚同他长谈，有时则与他同车，在旅途中东南西北地自由交谈。

“张老，有位委员聊天时曾告诉我，说您大哥张学良对您非常严厉，不仅小时候对您严加管教，长大之后也常对您不留情，因此您非常怕您大哥，不知是否属实？”他对我的提问感到意外，扫了我一眼，反问道：

“告诉你这话的委员是谁？能通报他的尊姓大名吗？”

我愣了一下，考虑话已说出，索性再具体一些，便接着说：

“这位委员自然是您的老朋友，同我也是认识多年的，但我不便点出他的名字。他还具体告诉我这样的事，说您在30年代初吧，有一次坐飞机到国外去赌博，输了一大笔钱，您大哥得知后，把您扣押起来要重处，不少人出面说情才把您保释出来，不知可有此事？”

“好了，我知道了。同你说这些的一定是唐胖子（指唐生明），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道听途说，你就信他的？”张学铭一语道破，但他并没有生气，又接着说：“告诉你吧，年轻人。像我这样生长在封建大军阀家庭，在旧社会混了半辈子的人，身上染点恶习是不足为奇的。他唐胖子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脸说我，真是岂有此理！但说到我们张家，自父亲被日本人炸死之后，我大哥有志气，有胆识，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勇挑重担，而且一改自己身上的旧习气，特别是下大决心戒除了吸毒的恶习，这是尽人皆知的，也为我们兄弟树立了榜样。他自然注意对我们的弟弟妹妹严加管教，尤其是对我。要细讲起来，真是说来话长呢——”

张学铭讲了两件事：一是张学良两次戒毒，一是张学良对张学铭的亲切关怀和管教。

原来，在20年代中叶，张作霖还在世时，张学良就染上了毒瘾。抽鸦片，在旧军阀家庭是平常事，但并不是人人都上瘾的。一旦上了瘾，要戒就十分困难，没有极强的意志和毅力是不可能成功的。

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炸车事件中

丧生，张学良当上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他继承父业，深感责任重大，没有健康的身体是不能胜任的。张学良有了这个想法，又在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的规劝下，下决心戒毒。没有想到才两三天，就难受得满地打滚。甚至用头撞墙，不省人事。于凤至和赵四小姐既心痛又着急，便派人去请了一位日本医生。这医生二话不说给张学良打了一针。这一针立即见效，张学良自此每天打两针，鸦片烟戒掉了，精神也恢复了。全家人喜出望外，重赏这位日本医生。但都不知道这针剂药水是比鸦片更凶的毒品——吗啡。不到一个月，张学良的身体竟一天不如一天，一天不打针就痛苦不已。等弄清了真相去找那日本医生，那家伙早已逃回日本去了。张学良的第一次戒毒宣告失败，只得每天靠打吗啡维持，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1933年3月，张学良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引咎辞去总司令之职，同时郑重宣布到上海戒毒，然后出国。3月12日张学良一行抵达上海，住张群公馆。当晚，在为他洗尘的宴席上，张学良当众表示，为了能健康地上前线杀日本鬼子，他要借张群先生这块宝地戒毒，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第二天早餐后，张学良就命令副官把他锁进卧室，并下达“不经允许不准任何人进来”的命令。整整一个白天，张学良一个人在房间里看书，喝茶，嗑瓜子，没有动静。入夜，毒瘾大发，自己在地上打滚，于凤至、赵四小姐想进去，他都坚持不允许。直到用头撞墙，响声“咚咚”，随即听不见动静，于凤至等在门外呼喊，也不见回音。待打开房门，只见张学良躺在地上，额头红肿，鲜血淋漓，面无血色。赵四小姐打电话请来美国医生，检查了张学良的心脏和血压后，给张学良注射了针剂安眠药，并对于凤至、赵四小姐说，药物对戒毒只能起辅助作用，能否成功就看张将军的意志和毅力了。张学良就凭着这种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在十多天的时间内，强忍痛苦的煎熬，使毒瘾的发作逐渐减轻，直至基本控制，开始能吃能睡，体力慢慢恢复，最后戒毒成功。

张学铭在叙述张学良两次戒毒情况后，深为感慨地说：“没有第二次戒毒的成功，我大哥

就不可能第二次上任，也就不可能在三年后的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所以说我大哥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确是名副其实的。相比之下，我这个做弟弟的，就差得远了。几十年来，我思念他，对他后半生遭蒋介石软禁直至今天仍失去自由，我一想起就要大哭一场……”

至于张学良对张学铭的关心，也是从张学铭年少时就开始的。张学铭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与张学良乃一母所生，张学铭6岁即丧母，父亲忙于政务军务，且有另外四房妻妾，自然没有时间管他，直接管教他、关心他的就是大哥张学良。后来大哥成亲，军务政务也忙了，便特别关照大嫂于凤至对张学铭多加照料。张学铭中学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张学良经常给他去信，要他用功学习，学到真本领，而不要贪图玩乐。张学铭谈到这里，忽然激动起来，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大哥当年经常给远在日本的我写信，却记忆犹新，可惜沧海桑田，手边未存得片纸只字，多年来我常常为之惋惜。真没想到，一星期前有位辽宁省科学院的同志来访，带给我一封当时我大哥写给我的发表在报纸上的信，要我辨其真伪。我读后确认这信是真的，但记不清这信何以在当年的报纸上发表？这信我还带在身边呢，你先看看吧。”

张学铭说着便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复印的民国16年（1927年）6月16日的《盛京时报》，上载《张少卿致乃弟西卿书》。书云：

“二弟手足，前函谅达。弟能知在异邦奋勉，不貽国人之羞，不丢父兄之脸，兄喜甚。我弟论及东瀛人士，皆能努力前程，非同吾国之军阀官僚，日以大烟麻雀为生活者可比，兄闻之更快甚。觉我弟知识高进矣。但望我弟永远保守此种思想，将来学成归国，勿践旧官僚之臭习，是为切要……切望我弟勿入学习院，那是贵族式学校，要知我兄弟应力谋平民生活，勿染贵族教育习惯为盼。我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造幸福，不是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盼弟在东瀛留心平民生活状态，研究他们一般社会的真精神。弟有什么感触，常常以告兄为盼。”

这封充满同胞手足情谊的信，使我更加确信，张学铭多年来对胞兄张学良的思念是一片真诚的。

## 照片风波和巧设宴请

1981年春天，张学铭身体状况时好时坏，政协直属组每周二次的学习会，他常常请假，但只要稍有好转，便来参加。组长劝他不必勉强，他却笑着说：“当学生就不能老旷课，老旷课就该除名了，我的病好不了也死不了，来走动走动，可增长知识，以免耳聋眼瞎，再说对我身体也许有好处呢。”

在一次学习会上，有位委员发言中讲到，前不久出版的一本海外中文杂志上登了一幅照片，画面是张学良在金门岛用望远镜眺望大陆，还配了短诗，说是“细细窥视”云云。他问张学铭看到没有？张摇摇头，随即问坐在他身边的我，政协机关有没有这份杂志？我答应说有，下次开会时带给他看，不料会间休息时，他又对我说：“我现在就想看看，你能不能回机关把杂志找来？”他这样急迫，我只能照办，跑回机关去取来。张学铭架起老花眼镜左一遍右一遍地瞧照片，一字一句地读那首短诗。后来，别的委员也争相传看，他却坐在位子上默不作声，表情淡漠。有位委员问他：

“张老，这张照片会不会造假？您大哥的模样您还能记得清看得准吗？”

张学铭点了点头，很不高兴地说：“废话！我大哥的模样会记不清吗？虽然45年不见，但大哥的模样我一眼就能断定。这张照片不假，但可气的是，为什么国民党不放我大哥回大陆，而要摆弄什么望远镜呢？再说也可以让我去台湾看望我大哥嘛，我什么都不怕，单枪匹马也敢去，就看国民党肯不肯、敢不敢放我进去？我张学铭今生今世见不着我大哥，做鬼也要去一趟台湾！”

张学铭谈到这里，用拐棍狠狠地戳着地板。

“张老不必动气伤身体。刊登这种照片，玩的是宣传把戏，无须认真看待。祖国的统一是人

心所向，大势所趋，你们哥儿俩总有一天会团聚的。”委员们纷纷宽慰他。

张学铭一直到散会，始终闷闷不乐。

这一年秋天，我跟随时主持全国政协机关工作的孙起孟副秘书长到天津，正遇上天津市政协召开常委会议，而张学铭是全国政协委员兼任天津市政协常委的。他在会上见到我，紧拉着我的手不放，说天津才是他的老家，要约我玩玩，还要请我吃饭。我说这次是有任务来的，况且有秘书长在，要玩要吃怕不方便，改下次吧。他狡黠地冲我乐，说：“好好，好了，你不就怕孙秘书长批评你吗，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挨批评的。”

会议开了三天，我们又留下开了两天的座谈会，在任务完成后，孙起孟同志提前一天返京，让我留下整理一份材料。下午两点，我送孙起孟到天津宾馆的大门口，返回房间推门一看，张学铭笑容满面，颇为得意地坐在沙发上抽烟，看我进去也不打招呼，我好奇地发问：

“张老，你怎么来啦？”

“怎么，你还想把我拒之门外？”

“岂敢岂敢！”我连连解释道：“我只是有点意外。您老光临，我能不欢迎吗？”

“这就好。”张学铭说：“我就说一桩事，下午五点半我派车接你出去吃晚饭，这下子你没有理由推辞了吧！”

“这，这……”我竟然真的答不上话。

“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他站起身要走，我送他到房门口，他回头冲我说：“这就叫‘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你现在一个人，就什么都由自己作主了。头天我不是说过，我不会让你为这些小事挨批评的吗？我这人就是说到做到。你去写你的材料吧。在房间里等着就是了。”

这天晚上，他接我到天津干部俱乐部吃晚饭，那里十分清静，客人就是我一个，加上司机一共三人。张学铭几乎上至俱乐部负责人，下至服务员、厨师，没有一个不熟悉的。这顿便餐，一律上小盘菜，林林总总，品种繁多，色香味都极佳，是我参加各种大小宴请中的印象最深的一次。我们的交谈，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事，一句也没有提及张学良。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孙起孟

前脚刚走，你后脚就进了我的房间？他笑而不答，问了几次，他才颇为得意地说：

“你应该知道，我从前当过公安局长（应该是警察局长），要搞到这一点小情报，不是易如反掌吗？”

我们相视而笑。

## 最后的日子

1983年，张学铭因严重的肝硬变而导致食道静脉曲张大出血，几次危及生命。我曾去医院看过他，他已弱得说不出话。我们紧攥着手，默默相视。他摇摇头，想说什么而没有说出来，家属提醒我，他摇头是指不想这样痛苦地活下去的意思。我强忍着泪水，大声对他说：

“张老！只要通过抢救这一关，您就会慢慢恢复的！您不是还要争取同台湾大哥见面吗？您大哥健在，您也要战胜疾病，才能实现见面的愿望。您一定要咬咬牙，坚持下去。”

他默默地点点头。

这最后一段话，是每一个去探视的人都要说的。因为强迫止血的抢救治疗措施十分痛苦，张学铭曾几次拒绝抢救，怎么劝也不行，只有提到与大哥张学良见面，他才会增添新的力量，点头接受抢救措施，这件事不仅在张学铭的亲朋好友中，而且在全国政协机关干部职工中也传开了。不少人说着同样的话，都发生了效果。当我离开医院之后，心情一直不能平静。一是病魔的残酷，二是张学良张学铭兄弟情谊之深，三是想到近半个世纪骨肉同胞分离的这个悲剧究

竟要演到何年何月……

就这样拖了不到一个月，张学铭终于不治而与世长辞了。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追悼会上，许多人为悼词里的一段话而泪水盈眶，这就是：“张学铭同志临终前，对由于人为阻隔未能见到日夜思念在台湾的兄长张学良而深感遗憾！”对于每个知情者，这句话会勾起多少往事的联想！在张学铭第一次大出血经过抢救而病情略有稳定时，他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我身体不好多时，但六十多岁、七十多岁，都活过来了，我大哥八十多岁还健在。兴许，我们兄弟团聚的日子不远了。为了这，我治病、吃药、健身，要抱定信心活下去！”我是在场亲闻者之一，张学铭正是依仗这股力量，以他重病之身，活到了七十五岁。而他生前最大的一桩心愿终于未了而抱憾终生，这是一幕何等令人伤心落泪的人间悲剧呵！

张学铭先生已辞世九年！海峡两岸的情势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类似的人间悲剧却并没有结束，这人为的阻碍来自何方？应该怎样拆除？难道我们每个活着的炎黄子孙，不应该从张学铭的悲剧中引发出更多的深思和反省吗？

（责任编辑 程 度）



张学良主持东北军政时期的办公楼，俗称大青楼

# 『五路财神』梁士诒 清末民初显赫一时的

□

于庆祥

## 被慈禧一笔勾销的 头名状元

梁士诒，字翼夫，号燕孙，1869年生于广东三水县岗头村，是个官商书兼而有之家庭。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影响，梁氏自幼埋头苦读，企望着从四书五经里“刨”出一分耀眼的前程来。起步不算艰难，20岁时已中举人，但次年的礼部会试名落孙山。他并不泄气，四年后卷土重来，中进士入列翰林，得受编修。不过世道飘零，时局动荡，注定了梁氏要过一段风中芦苇的日子。世纪初交，义和团大闹京津与八国联军刀枪并举，硝烟弥漫华北平原。老佛爷领着光绪皇帝西逃，王公大臣作鸟兽散。梁士诒携妻将子，领着奴仆取道通州浮海南下回归故里了。

居家的日子平淡恬静，却难以平抚梁士诒出将入相的雄心。风潮过后，他就北上京城再谋官路，时值朝廷幡然而悟，开始推出具有新政意味的考试——经济特科。梁氏早在首次礼部会试落第时，淡漠儒学心有旁骛，对财政知识用力不少，因此谈起经济之道得心应手，见识高出他人。阅卷官满怀欣喜，点梁士诒为金榜第一名。谁知早已有人在“老佛爷”面前奏了一本：梁士诒乃逆党分子梁启超之弟，其姓名有梁头康尾（康有为字祖诒）的含义。慈禧太后极为不悦，挥起朱笔划掉梁士诒的名字，击碎了梁氏通过科举途径直奔中央大员的美梦。

## 投奔唐绍仪 渐掌五路财权

平步青云晋升阶梯被阻断，梁氏另辟蹊径，投到同乡唐绍仪门下，随唐出使境外。1906年春，唐督办全国铁路，梁参与筹划，凡路、航、邮、电四政，治理得井然有序，梁在交通业扎下了根。1907年4月，清廷设立总辖京汉、沪宁、道清、正太、汴洛的五路提调处，依靠唐的推介梁得以担任提调，从此与交通事业盘根错节，一生联系在一起。当时，邮传部的收入超过度支部，财大气粗，位处财政部门的度支部都要不时地

提起清末民初的交通事业，不能不讲到交通系；缕述交通系的历程，就无法回避首脑人物梁士诒。梁氏的大名在民初政坛可算是巨擘之口，边口内敛而响声极大，以铁路、轮船、邮政、电报交通四政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呼风唤雨，翻手覆云。许多政坛老客、军界莽汉都对梁敬畏有加，不愿开罪于他，以免弄得钱袋干瘪饿肚皮。梁士诒纵横民初政坛的本钱就是手中掌管的经济命脉，民初财政账面上传统的税捐绝大部分被地方军阀截留，海关收入又落进外国人股掌之中，中央财政基本靠举借外债和交通进项支撑，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梁士诒在长期的官场和行业活动中，领袖群伦，执掌命门，使其他派系人物不能不为之侧目，极力拉拢依为帮衬力量。梁氏也就成为能够改变政坛力量对比的重要砝码。

低眉顺眼请求接济银两。梁士诒手握五路财权，自是腾挪有术，点石成金，一时财源滚滚，于是“五路财神”的名声悄然而起。

不久，京奉、广九、津浦、吉长、株萍铁路收归国有，梁氏成为十路财神。加上交通银行建立之初就在法律上规定隶属财政、交通两部双重管辖，梁手握交通、金融两条财路，在财界获得了领袖群伦的地位。

## 钱权交织形成 庞大派系集团

梁氏长期把持交通四政，依靠的是经济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交通系。清末民初，转型时期的社会动荡，各种势力分合聚散，并无常数。交通系凭借独一无二的行业垄断优势，卡住了国家财政的运作。财政部的金库还没有交通部的腰包鼓，这是后者傲慢的资本。钱权交织，交通系的人在政坛便青云直上。没有学说信仰，没有派系章程，甚至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只有共同的物质和政治利益驱动。许多人认为：唐绍仪是交通系的鼻祖，实际上，梁士诒才是交通系的领衔人物。晚清铁路事业成型于甲午战争之后，唐绍仪只是把梁士诒引入交通业界。唐在邮传部尚书位子上过了一下官瘾后就转向外交界。真正把当时交通界猛员叶恭绰、赵庆华、关赓麟、龙建章、关冕筠等人聚拢到一起的还是三水梁士诒。梁氏任五路提调期间，不时向部里递奏章，送报告，对部属亲信、乡党邻里提携有加。这些人对梁氏自是感恩不尽，倾心靠拢。几年之间在梁氏的周

围形成了能量庞大的派系集团。同年、同乡、部属，传统社会关系像纽带一样，把业界的大员连结在一起，盘根错节，撕不开，割不断。共同的派系利益，使界外人很难插足渗透，就连袁世凯、段祺瑞、徐世昌后台人物拟抑制交通系时，也往往扯耳动腮、“拎起萝卜带起泥”。

梁士诒联系交通系主要有三条纽带：同年、同乡、部属。

周自齐、朱启钤是梁士诒的多年朋友。周、朱二人出道并不比梁氏晚，当梁氏执掌路务的时候，周、朱同样是中央大员，独当一面。世纪之交，动荡频仍，人际更迭，当时梁氏尚未把交通业界把持成铁桶，于是周、朱二人得有机会入值交通部曹。三人之间因业缘走到一起，成为莫逆之交，彼此照应，融通如水。朱启钤是清廷军机大臣瞿鸿玟的外孙，靠着这一关系，很早就周旋于官场之内。瞿鸿玟与袁世凯政争败落下来之后，竟然送外孙入了袁世凯的幕府，成了袁世凯

旗下的骨干。由于缺乏充足的史料证实，后世诸人在诠释这段历史隐秘时，百思难解。叶恭绰在解放后透露说：这是一出人质抵押的戏剧，瞿鸿玟承认了失败，为了求得袁氏的宽容，主动输诚，于是外孙变成了抵押品。此种解释故事味道十足，但真实程度恐怕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周自齐年少之时从贵州南移广东，可以说是半个广东人，科举仕途，平步青云，走到北方京城。朱、周两人在晚清大潮拨云弄浪，进入交通业界后，与梁士诒一起垄断了经营运作。梁、周、朱三人的个人感情，在亲密交往中透着一种淡淡的尊重，言谈举止相当客气，遇事反复相商，共同支起派系天地，使



梁士诒

交通系成为民初引人注目的一支力量。

与周、朱头脑人物交往相比,梁士诒与交通系中层骨干的关系更显领袖风采。赵庆华、关冕筠、郑洪年、叶恭绰、关赓麟、龙建章等人长期受梁氏的提拔奖掖,因此对梁氏言听计从。这些人又都来自广东,同乡的情结让梁氏指派这些人时,如鱼得水。叶恭绰与梁氏的来往密切,关系莫逆,郑洪年更像是梁氏的秘书,常年追随梁氏左右。

交通系的成分也掺杂了亲族的因素。梁士诒的弟弟梁士诤是广三铁路督办;叶道绳是叶恭绰的族兄;关冕钧和梁士诒结成儿女亲家;关冕钧的儿子关祖章靠父辈的提携成为交通部的技正;大总统徐世昌的弟弟徐世章也挤进了交通界,成为交通系连接总魁的途径之一;第二条途径是与梁氏比肩的骨干人物朱启钤,朱在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期间即随侍左右,后来认徐氏为义父,被徐提携连升数级,进入中央官厅参与重要事务。梁氏通过朱启钤与徐世昌拉上了上层关系,派系前途豁然开朗。

### 屈服袁氏淫威 要“头”不要“脸”

袁世凯当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后,肆意破坏约法体制,一步步向帝制的谷底滑落下去。在1915年初,洪宪帝制呼之欲出之时,各方表态迟疑不决,交通系也不想做出头鸟。梁、叶等人闷起头来装作不解袁氏的心思。袁氏的儿子袁克定怒上心头,唆使肃政使庄蘊宽发起五路大参案,交通次长叶恭绰、津浦路局局长关赓麟、京汉路局局长赵庆华、京绥路局局长关冕钧等一律暂停职务,听候查办。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使交通业界人士闻风丧胆。梁士诒虽贵为总统府秘书长,侍奉袁氏许多年,但还是心中没底,不知这股旋风是否会刮到自己身上。于是指示下属收敛举止,力戒招摇。一天,袁告诉梁:“被参的名单里原本也有你,我已命人去之。”这句话敲山震虎,梁士诒自此隐居北京西山十余日,闭门思策。交通系骨干人物聚集在一起,商量要头还是要脸。要头,就去替袁世凯抬轿子,

吹捧帝制;要脸,就可能遭到贬斥,抛弃荣华富贵。几个人商量的结果,决定要头不要脸。于是交通系人物摆开阵势,在洪宪帝制的吹捧阵容中显身手。杨度的筹安会在宣传上抢了先手,交通系则在操作运转上更胜一筹。梁士诒退出总统府秘书长的职位,改任税务处督办,替袁世凯收罗钞票,充实帝制经费;周自齐时任财政总长,调动百姓血汗钱给朱启钤领衔的大典筹备处。朱启钤时任内务总长,倾全力主持操办帝制大典。一番拥戴,二番劝进,三番登基,洪宪帝制便出笼了。

不过,共和的曙光击穿了专制的黑幕,袁世凯只做了83天皇帝,就在众叛亲离中孤独地死去。失去靠山的交通系人物遭到继任总统黎元洪的通缉。梁士诒在通缉令下达前已得到消息,出走天津回归桑梓。其他交通系人物纷纷隐居林泉,暂避锋芒,以待东山再起。

### 承张大帅扶持 登总理宝座

梁士诒领衔的交通系,人们习惯上称为旧交通系。洪宪帝制败落后旧系一落千丈,以曹汝霖为首的新交通系所取代。然而,梁氏手下的得力干将叶恭绰依旧旗杆不倒,继续充任交通次长。虽说叶与曹汝霖也较过劲,但是共同利益使双方最终聚拢在段祺瑞的旗下。靠着段祺瑞的帮助,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钤获得特赦,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1918年安福国会时期,梁、周、朱在国会“运筹帷幄”,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其后,这三个人追随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与直系军阀唱反调。为打掉直系曹锟的副总统梦想,旧交通系大力倡导把副总统的位置留给南方,接着耍弄手腕多次拉走议员,使国会开会达不到法定的人数,硬是把曹锟的副总统给拖“黄”了。如果说,以前交通系与直系交恶还有点“政治家”的味道,那末,交通系这次搅了曹锟的美梦,两者的斗法就完全是“政客”的品位了。数年之后,直系看准机会开始公报私仇。

1920年夏天,国务总理靳云鹏饱受交通系把持财政大权之苦,散阁组阁反复三次,总算甩



民国初年的北京前门车站

是闲居津门的段祺瑞成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人物。段祺瑞再次出山，就任中华民国执政。在段的提议下，

掉交通系这条尾巴。岂料交通系策划银行停兑，竟然要卡住靳阁经济命门。叶恭绰亲自出关晋见张作霖，要求张倾力支持梁士诒组阁。张作霖同梁士诒、叶恭绰有着深厚的个人私交，派系国际背景也颇为接近。于是张越过山海关进入北京，赶走了靳云鹏。1921年12月24日，在张作霖的扶持下，交通系的头脑人物梁士诒终于登上了权力的新顶峰，当上了国务总理。

没几天，直系吴佩孚借口梁氏会见日本驻华公使时，私下承诺借日本贷款赎回胶济铁路，迫不急待地发电指责梁士诒甘当卖国贼。梁氏对日本公使到底有没有私下承诺已成历史悬案，但吴佩孚抓住了这条辫子口诛笔伐，确实使梁氏内阁摇摇欲坠。梁走进徐世昌的总统府，要求徐氏出面抑制武人跋扈。八面玲珑善于顺风使舵的徐世昌哪肯得罪直系而为梁氏火中取栗？梁氏求救不成，请长假躲到津门，冷眼观瞧事态的发展，既辞职也不理事。但吴佩孚毫不含糊，迭发电报穷追猛打，逼得徐世昌下令免去梁的职务。

### 辉煌不再 甘作“社会贤达”

时光流逝，乾坤轮回，直皖两系风流散尽，蜂起于东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入关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共主北京政权。两强相斗，难分高下，于

梁士诒领衔担当了财政委员会的召集人。不过，没有多长时间，张作霖逼走冯玉祥国民军，段祺瑞也知趣地退居幕后。张作霖走上前台，当上安国军大元帅府的大元帅后，不谙财事的张作霖想到了曾与他政治上有过密切配合的梁士诒。无奈，此时的交通系已经日薄西山，政治能力大为降低。梁士诒只能在安国军政府下属的财经委员会担任职务，是一个名为咨询意义的闲差。

1927年国民革命的北伐号角吹遍了大江南北，随着张作霖返回东北被炸身死，梁士诒意识到袁世凯开创的北洋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自己的政治仕途也走到了终点。新的政坛盟主蒋介石对这位昔日的财神还算客气，邀请梁氏参与政府工作。梁氏知道：交通系原有的本钱——交通四政已被孙科夺去，金融领域的财力已为宋子文、孔祥熙所有，没有实力不会被重用，于是知趣地婉辞了蒋介石的邀请，甘愿当一位“社会贤达”。这样的处境对辉煌不再的梁氏来说，也算满体面的了。梁氏从此有更多的时间在家含饴弄孙，偶尔应政府的咨询出面露露脸。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梁士诒奔走呼号。上海“一·二八”事变之时，梁氏亲赴战场慰问将士，救济百姓，展示了一个普通国人的情怀。然而，身体不饶人，疾病缠身，不久，梁氏逝世于上海。

（责任编辑 赵友慈）

# 梁启超与 京师图书馆

□ 朱天策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他也是近代图书馆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却鲜为人知。

梁启超的图书馆工作实践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末他的青年时代——变法维新活动。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师从康有为求学时,梁启超和其他改良派一起设立了万木草堂书藏。至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藏书已累积一万卷,为配合广东人士成立“粤学会”,当年他写了“征捐图书启”,广泛征集中西学新旧图书,用自己的著作答谢捐助者。这次征捐图书虽因变法失败再无下落,但其鲜明的图书馆藏书色彩是梁启超涉足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初次尝试。

1895年7月(清光绪二十一年)改良派经过数月的酝酿,又在北京创设了维新运动总机关强学会。首先入手的工作也是办图书馆和报馆,梁启超等人用官员的捐款从上海订购图书仪器,还接受北京书肆和英美公使捐助的图书,随后在当年10月成立了强学书局,供人阅览,启迪民智。清廷对此事持怀疑态度,两个月后将图书仪器尽数没收。1896年7月(清光绪二十二年),《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时称“舆论界骄子”的梁启超任总撰述。在创刊号上他介绍西方培养人才的方法时明确写道,“泰西育人才之道计

有三事:曰兴学校,曰新文馆,曰书籍馆”。其《变法通议·学校总论》中有“七曰藏书”;《论学会》的十六项工作中,有五项是讲办图书馆的,如“七曰咨取官局书籍,概提全分,以备储藏;八曰尽购已翻西书,收度会中,以便借读;九曰择购西文各书,分门别类,以资翻译;十曰广翻地球各报,布散行省,以新耳目;十一曰精收中外地图,悬张会堂,以备浏览”。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后的10月,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提到强学会应办的五件事中,就有“开大图书馆”一件。梁启超不但身体力行,广泛宣传,还把兴办图书馆作为富国强民、变法维新的措施付诸实践,可以肯定的是,兴办图书馆,发展近代图书馆事业是他强国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梁启超一直到变法失败并流亡海外,才亲眼目睹自己鼓吹多年的近代图书馆真面目。1903年初至9月(清光绪二十九年)梁启超经日本流亡至美国,当年12月他满怀激情地撰写了《新大陆游记》,全书多次记录了美国近代的图书馆事业。在参观了波士顿市立图书馆后,他写道:“设图书馆以保存古籍者,自16世纪时日尔曼人已行之。至以此为公共教育之机关,实自兹馆始”,“1847年波士顿市长乾士氏义征市税,以设立图书馆,议会许之”。“越二年

英国仿其例，由议会提款以充兹事之用”，“1854年英之门治斯达、利物浦二市始有图书馆，实波士顿以后第一次继起者也”。“以1896年之调查，则全美国中三千卷以上之图书馆凡626处”，“本馆所藏书八万册，其前后建筑费合美金265万元，除总馆之外，其分布于市中者，尚有分馆10所，借书处17处，此皆馆长为余所云者”。以上均道出了英美近代图书馆的规模。

对美国近代图书馆的阅览服务，梁启超赞赏不已，他写道：“华盛顿之图书馆，世界第一美丽之图书馆也。藏书之富，今不具论”，“数千年来世界上最著名之学者，莫不有造像，人之如对严师”。“其观书堂中，常千数百人，而悄然无声，若在空谷”，“观书堂壁间以精石刻古今万国文字，凡百种。吾中国文亦有焉，所书者为‘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二十一字，写颜体，笔法遒劲，尚不玷祖国名誉”。对美国各大学本世纪初即已实行的开架阅览，梁启超更是惊讶，他写道：“余所见各学校之图书馆，皆不设管理取书人，惟一任学生之自取而已。余颇讶之，至芝加哥大学，询馆主：如此，书籍亦有失者否？答云：每年约可失二百册左右；但以此区区损失之数，而设数人监督之，其所费更大，且使学生不便，故不为也”。

企业界钢铁大王卡耐基捐助图书馆的事，梁启超也有详细记录：卡氏数年来捐“纽约市图书馆一千万元，纽约以外美国诸市之图书馆凡一千万元”，“卡氏出身寒微，自其幼时，未尝得受相当教育。惟恃在公共图书馆中得种种智识。故卡氏以图书馆为慈善事业之第一，倾全力以助之。余所至各市，无不见有卡氏所立图书馆者”。梁启超旅美期间，恰逢卡耐基已去欧洲，二人未能相会，令梁启超深感惋惜。如果说在国内宣传维新变法，梁启超只是凭借舆论工具和师传了解资本主义较之封建主义要进步得多，那么这次

美国之行则使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现实，也看到了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毕竟当时国内还没有相同规模与管理模式的近代图书馆。这次美国之旅给梁启超极大的思想震动，对他后来从事图书馆工作和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曾经在19世纪末叱咤风云的改良维新人物梁启超，为何以后任京师图书馆的馆长，埋头学术远离政界，人们不难从他对图书馆事业执着追求的态度找到答案。他的改良措施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但他开阔眼界，学习先进国家经验的求实态度和爱国主义精神，唤起并鼓舞国人士气，确属难能可贵。

梁启超流亡国外期间，国内发生了历史巨变——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图书馆——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相继应运而生，虽然较之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晚了半个多世纪，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有了公共图书馆，也是非同凡响的进步，它标志着封建藏书楼时代的结束和近代公共图书馆时代的开始。

民国建立后，京师图书馆馆长一职开始由教育部次长兼任，由于北洋军阀争权夺利，政局动荡，京师图书馆馆长不得不随政府官员的频繁更换而经常易人。在经费拮据的情况下，京师



任图书馆馆长时的梁启超

图书馆艰难地发展着：《四库全书》、《永乐大典》等珍贵善本收入馆内入藏；馆址也从偏僻的旧址移至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旧址，并制订了规章制度，藏书供众阅览；吸收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一批著名学者到馆工作。

梁启超自欧洲回国以后，他将自己从欧洲带回的六千余册图书，与民国政府拨给的杨守敬“观海堂”藏书中文古籍一万余册合并，于1923年在北京办起了松坡图书馆，梁启超自任馆长。此馆的创建是梁启超为了纪念自己的挚友和学生、著名的护国军将领蔡锷（字松坡），他于1916年11月在日本不幸病故。1922年北京政府下令，同意梁启超创建松坡图书馆，拨北海公园快雪堂和西城石虎胡同七号官房分别为第一馆和第二馆。梁启超亲自拟定了《松坡图书馆劝捐启》、《筹办劝捐简章》，还撰写了《松坡图书馆记》。除向社会募捐外，又拿出自己变卖书法作品所得补充松坡图书馆经费，中外新旧图书兼收，成为当时北京颇具规模和社会影响的私人图书馆。松坡图书馆历经磨难，一直维持到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春经人民政府批准，松坡图书馆并入北京图书馆。梁启超的多年心血融入了中国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中。

1925年12月，教育部正式聘请梁启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这是北京政府教育部与主管庚子赔款退还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协商后，教育部颁发的命令。1924年9月，民国政府为保管和处理美国第二次退还的庚子赔款，创设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次年6月，决定拨款发展永久性的图书馆事业；10月，该会与教育部签约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条件是：教育部以原方家胡同的收藏移交行将组建的国立京师图书馆；基金会拨款100万元作为新馆筹建经费。11月，教育部命令将京师图书馆改为国立京师图书馆，租定北海公园内庆霄楼、悦心殿、静憩轩、普安殿一带房舍用于新馆筹建。但自1926年，北京政府财政枯竭，无力履约，建馆的事只好由董事会独自操办，筹划在北海公园内所建新馆更名为北京图书馆，由梁启超任馆长、李四光任副馆长、袁同礼任图书部主任。考虑到新馆建成后两馆合并问题，方家胡同的国

立京师图书馆也由梁启超兼任馆长，这便是北京政府任命梁启超为京师图书馆馆长的缘由。如果再加上他创办的松坡图书馆自任馆长，一身而兼三任，梁启超创造了当时图书馆界任职记录，事后成为图书馆界的佳话。

移交接办京师图书馆，在政局多变的北洋政府执政时期殊属不易。作为馆长，最令梁启超为难的事是经费不足，政府拨款不到位。他上任后给相关的负责人写信说：“开办伊始，非经费到若干确实程度，不能令馆长安心办事”。为缓解困难，梁启超采取内部节约措施，从馆长到员工都压低薪金：馆长300元、副馆长250元、图书部主任200元、普通员工每月不超过百元。外宾造访的招待吃饭费用，梁启超都从个人薪金中支付。实际上教育部不曾依约向国立京师图书馆拨款分文，为了维持馆务的正常开支和员工生活，梁启超奔走借垫，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将个人十余年积存的永年人寿保险单，商由通易信托公司押借现款，借充馆用。从1925年至1927年6月，国立京师图书馆就是这样艰难地维持办馆的。梁启超在1926年11月11日说：“教育部直辖之方家胡同图书馆，顷已由弟完全接收，改为独立机关，定名国立京师图书馆，现在与中华文化基金会所设之北京图书馆仍暂取分立形式，弟以一人而兼两馆馆长，俟新建筑成立后，再行合并”，“此间唯一之条件，则国立京师图书馆之名称，万不能改易，其他皆可商量”。在他看来，国立京师图书馆比什么都重要，越是困难越要维护国立京师图书馆的利益。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出资筹办的北京图书馆，梁启超主要依靠李四光副馆长和图书馆专家袁同礼图书部主任具体操办。受聘伊始，梁启超即致书李四光、袁同礼，关注采购工作：“购书事日本方面不可忽略，弟意欲将彼国研究中国史及佛教之书先行搜罗。最要者为几种杂志，最好能自第一号搜起购一全份”。即使是后来他重病在身和手术后休养期间，也密切关注国内外的学术动态，为北京图书馆悉心求访图书。1926年4月，他听说原吴兴蒋氏“密韵楼”藏书尽归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所有，立即

致信张元济说：“其中倘有复本，而可以见让者，愿为北京图书馆求分一裔”。同年6月，他又致函李四光和袁同礼，商购“周君书让价最低限度为五千六百元，其书版本尚精，似尚值得，请守公（即袁同礼）细审后决定”，“夏穗卿先生（即原京师图书馆第三任馆长夏曾佑）书目缴上，所拟价何如，或酌增亦值也”。7月又致书李四光和袁同礼说：“颇闻日人之东方文化会耽耽于方家旧籍，吾馆似不能不乘此时急起直追”。表达了他对国内善本古籍流失国外的关注。在购书费的使用上，董事会预定分4年拨给的100万元建筑费，其中的30万元购书，中西文购书费之比例为2:8。到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成立时，原北京图书馆共购置中文书籍8万余册，西文书籍3.5万余册，成为合并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图书编目工作，梁启超历来非常重视。早在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梁启超就进行过图书分类的实践活动——他撰写的《西学书目表》四卷，按学、政、教、杂四部为宗的新体系类分图书，虽然著录的同治光绪两朝翻译西文书仅有300种，但序例却详细达13条，详尽叙述了分类原理和著录项目，在书目后面又附上了自己对中外学科体制的个人见解，形成了一份超出单纯书目范畴的专题参考书目。蔡元培在看了这部书目后的评价是，“区书名、撰译者、刻印处、价值、识语七品，甚便翻检，识语皆质实”。实际上是对传统按经、史、子、集四部分图书的挑战。尽管方法并不成熟，却反映了梁启超对新事物的敏感和勇于实践的天赋。1924年6月在谈到松坡图书馆业务时，他说：“把各杂志分类编起目录来，用杜威（美国图书分类法）分类写片”，“从初时办起，以后每月有新寄到者，即便续编也太费力了”。但在实践之后，他认为不适合中国图书馆使用，便又否定了自己原来的设想。1925年12月20日他说：“鄙意宜自创中国之分类十进法，不能应用杜威原类，以强取中国书籍，致陷于削足适履之弊。守和兄（即袁同礼）研究有素，对于此问题当早有具体的方案，极盼早日写出，经一番讨论后，即行决定，照此执行”。为此事，梁启超找了专家戴志

寿、查士修等与袁同礼一起共商编目事宜。洋为中用，盼望中国也有适用的十进分类法，是梁启超时牵挂的事情。

1925年前后，随着袁同礼等人倡导成立了北京图书馆协会，各地也陆续建立了图书馆界学术社团，以“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求图书馆之协作”为宗旨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经过酝酿，成立的条件日臻成熟。梁启超热情参与并积极支持，他答应袁同礼“借（松坡图书馆）第二馆房屋数间，为中华图书馆协会暂设事务所”。当年5月底甚至推迟了自己去北戴河休息的日期，出席协会成立大会，并于6月2日在大会发表长篇演讲，通过中国与世界在文化与图书馆事业的对比，提出了协会的主要任务是“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并使之“成为中国图书馆学之系统”。为达到这个目标，他建议：“最好有一个规模完整的图书馆，将学校附设其中，一面教以理论，一面从事实习”，“我们培养图书馆人才，不单是有普通图书馆智识便算满足，当然对于所谓‘中国的图书馆学’要靠他做发源地”。1926年3月，在协会会刊的发刊词中，梁启超再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图书馆学”这个概念，尽管他没有来得及写出一部中国图书馆学的专著，但他的倡导还是在中国图书馆界树立了权威的影响。

1926年2月梁启超大病住院，出院后先去北戴河，后回天津继续养病，他时时牵挂着国立京师图书馆的馆务与经费欠缺问题，经常与李四光、袁同礼等人往来书信，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直到9月他才重又回到馆内，入京到馆两个钟头，李四光和袁同礼把大半年办事的记录和表册拿给他看，梁启超说：“大大小小的事都了然了。真办得好！”但是对于经费不敷馆用的困难，梁启超真是竭尽全力点金乏术了。1927年3月，他两次向教育部递交了辞呈。在辞呈中他不无忧虑地说：“本馆度支现既陷于绝境，断非空言所能维持”，“别种机关或尚可一时停顿，而图书馆向来开放阅览最为社会教育之所必需，况本馆所藏图书二十八万册，多属海内菁华，无价之宝，保管之责非常重大。故馆员对此，咸须竟日从公，不得稍离职守，其情况与其他机关人员

之虚应故事者截然不同”。当年6月,梁启超的辞呈得到教育部批准。

病中的梁启超在辞职后并未休息,他酝酿编纂一部《中国图书大辞典》和一部《中国图书索引》。他说:“《中国图书大辞典》,预备一年成功”,“《中国图书索引》预备五年成功”。“两书成后,读中国书真大大方便了。关于编这两部书,我要放许多心血在里头才能成,尤其是头一年训练出能编纂的人才,非我亲自出马不可”。谈及《中国图书大辞典》,梁启超计划“将中国数千年来曾有书籍若干种,现存书籍若干种,悉数网罗,分别说明,以近世最精密简易之表式,作古今典册汇总之簿录”。这个相当于中国古今图书总目的实施计划,是梁启超提出“中国图书馆学”的自我实践。凭他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涉猎的广泛、学识的渊博、著述的丰厚,担纲编纂这部著作完全胜任。他向国立北京图书馆提交了编撰计划,得到馆方的批准和经费补助后,又慎重地用自己的“饮冰室”藏书进行实验,方才开始正式编纂工作。梁启超积极组织人力查找资料,编制卡片,每月中旬将前一个月的工作进展向馆方报告。他感慨地说:“此书编纂颇费苦心,其义例及方法皆迥然不袭前人,意欲为簿录界开一新纪元,衍刘略、阮录之正绪,而适应于现在图书之用”,“意欲使此书成后,凡承学之士欲研治某科之学,一展卷即能应其顾问,示以资料之所在,及其资料之种类与良窳,即一般涉猎者,亦如请一部有新系统的《四库提要》,诸学之门径可得窥也”。但是,梁启超虚弱的身体实在难以承担这项繁重的编纂工作了。他只完成了《中国图书大辞典》的“簿录之部、官录与史志”和“金石门丛帖类初稿”,便在经常出入医院、力不胜任的情况下,遗憾地辞去这项自认为“兴致勃勃”、“津津有味”的工作,刚过了一个月便于1928年9月再度住院治疗。1929年1月19日,57岁的梁启超因肾病不治,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他的早逝,使《中国图书大辞典》成了历史残稿,留下梁启超毕生未竟的遗憾。按照他的遗愿,家属将他的全部遗书捐赠给国立北平图书馆(此时国立京师图书馆与北海图书馆已合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这些书籍,“除饮冰室全

部藏书,共2831种,约41474册,新书109种、145册以外,尚有墨迹、未刊稿本及私人信札,均为重要史料”,凝聚着梁启超的智慧、心血和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1930年起供众阅览,成为馆藏中的名人特藏。

梁启超出生成长在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求国富民强,他宣传变法,倡导维新,自青年时代起至逝世,多次面临人生巨变,但伴其一生最多的是书,接触较多的是近代图书馆事业,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思想认识的局限更反衬出其业绩的光辉,1926年3月和4月,美国耶鲁大学鉴于梁启超的业绩和贡献,在图书馆学专家韦棣华女士的斡旋下,曾两次致电梁启超,邀其赴美接受该校名誉博士学位,这是对梁启超学术成果国际地位的肯定。尽管他因病未能成行,他仍然是当之无愧的。他的业绩和贡献世所公认,启示后人,镌刻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青史上。

(责任编辑 舒元璋)



现北京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

# 难忘越剧大师 尹桂芳

1999年元旦不久的一个冬夜，我接到在上海任记者的二姐来的长途电话，说上海电视台马上就要播放尹桂芳的近况。我急忙打开上海卫视，果真听到了那气韵醇厚，沁人心脾的尹派唱腔，但始终未见到我所思念的越剧艺术家尹桂芳的身影。唯听见一个陌生的——充满苍老深情的声音在诉说她对舞台的怀念，对万千观众的怀念：她多么想和爱她的观众见面，但是已难如愿。“文化大革命”摧残了她的身躯，病魔又夺去了她的声音，她又怎能让观众再见那令人伤心的病容。因此，这个名为“艺术人生”的节目，只能让广大观众看到她晚年留下的少量录像，以及她的弟子茅威涛配像的录音。这些更激起了我的无限挂念。

去年早春时节，我终于来到了上海，偕同二姐来到尹桂芳的家。一进门，我们就看到客厅中挂着著名丹青家徐希泉画的尹桂芳饰演的屈原像和书题的对联：“桂子香飘怡红院，芳名永映汨罗江”，这对书画一直伴随着尹桂芳的晚年生活。沙发两角的小桌旁放满了她的舞台姐妹、学生和观众寄来的贺卡、照片，为这间小小的客厅增添了温馨的家庭欢乐。墙上挂着的一帧镶着镜框的外文证书吸引了我们的目光，细看才知是1998年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的美华艺术协会授予尹桂芳的“第17届亚洲最杰出艺人金奖”，邻墙挂着的福建省越剧之友联谊会“敬祝桂芳大师80大寿”的画幅，使我们恍然大悟，在越剧界被誉为德高望重的尹大姐，已入耄耋之年了。

正当我们感喟唏嘘时，尹桂芳在照料她生



1959年的尹桂芳

活的外甥女范益美的搀扶下走出内室。我们赶紧迎上前去,我万万没想到,尹桂芳竟会变得如此瘦弱!记得粉碎“四人帮”后的1979年,我们初次去拜访来北京参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尹桂芳时,她已因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迫害,以至半身瘫痪,难以行走,连说话也不利落了,真令我们倍感不平。这样一位久负盛名,成就卓著的越剧表演艺术家,竟连一部传真的录像资料都未留下来,这是为什么?这使我们更加倍感不平。对此,尹桂芳本人倒只是宽厚地说:1947年已准备拍摄电影《王孙公子》,因为要参加越剧十姐妹联合义演《山河恋》,时间上有冲突,只好放弃了,六十年代也曾动议和袁雪芬、傅全香合拍《西厢记》,又因“文化大革命”搁浅了。机遇对尹桂芳竟如此乖离,无穷的遗憾笼罩在我们的心头。这次见面不久,我们奇迹般地听到了她在上海召开的“尹桂芳越剧流派演唱会”上的演唱,尽管运腔已难以完全自如,但依然保持着她那以情带声的风格,台下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令人永难忘怀。

据专家统计:在当今越剧界的小生中,学尹派的约占半数左右,40年代前她创建的芳华剧团,几经风雨,至今仍屹立在越剧坛上,这在越剧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戏剧界也是少有的奇迹,显示了尹派艺术经久不衰的魅力,评论界称之为发人深思的“尹桂芳现象”。我们为此感到无比欣慰,更钦佩她坚强的生命力和敬业精神。现在,我们面前的尹桂芳,因声带麻痹,已发不出声音,然而,一双眼睛依然像从前那样有神,流露出我们在舞台上熟见的洒脱的笑容,正是这双眼睛,仿佛又使我们看到了活跃在红氍毹上的尹桂芳……

小范仿佛知道我们心意似的,她拿出了去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尹桂芳舞台生活写照》。打开这本印刷精美的影集,惊喜地看到了众多深深留在我们心中的形象。

这些珍贵的照片实在来之不易。记得1979年我们见到尹桂芳时,就曾建议她出版一本舞台照相集。她却苦笑着说:“想是早就想了,可是十年动乱后,我哪里还有照片、资料?”原来她连1947年苦心经营出版的《芳华剧刊》在“文化大

革命”中都被烧毁了。后来,我的两位姐姐把自己劫后尚存的剧刊和她扮演的贾宝玉、梁山伯、张生、屈原等剧照和生活照提供给她,终于这本影集历经20年,才在众多友人的帮助下出版,好在内容还十分丰富。

影集的扉页是著名画家程十发在1982年为她描绘的一株枝叶繁茂的桂花。映衬桂花的白色透明纸上,有著名导演谢晋书录的尹桂芳自勉铭:

我爱桂花,  
我要像桂花一样,  
保持自身纯洁,  
在秋风中傲然开放,  
用清新的芳香给人们以愉快。

深知她的谢晋在给她的题诗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尹桂芳同志从旧社会到新社会,“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她是我创作、拍摄《舞台姐妹》时,记忆中留下最美好的生活原形之一。她为越剧献出了毕生的青春年华,她贡献了很多,很多……她获得的却是很少,很少……这是她作为一个人民喜爱的艺术家真正的价值。向尹大姐学习!

这不也是我们所欣赏的尹桂芳的人品、艺术品吗?她的70年从艺生涯,纵贯了一个“真”字:认真、纯真、率真。她恰似一株挺拔的桂花,在繁茂的绿叶中不断吐露芬芳的清香。

### 执著认真的艺术追求

《尹桂芳舞台生活写照》所收录的是她1938年第二次挺进上海后的艺术生活。

从她早期所扮演的吕布、陈琳和《天雨花》中左维明的剧照中,已可以看到她自己所勾划的两道令人难忘的英气逼人的剑眉,及异彩纷呈的眼神;或英武枭雄,或忠诚刚烈,或温文儒雅,显示了各个角色特有的光彩和魅力。据她的第一个徒弟筱桂芳说,她的母亲就是因为看她演的《何文秀》、《沉香扇》、《盘妻索妻》等戏入迷,非要年仅21岁的尹桂芳收下自己的13岁女儿做徒弟不可。

尹桂芳本名喜花,1919年12月1日诞生于群山环抱的浙江省新昌县西门外坎下村小龙潭的农民家。她九岁丧父,母亲只得把这个长女送到小歌班学艺。班主见她生得端庄秀丽,让她学旦角。但小歌班不久就解散了,已抱定学艺宗旨的尹桂芳,便独自去投考一个水平高的科班——嵊县城里的“大华舞台”小徽班。这是一个绍剧和京剧两下锅的科班。她考取后被派学绍兴大班的旦角,可是教文戏的师傅见她不会巴结人,长得又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认定她不会有出息,因此很少给她说戏。幸好一位教武戏的杨师傅见此颇不平,主动开导她说:“你不妨多练练武功,武戏学得多,演得多,对将来演文戏,也会大有好处的。”果真,艰苦的练功使尹桂芳日后以潇洒的台风和不凡的身手,享誉越坛,甚至令功底深厚的京昆界演员也大为惊叹。

那时小徽班经常外出跑码头演出,充当龙套的她便抓住机会看大师姐们的演出,暗暗揣摩她们的身段、唱腔,不久她就成了一个生、旦、净、末、丑都能演的“百搭”。那时她演得最精彩的是《三阳园》里的一个叫“牛皮阿毛”的丑角,“牛皮阿毛”竟成了观众喊她的艺名。14岁时她开始搭班演出,坐着乌篷船,飘荡在家乡的山水间,承受着各种风浪,其中莫过于令她难堪的“立台板”,即一些排挤她的人,故意让她演她不会的戏,让她当众出丑,这就叫“立台板”。没想到有志气的尹桂芳,这些非但没有使她难堪,反而成了促进她学更多戏和更加刻苦练功的动力。有一次她临时顶替一个头牌小生演一场戏,竟演得不洒汤不漏水,事后一位打鼓师傅认真地对她说:“你以后还是改行演小生吧,这一行当有得学啦!”平时就有一股男儿气的她听了正中下怀,于是更加注意小生的表演。后来,沈家门的一个剧团缺头牌小生,来约请她,从此她正式由花旦改演小生,剧团还给她取了一个艺名——尹云峰,第一次亮堂堂地挂在剧场门口。

随着这个团,她在1936年第一次进入浙江省省会杭州演出。在歇夏期间,她又搭班来到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在永乐茶园演出,日夜两场,十分红火。班里有一个角儿见她有了起色,竟使出恶招,硬派她出演她不会的《何文秀》

一剧中“算命”一折。尽管有琴师和好心的大师姐为她提词,但“算命”的唱词和唱法另有一功,尹桂芳不熟悉,竟成了一尊木偶呆坐在台上,令观众大为惊讶。这再一次的“立台板”,又鞭策她把《何文秀》演成了她久演不衰的经典剧目,“算命”这一唱段更被她磨练为最具尹派艺术特色的唱腔,至今仍脍炙人口。

在上海的演出虽只有两个月,但大大开阔了她的视野。她有机会观摩到一些京剧名小生和剧团请来的男客师独特的演技,从他们在台上所显现的阳刚之气中,她悟到艺术必须创新,女小生更应努力扫除脂粉气。由于她的苦练和创新,技艺越来越精湛,也逐渐形成了她自己的风格。一天,她闻到缕缕桂花的清香,不禁想起故乡小龙潭家门前盛开的老桂花树,她怀念亲人,希望自己也能像桂花那样在秋风中傲然开放。她改掉了别人给她取的艺名,自改名“尹桂芳”,从此,在越剧坛上出现了一个名叫尹桂芳的小生。

## 矢志不移的革新精神

在影集中有我们初识尹桂芳时的艺术形象——《云破月圆》中的孔英平。那是在1944年我们第一次去上海九门戏院看尹桂芳和竺水招演出的新越剧。离现在虽已时隔半个多世纪,但那时的新鲜感犹在心间。大幕一拉开,观众就被一个有山有水有树有草的小村子吸引住了,我们幼小的心灵很快被男女主角俊美的扮相,优雅的动作和委婉的唱腔打动。后来我们看了《芳华剧刊》,才知道这是继袁雪芬之后尹桂芳率领她的剧团进行改革的初次实践。

可是,当时发展新越剧的实践受到越剧界保守势力的阻挠,剧场老板也喜欢演出有现成服装、布景道具简单、又能保证上座率的传统戏,因而他们辞退了新进的编导。面对旧势力的摧残,尹桂芳没有退让,她毅然向袁雪芬学习,聘请了来自电影、话剧界的专业人员和业余爱好者,组成了一个编、导、演、音、美密切配合的剧务部。后来还不惜代价请来两位搞西洋音乐的人才参加乐队,发展、丰富了越剧的音乐和唱

腔。

由于尹桂芳领导的剧团演出认真、讲究,剧目文艺性强,吸引了不少像我们这样的不爱看旧剧的女学生。如1945年创演的14个剧目中,表现南宋、明末两代人民反抗入侵者的就有《渔村侠侣》、《血洒孤城》和《春闺梦里人》等。尤为突出的是她们据古典名著改编演出的《红楼梦》,和以往戏剧舞台上偏重林黛玉的演出不同,尹桂芳较完整地塑造了贾宝玉从追求真爱、不事功名,到最后出走的叛逆性格;她演唱的《宝玉哭灵》,凄凉幽婉,红遍电台,深入人心。同年,尹桂芳在主演《石达开》时,又根据剧情需要,突破行当,挂上髯口,在越剧界开了小生演老生的先河。

1946年新年,她们成立了芳华越剧团,尝试演出风格不一的新戏。首演戏就是别开生面、风光旖旎的少数民族戏《沙漠王子》。演员情感细腻的表演,更是引人入胜,以至一演再演,盛况空前。然而,当剧团决定演出富有现实教育意义的时装戏时,却又遭到了剧场老板的拒绝,以不给置办时装戏的服装相要挟。对此,尹桂芳毅然回答:“情愿不拿包银,行头自己做。”结果,上演的三部时装戏:《回头想》、《秋海棠》和《浪荡子》,场场爆满,都演了一个多月,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贴近现代生活的时装戏强大的社会效应。特别是尹桂芳扮演的《浪荡子》中的堕落青年,有极大的震撼力。“浪荡子”最后徘徊在黄浦江边,耳听海关钟声,追悔莫及的“叹钟点”一段唱词,长达116句,竟成为当时观众学唱的热点。

尹桂芳大大发展了越剧女小生的演技和剧目,打破了当时越剧界大都以旦角挑班演出的格局,开创了以小生挑大梁,红透半边天的新局面。1947年后,名小生范瑞娟、徐玉兰等纷纷挑班演出,连竺水招也在尹桂芳骑马摔伤休养期间,以“芳华”原班人马重组云华剧团(竺水招原名云华),不久她也改行为小生演出。及至今日,这种以小生领衔演出的格局仍起着主导作用,促进了越剧表演题材的进一步扩大。所以戏剧评论家高义龙认为:“尹桂芳对小生艺术的发展、提高,也就是对整个剧种系统优化的重大贡献。”

在这种小生群雄,纷争越坛的逼人形势下,尹桂芳并未气馁。她养好伤后另组芳华剧团,先后与旦角王文娟、傅全香等合作演出大型宫廷历史剧《浪淘沙》和文武不挡的《双枪陆文龙》,根据曾朴名著改编的《鲁男子》等。据傅全香回忆,那时的“卖座之盛况,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许多热心的观众都带了铺盖,隔夜排队买票。”当时某报正在选举越剧皇帝,尹桂芳一举当选,后来王文娟回忆当年选举盛况时说:“那时大家推选‘越剧皇帝’是不组织的,完全是观众自觉自愿投票的。”可见尹桂芳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尹桂芳进一步重振芳华剧团,努力开拓演出领域,不把自己拘于单一的形象中。1954年她力排众议,在越剧舞台上演出了根据郭沫若先生的话剧本改编的《屈原》。为了突出屈原沉着、老练、极具胆识的风貌和神韵,她又一次挂上髯口,以精湛高超的技艺塑造了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把诗人豪放的才情、爱国的抱负、忠贞和孤愤的内心表演得淋漓尽致。

我对屈原其人其诗的认识,最初就是从尹桂芳的表演中体悟到的。原文深奥的《橘颂》,改编后经她声情并茂的吟诵,竟成为我们同学最爱背诵的屈原“作品”。据说主演话剧《屈原》的赵丹,对她的表演也大加赞赏,深感戏曲演员的表演手段比话剧宽广;戏剧家田汉、陈鲤庭则坦言:她的演出不亚于赵丹。最后一折《天问》,她手戴镣铐独立在平台上,满腔悲愤地仰首诘问上天,以绍兴大班苍劲悲凉的曲调高唱《雷电颂》,其声其情久久地回荡于剧场的穹顶,观众大为动容。著名京剧小生黄正勤说:“此时此刻的尹桂芳,特别是她的眼神,是我生平所仅见。”他形容这眼神犹如书法家笔锋中的“八面锋”。向以“做功”而著称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也禁不住为这种高难度的表演折服。她主演的《屈原》,已成了越剧界难以逾越的高峰,可惜唯有《尹桂芳舞台生活写照》中留下的两张屈原剧照,尚可一睹她演屈原的丰采。

由于她成功地表演了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荣获当年华东会演的一等奖。

著名剧作家、戏剧理论家顾锡东曾撰文说：“创造越剧流派名小生们一个个出类拔萃，都称得上‘赋性聪明，色艺俱绝’，但还得数尹桂芳第一”。此言已为人们公认。她以清纯英俊，凝重朴实，高雅舒展而又蕴涵激情的形象突兀于越剧舞台上。这从现存的剧照中即可得到充分的印证。

她扮演的角色是多样的，或潇洒豪放，或风流倜傥，或温文含涩，或真诚木讷，或心窍迷途；有狂者，痴者，酸者，谑者，但她演得不妄，不惘，不俗，不脏，这是她深得观众喜爱的重要原因。戏曲中有不少角色是代代承传，许多演员都演，但尹桂芳能演得独具特色，令人难以忘怀。如她饰演的梁山伯，憨厚却不失聪慧、幽默，不故作呆板相；她演的张君瑞，痴情却多有才气、灵气，还有几分深沉，无丝毫轻佻相；她演的贾宝玉更令人觉得清秀温存，纯洁可爱，无矫揉的浊酸相。她的气质、台风和靴子功、扇子功、水袖功乃至唱腔，深得观众和行家的赞赏。不少人回忆她演梁山伯《回十八》时所走的圆场，轻捷得似水上漂，又似云中飞，手上的扇子则随情起合扇拂，犹如彩蝶；边走边唱的那段快板，也唱得出神入化，把梁山伯的性情心态表演得活灵活现。40年代就在“雪声”和“芳华”从事越剧改革的韩义（又名洪钧）曾深感遗憾地说：“这已成为尹大姐的一大绝唱！可惜现在这样的快板听不到了，那样的《回十八》也见不到了。”在1995年出版的众多舞台姐妹、老编导、老观众回忆的《一代风流尹桂芳》一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便是：遗憾！

人们深情地回忆她精湛的演技，有的把她比作江南吴门画派的淡墨山水；有的赞赏她的唱工，人们把尹桂芳和京剧的马连良相比，认为二者在唱腔艺术的特征上，在潇洒出尘的风度和意境上都有某些共同点。她创造的旋律，丰富的叫板，更是一起腔便会获得观众的热烈掌声。倾倒中外听众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者之一何占豪曾介绍说，《梁祝》中的主旋律，开

首的一节即从脍炙人口的尹派叫板中演化而来的，尹派唱腔的优美及其影响和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像尹桂芳这样一个没有进过学校的越剧演员，为什么她从扮像、台风到唱腔、演技都能如此潇洒脱俗，塑造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倾倒了无数观众？

天赋+勤奋，这是人们对尹桂芳的一致认识。她的天才突出地表现在她善于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创造出在中低音区迂回曲折，平淡而富韵味，柔中带刚的演唱风格和相应的朴素深沉，刚柔结合的演技，而不是较为单一地追求男性的阳刚之气或外在的亮丽华美。她在塑造人物时，力求表现人物独有的内在气质，努力从“这一个”人物出发，体验生活的逻辑，以自己独到的艺术见地和深厚的戏曲功底，生动地展示出一个不同性格的有血有肉的形象，令观众难以忘却。

不少传统戏，一经尹桂芳炉火纯青的表演，焕发了新的生命，成为尹派名剧；当时的青年演员李金凤和著名旦角张云霞都难忘她们与她同台演出骨子老戏《盘妻索妻》、《玉蜻蜓》时所受的感染。尹桂芳那声声珠、字字玉的唱功，出神入化的演技，使她们更忘我地投入角色中，发挥出最佳演技，达到了与别人合作时从未有过的艺术效果。

据秦瘦鹃著名小说《秋海棠》改编的越剧，是一部使尹桂芳的演技得到极大发挥的好戏，也是一部充分体现尹派艺术特色的代表作。她恰如其分地演出了“秋海棠”这一个个京剧男旦名角的教养和风度，把他和军阀姨太太罗湘绮的爱情，演得十分朴实纯洁；最后一场更是在角色没有一言一腔的表演中，演出了秋海棠贫、病、老、丑的外形，惨痛的内心，以及良善的本质，同时准确地把握住了沦为班底的名角身上固有的功夫和气质。此剧连续爆满，连演红了话剧《秋海棠》，号称“话剧皇帝”的石挥，在看了她的演出后，也兴奋地祝贺她把“秋海棠”演活了，后来还在报上撰文赞赏。

尹桂芳自40年代起到60年代，曾四度改编演出《红楼梦》，贾宝玉是她倾注心血最多的

一个物，也是她塑造的一个光彩夺目的形象。直至今日，我们都难以忘却她演的贾宝玉的点点真情，不论是初见黛玉时的稚气；读《西厢》时的热情；忽听到黛玉要走时的痴呆；向黛玉掏露心迹时的真切；哭灵时欲哭无泪的悲恸，无不产生强烈的共鸣。她的表演朴素无华，突出一个“真”字，毫无矫揉造作之感。

50年代昆曲大师俞振飞初看尹桂芳演出的贾宝玉，即大为倾倒，说：“不想越剧娘行中有此等人物。”他赞不绝口地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贾宝玉。”又撰文评价说：“尹桂芳同志饰贾宝玉，稚气、秀气、才气、憨气萃于一身，相看俨然，晶莹透彻。至情至性，发扬于歌唱，渗透于手足，洋溢于眉目，直似曹雪芹笔下‘泥泥儿’，诚令人叹为观止。”后来他又在《赠尹桂芳同志》赋诗中云：“红楼昔见哭潇湘，平淡天然最擅长。正是丰神称独绝，于无泪处断人肠。”诗后写道：“桂芳同志所演《宝玉哭灵》，不用花腔，而人物感情曲曲传出，熨贴精当，其悱恻动人之意，深蕴饱含于平淡中，足见其真实功夫，近世所绝少也。”俞老对尹桂芳演的《屈原》也推崇备至，作诗赞叹，并发表了对戏曲表演和尹派艺术的真知灼见，他说：“戏曲表演之身段动作，宁炼毋冗，宁洁毋滥，宁自然毋矫饰，宁朴实毋华靡。凡为高手，必于繁简浓淡间，斟酌审慎，以传神为指归；否则浓盐赤酱，难免书家所谓墨猪之消。尹派表演含而不露，动而不烦，斯乃深得剧艺真谛。愿以此旨，告之后学，俾芳华薪传，绳绳相继。”

### 侠义率真的人格魅力

在越剧界，尹桂芳是被人们公认的大姐，这不仅因为她年龄大，从艺早，更由于她德艺双馨，尤其是帮助别人，无私忘我，提携后辈，不遗余力，在越剧界是很少见的。

当年袁雪芬为了进一步推动越剧改革，摆脱剧场老板的干预，建造越剧同人的剧场和办学馆，筹划舞台姐妹义演时，首先找的就是尹桂芳。因为她较早进行改革，艺术上独树一帜，影响极大；而她的为人热情、诚恳，不计个人得失，

有种侠义血性，又是在越剧界有口皆碑的。

凡是看过电影《舞台姐妹》的，都忘不了一对越坛姐妹在患难中结拜为姐妹的动人场景，而这素材即来自于尹桂芳和竺水招的实际生活。1936年年底，长得极为清丽娟秀的竺水招开始与尹桂芳搭档，她们在舞台上扮的是情侣，在台下尹桂芳则像大姐姐那样照顾竺水招。一次，去黄岩演出，由于她俩没有应召赴警察局长的夜宵，第二天便被警察局的便衣抓到监狱里关了52天。多亏水招娘赶到黄岩，多方疏通、求情，才把两人救了出来。水招娘见尹桂芳忠厚重情义，便在城隍庙里让她俩拜了菩萨，结成生死与共的金兰姐妹。水招娘一手拉一个说：“桂芳啊，依为人有德，今后要多多照顾水招，就像自己的亲妹子一样……”桂芳当即起誓说：“娘，你放心，青天在上，一定照你说的办。”这段姐妹遭难的旧事，这句情义深重的誓言，即溶入电影《舞台姐妹》中，感人至深。

尹桂芳的侠义精神，在“十姐妹”的演义中，表现尤为突出。她不仅自己放弃了准备拍摄电影《王孙公子》的机会，参加义演，同时还努力说服别的姐妹参加。由于在“十姐妹”义演期间，尹桂芳始终与袁雪芬一起站在最前列与国民党政府的社会局、警察局交涉、抗争，当局的头子们极为恼火，便制造了一个十分恶毒的离间计：1948年3月，上海警察总局侦缉科和虹口分局放风说，已抓到前两年向袁雪芬抛粪的人，并供出是“越剧职工会”理事长尹桂芳指使的。事实上，1946年8月成立的“越剧职工会”是某些与当局有关的人一手操纵的，当尹桂芳被告知选为理事长时，她当场就拒绝了，继又在当月25日的报上公开发表《尹桂芳辞去上海市越剧职业工会理事长的启事》。尽管那伙人又在隔天的报上发表反对尹桂芳辞职的启事，但她仍以行动坚决不与他们来往。拒职在先，扔粪包事在后，何能指使？可是警察局竟扣押尹桂芳，还百般引诱她在他们写好的供词上按手印。她坚持不按，要求与罪犯对质，搞清事实真相。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法院只得开庭审判，结果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实际上，制造这些罪名的原因，无非是因为尹桂芳没有听从他们的摆布，于是

要中伤她的人格，同时借此敲诈她的钱财。然而，尹桂芳从不屈服，对那些劝说她用钱财化灾的“调解人”，她每次都斩钉截铁地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尹桂芳当时并不是一个政治思想十分鲜明的人，只是生活经验使她能十分清楚地分辨是非黑白。她只是一心想“保持自身纯洁”，“用清新的芳香给人们以愉快”。虽然污秽的浊水难以损毁她的形象，但她的身心确已受到极大的伤害，1948年她离开舞台，远赴香港。然而，她难以忘怀令她梦魂萦绕的红氍



1945年尹桂芳饰贾宝玉

氍，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她暂离恋人，回到上海重登舞台。不料，严酷的政治环境，断绝了港沪两地的交通，从此失去联系。此时，她在舞台上也失去了相配的好搭档，孤独更激发了她对新人的培养。不久，经她调教出来的旦角新秀李金凤、戴忠桂等，很快为观众所喜爱，芳华剧团的卖座始终以骄人的成绩，令人瞩目。当时华东戏曲研究院实验越剧团（上海越剧院前身）曾邀请她个人参加，但是她为了“芳华”剧团大多数人的出路，毅然放弃了个人的利益。1959年她响应号召，率团离开上海，去福建。在她们离去的那一天，上海火车站人山人海，人们争先恐后地挤进月台，含着热泪呼叫着尹桂芳的名字！

到福建以后，她克服种种困难，把戏送到基层去，上山区，下连队，让福建的观众认识“芳华”，培养懂得越剧、热爱越剧的福建观众。然而，要在语言有差异的地区发展越剧，毕竟是十分困难的，甚至连生存也需靠政府的经济支持。当时，周恩来总理指示已落户于北京的范瑞娟、傅全香领衔的越剧团迁回上海，引起了尹桂芳和“芳华”同仁的思考，当她们向上级领导磋商发展的去向时，却被一些极“左”人物批为“逆流”，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更被打为“反革命”。尹桂芳为人一贯急公好义，济难扶困，曾多

次被评为“标兵”、“先进工作者”、“雷锋式团长”，这时也被某些人诬蔑她是狡猾的狐狸。使她在人格上受到莫大的侮辱和打击，以至她走上了自杀之路。虽然她被救活了，但巨大的悲恸依然压在她的心头，致造成严重的脑溢血，使她成了残疾人。

“四人帮”倒台后，她回到上海养病。尽管她已是残疾之身，但依然像过去那样关怀每一个人。当她得知范瑞娟和她的丈夫未及平反，仍拿着极低的生活费艰难度日，便暗自把一叠钱放在前来探望的范瑞娟的手提包里。她对学生更

有着严父慈母般的心怀，平时她在每个细小的环节上，都要求学生严格遵守练功要求，刻苦锻炼；尤其在他们获得荣誉时，总要提醒他们的不足，强调“艺贵精妙”。她的第五代弟子王君安在演出时因与她的唱腔处理有点不同而显得拘谨时，她就勉励年轻的弟子说：“你的唱法在保留尹派唱腔的风格方面，应当有新的发展，不必什么都要像我。”为了传艺，她的腿不行了，就用较能听使唤的手和眼睛表演。为了满足观众的要求，她以残疾之身登台站着演唱《屈原》，把舞台上压景片用的沉重的铁杵绑在自己的脚上支撑身子。正是在她的言传身教下，又有大弟子尹小芳的鼎力传艺，她的不少学生都获取了大奖，成为活跃在越剧坛上的精英。

正当我撰文祝贺尹桂芳从艺70周年时，在新千年的春节，从电脑网络上传来了她病危的消息，传来了全国各地观众对她深切的问候，北京的一群年轻的越剧爱好者还举办了“祝福尹桂芳专场义演。”3月1日，尹桂芳走完了她那坎坷而又辉煌的人生道路。3月10日，在上海有5千余人冒着滂沱大雨向她告别。人们难忘这位了不起的人民艺术家，她的艺品人品将永远流芳。

（责任编辑 方 隽）

陈永贵  
禹作敏

# 个人专权的悲剧

□ 范银怀

## 异途同归的专权典型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运用典型推动工作。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调查过的兴国、延安时期的吴满有、建国后的平顺县西沟李顺达、遵化县王国藩等先进典型和劳动模范，都以榜样的力量鼓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农民；但是，无论哪个时期、哪一个典型都没有像大寨和大邱庄那样曾把亿万农民动员起来，其声势之大，涉及面之广都是空前的。

这两个典型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大寨是太行山区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80户的村庄，是计划经济时期“依靠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生产的典型”，1964年被毛泽东树为“旗帜”，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后的15年间，全国到这个村庄参观学习的多达700万人次。大邱庄是天津市静海县一个700多户人家的村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层层包、层层联、人人都有自主权”的承包责任制发展生产的典型，被称为中国“首富村”。十几年间它吸引了国内外数十万人到这里参观学习。

这两个典型都是由党支部书记的英雄、模范行为带动起来的。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是1948年入党的，他坚持合作化道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别的地方粮食产量都减产，而大寨照样增产。他的最有力的武器是按照毛泽东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指示，与地主富农斗，与“走资派”斗，与“小生产”斗。他坚持“以粮为纲”，规定社员只能在集体土地上种庄稼，把集市贸易、家庭副业都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这一套极“左”做

法很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斗私批修”原则，因此他特别走红，先后任昔阳县、晋中地委、山西省委的主要领导，直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文革”后，在全国上下批极“左”错误中，陈永贵在1980年9月离开政治舞台，1986年在郁闷中病故。

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禹作敏是1958年入的党。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曾先后四次到大寨参观学习。参观回来搞了个大邱庄“五年规划、十年设想”，他和陈永贵一样领着社员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台田化，改土治碱，但仍摆脱不了贫困。为什么学大寨集体苦干，到头来却是人人受穷？禹作敏总结30年的经验教训后认识到，不能老搞人斗人，而要广开生产门路。农村要富起来，光种地不行，还得办工厂。他不拘一格选用能人，大办乡镇企业，开拓出一条快速致富道路。他随之成了国内外知名企业家，并被推举为全国政协委员。

1992年10月23日，这两个村庄的代表人物相会在大邱庄。陈永贵的继承人、大寨党支部书记郭风莲，是当年大寨“铁姑娘队”队长，她握着禹作敏的手说：“大寨和大邱庄的距离越拉越大；现在向大邱庄学习农民致富之道。”

禹作敏宴请郭风莲时说：“我们农民想什么？不就是奔个好日子嘛！我当过三四十年的干部，大跃进时吃食堂，后来又学大寨，最后才从实践中弄通一个道理：‘以阶级斗争为纲，人心慌慌；以粮为纲，穷得当当’”。禹作敏知道大寨办乡镇企业缺少资金，当即开出一张50万元的支票，送给大寨。郭风莲接过支票感慨地说：“靠别人树典型不行，还得靠自己的腿走路。”

禹作敏以为只要摒弃“两个纲”，就不会再有陈永贵那样的结局。但没想到，禹作敏以成功者姿态自信地评价大寨和陈永贵的几个月之后，他自己却成了罪犯，被推上法庭，比陈永贵的晚景更惨！

禹作敏和陈永贵的悲剧，发人深思。禹作敏去世不久，《滨海时报》1999年11月24日刊登一篇题为《禹作敏与陈永贵》的文章，作者王安从禹作敏在监狱中的“最后时光”写起，说他“目光呆滞”，“那张原来干瘦的脸更加憔悴了”。文章称赞这位农民企业家的超前的经济观念是“极为可贵的”，“是中国农民成功的英雄”，可禹作敏颐指气使时“肯定没有想到孤独求死的结局”。作者由禹作敏想起“另一个强悍之人”陈永贵，称他们晚年“都很孤独”。

笔者在六七十年代曾到大寨采访，结识了陈永贵；八九十年代又到邱庄采访，结识了禹作敏。从这两位农村党支部书记的沉浮可以看出，尽管他们所处的时期不同，领导工作的特点不同，但两人的思想和作风却有相同之处。陈与禹相差十多岁，陈永贵“42岁扫盲”，只能看懂报纸，不会写字；禹作敏小时读过几年私塾，能提毛笔写字，但也只能说是初通文字。这两个被解放了的农民，虽也曾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创造过各自的辉煌，一旦他们功成名就之后，便有了一个共同的毛病，即：以农民“救世主”自居，凌驾于群众和组织之上，个人专权，发号施令。陈永贵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禹作敏说“各吹各的号，都听我的号，不听我的号，一个也不要”。惟我独尊，为所欲为，把自己当作全村的主宰者。

### 出自类似环境的“农民英雄”

陈永贵与禹作敏的浮沉，追根溯源，与他们成长的那个时代，特别是人民公社时高度集中的体制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毛泽东讲到人民公社优越性时说，“工、农、商、学、兵相结合，便于管理”，也便于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人民公社受挫后，毛泽东在1962年对公社体制作了调整，确定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所有制分公社、生产大队、

生产队三级，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这种集体所有制，照一些经济学家说法是“虚拟”的，农民并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份额，因此对集体并不关心。在公社体制下，生产大队一般是以自然村为单位，生产大队既是经济组织，又是一级政权组织。党支部也依自然村建立。这种体制有“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可以统一规划土地，集中使用劳动力，更可以以“民兵连”形式组织大兵团作战。

这两位农民领袖，都是在这种体制下，几经拼搏，当上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后才显示出他们的威力的。

陈永贵是政社合一体制的开拓者。他出生于1914年，从小给地主放牛，扛长工，受尽欺凌，竭力想改变自己的地位。1947年，在毛泽东“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下，大寨组织起以党支书贾进财为首的互助组，陈永贵是成员之一。陈永贵体格健壮，能说会道，又是种庄稼的好把式，但他在这个组里很难出人头地。他看出，那些土改中分了土地，但劳力弱或耕作技术差的农户仍然无力经营，穷富差别依然存在，这些农户最需要能人领导。他对这些社员说：“跟着我干，肯定能吃得比现在好！”于是拉起队伍，另立一个互助组，自任组长，被他称为“老小组”。

马克思说由于农民经济分散，“他们自己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行政权力，这种权力保



陈永贵

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边施给他们水分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693页）。陈永贵会安排营生，技术活由他干，又有制服人的手段，他领导的互助组增了产，也树立了威信，受到区委书记张怀英的赏识。他深知，只有成了共产党员才能取得上级的信任和重用。于是他积极申请，1948年由贾进财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陈永贵当了大寨党支部副书记。

1953年昔阳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几次到县委要求，以他的“老少组”为主体办起合作社，他任社长。与他创办的合作社并存的是贾进财、贾寿元、李二货分别领导的3个互助组，还有4个单干户。这些农户的土地有的与农业社“插花”，不利于全面规划，统一整修。陈永贵思谋要办成一村一社，但阻力很大。有些人对农业社吹冷风。复员军人李二货向农业社挑战，说农业社产量没有陈永贵报得那么多，亩产只有240斤，而他家亩产却是300斤。这一下激怒了陈永贵，陈就采取行政加经济手段对李惩治。这年年底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按规定，统购的应是余粮户的余粮，但实际上统购任务由党支部分配。上级下达给大寨的统购任务是4.2万斤，合作社社员、单干户都得出粮。陈永贵按亩产量多少确定征购任务，给李二货定得最多，在大会宣布后，急得李二货当众打自己的嘴巴：“我连干草加在一起也没有300斤。”李二货哭丧着脸说没有人给他帮忙，无法和农业社相比。陈永贵见他当众服输，又要他逐户登门道歉，才给他减了统购任务。这一下治住了李二货，也给所有说合作社坏话的人眼色看。陈永贵曾得意地向笔者说：“从那天晚上以后，所有的中农，连地主富农都入了社。”大寨达到了他一村一社、政社合一的目的。

为什么陈永贵对政社合一如此执著？有一次，陈永贵向笔者谈他搞互助合作的动因时说：“我一为祖上争光，二为穷人谋利！”，又说：“人死留名，树死留皮。”他要做穷人的救星，光宗耀祖。这是他真实的心态。他好大喜功，又心胸狭窄。1963年底，中共昔阳县委针对农村出现的

所谓“两极分化”和党员干部的“退坡”思想，在农村党员中开展了整党。陈永贵批评贾进财与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划不清界线，这使贾进财处境很困难。贾进财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解放前给地主扛了25年长工，1946年入党，是大寨最早的党员之一。他忠诚老实，办事公道，工作勤勤恳恳，不计较个人名利。贾进财说办社需要“当家人”，就几次提出辞职，同时推荐陈永贵当书记。从此，陈永贵成了主宰大寨的权威，也给陈永贵大显身手开辟了道路。

以村建社，农业社就由经济组织变成党、政、经一体的组织。大寨农民不仅失去了土地，“高粱秸打了叶——光杆”，而且更不自由了，户籍、口粮、劳动、分配都由大队管。他们像绳子拴着的小鸡，动不得了。但是陈永贵认为可以运用行政和党组织“管理”了，他说“集体化的优越性，说不完，用不尽”。成立了合作社，土地实行统一经营，农民对较长远建设如整修土地，因担心投工多见不到实效而影响当年分配，一般都不愿意搞；而陈永贵却认为土地连成片，取消了农户之间的地埂、地界，便于统一规划，集中调配劳力，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绝好条件。他主持制定了“十年造地规划”，年复一年，带领社员开沟打坝，垫土造地，整修坡地，建水平梯田，蓄水保墒，使粮食产量稳步上升，陈因此连年被评为县、地、省劳动模范。

禹作敏也是在为“穷人”谋利和为家族争光而奋斗不息。他出生于1929年，比陈永贵小15岁，但他也是在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成了大邱庄的权威。大邱庄是一个大村，又是多姓家族杂居，禹作敏出头比陈永贵要困难得多。他经过“三上三下”才巩固了他在大邱庄的地位。1958年他入党不久，就当上了大队代理书记，因为大跃进中刮“五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严重，被上级撤销领导职务，在公社管委会当会计，后又当了生产队长。他接受了过去教训，领导生产比较务实，将一个穷队变成大邱庄较富的队。大邱庄人公认禹作敏有能力、有办法，但要他掌大权，就有争议。1971年“文革”期间，村里酝酿让他再当大队党支部书记，有人说

他大哥搞“投机倒把”蹲监狱，他划不清界线，因此只让他当了个支部委员，兼任革委会主任，主管生产。他长年带领社员学大寨修台田，大队面貌有变化，1973年他又当了代理书记，1974年才正式当支部书记。

1977年，大邱庄改选党支部书记，群众说“谁能领导大伙致富谁当书记”，这对禹作敏是个新的挑战。他向穷得娶不起媳妇的光棍说：“跟我干，保管你们三年结婚成家！”结果他连选连任。

## 物极必反最终双落马

党政合一、政经合一、权力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既可以给想干一番大事业的英雄人物开辟一个跃马扬鞭任驰骋的疆场，也可能使他们的权力变得无法制约、不被监督，最后落得一个被拉下马的“土皇帝”的可悲下场。

1963年，毛泽东批转昔阳县四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调查报告后，当时的人民日报政文部主任康英带着记者去采访大寨，知道大寨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确实不错，但也发现陈永贵有“家长作风”，她是刚从周恩来总理秘书岗位调来的，很重视报道的指导性，为避免突出陈永贵个人，在报道中有意识地写了大寨党支部其他成员的作用，但陈永贵并未从中记取教训，接受教育。1964年，毛泽东提出“农业要学大寨”，周总理派当时的农业部长廖鲁言到大寨调查，在大寨蹲点的县委书记张润槐向他汇报了大寨的经验后说，大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对富裕中农当地主富农斗，这不符合党的政策；二是社员劳动强度太大，应该注意劳逸结合。这次汇报时大寨干部不在场。廖鲁言调查了20天，通过劳动观察，看出陈永贵安排集体生产很周密，称他是大寨的“好管家”，但也看出他对社员强迫命令严重，凡事他“说了算”，别人都不敢说“不是”。在一次座谈会上，他问陈永贵：“对富裕中农怎么看？”陈答：“富裕中农与地主富农差不多。”陈永贵认为这是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表现。廖鲁言从爱护这个先进典型出发，试图建立一种监督机制。当时全国又恢复了贫下中农协会，这是群众性的阶级组织，只要能发挥作用，

可以监督陈永贵。但他和贫协会领导座谈时，说的和陈永贵一个腔调，都不敢与陈永贵唱反调，原因是贫协会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工作，只能与支部保持一致，贯彻支部决议，不能与支部有不同意见。这是当时的体制使然。廖鲁言无奈，只好说，“反正是一个老太婆，说的都是一件事”，只好作罢。意思是只要能增产，陈永贵一人说了算，也行。可见，这种体制下的党支部书记无论上级还是群众都无法对他实行监督，相反还会遭来祸害，“文化大革命”中张润槐被陈永贵指控为“反大寨急先锋”，被斗得死去活来。

在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陈永贵更是有恃无恐，以权代法，以人代法，以言代法。陈永贵平时要求党团员“地里干活，手握镢头，两眼斜视，盯着别人”，严密监督，谁不服从陈永贵和大队干部领导，劳动消极，就实行群众专政。合作化以后大寨在田间、村里采用的“炒黑豆”就是一种办法，把被斗的人围在中间，推过来操过去，进行斗争。陈永贵以维护集体利益为名整治人，简直无法无天。1966年，大寨从内蒙古买回10头母马、1头种马，一天突然马群咬架，把种马一条腿踢折了；饲养员贾济元没提防，正巧社员李庆元、贾来顺撒化肥，回来在饮畜池洗了化肥的口袋，忘记清池，1头奶牛饮水中毒身亡。这是两件偶然事故，陈永贵却咬定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扣上了“有意破坏集体经济”的罪名，不分清红皂白，也不经过法律程序，立刻宣布，把这3个社员抓起来，用绳子捆上押送到县公安局进行审讯，并在村里多次进行批判斗争。贾济元是残废军人，他说：“就是我好提意见，老陈给我记下了仇。”

随着公社的解体，乡村政府的建立，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农村建设开启了新的阶段。但是，在大邱庄禹作敏那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弊端没有克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某些漏洞，却被充分利用了。众所周知，原来实行计划经济，商品按计划调拨，物资短缺，连干部的多吃多占都受到限制和约束。加之那时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即使心存邪恶的干部，也不得不瞻前顾后。进入90年代后，随着大邱庄的大发展，禹作敏的权力无限膨胀起来，他是党支部书记，又兼乡镇企

业总经理，集党、政、经大权于一身。在大邱庄他可以自己组阁，决定人事任免；可以根据家族亲信的利益配置生产要素。办企业是农民致富的捷径，但先决条件是要有厂房和地皮，这些都由禹作敏控制着，建工厂需要资金，更要由他划拨，即使从银行贷款，也得由支部领导担保。这是权力制约下的商品经济。他可以随时把权力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

陈永贵当党支部书记时掌握的权力，禹作敏都有，陈永贵当支部书记时没有的权力，禹作敏也有。土地是集体的主要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合作化后只能用来耕种，现在可以划出一片土地盖厂房“筑巢引凤”，招商引资，上新项目。划拨土地权也在禹作敏手里。从国内外引进资金，负责洽谈项目，只有书记兼经理的禹作敏才有资格。引来的资金、项目交给谁经营，只有禹作敏才能决定。因此，禹作敏要谁富，谁就可以富，禹作敏让谁先富，谁就可以先富。在大邱庄，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是禹的长辈还是小辈都称他是“书记”，他能决定每个人的命运。后来他兼任派出所指导员，具有执法权力，就敢以身试法。他怀疑外来民工有经济问题，竟敢私设公堂，用现代刑具惩治。出了人命，他竟敢包庇打死人的罪犯，干扰公安人员执行公务。

以上情况表明，在缺乏监督机制的情况下，禹作敏实际上已经成了“土皇帝”，其结果，虽曾以英雄、模范名噪一时，却以入狱服刑告终。

### “权力世袭”殃及子辈

大寨和大邱庄的权力，最后分别集中到陈永贵和禹作敏手中，而且这种权力由个人垄断，这就是专制。他们不想使自己的权力受到制约，而且要想尽一切办法终身掌权，甚至搞“世袭制”。陈永贵当大寨党支部书记就安排儿子陈明珠当大寨团支部书记。当年农业部长廖鲁言与大寨青年座谈怎样学“毛选”时，主要介绍经验的就是陈明珠。他说，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学不进去，是党支部书记（他父亲）指示如何对照本村的地主、富农学这篇文章，他才因此做到“活学活用”。这位初中未毕业的小青年，尽管没有“三大革命实践”，却可以当仁不让地接



禹作敏

他父亲的班。后来陈永贵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他这个儿子虽然不称职也当了中共昔阳县委宣传部长，结果随着父亲的陨落，他也下台了。

在“权力世袭”问题上，禹作敏与陈永贵相类似，他虽然要求改革，但不能触动他这个“庄主”的权力。他把已经掌握的大邱庄党政财文大权当作“命根子”，牢牢控制在自己和家族的手里。他和陈永贵一样也是先让自己儿子当团支部书记。他的小儿子禹绍政才20刚出头，虽然没有务农、务工的经验，他也急不可待地在他60岁那年“顺理成章”，让这个儿子代替他当了大邱庄（集团）公司总经理，事件发生后，父子双双入狱。

禹作敏事件发生后，天津市、静海县领导，首先对大邱庄实行“依法治政，政企分开”。镇党政领导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企业领导严格按照《企业法》办事。

上述陈永贵、禹作敏个人专权的悲剧与“权力世袭”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它告诉我们，在农村推行村民自治、“还政于民”是何等重要。只有让农村人民当家作主，才能有效地制约和监督这些农村干部。

研究中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专家学者认为，今后广大农村的发展还是走农民自治的道路。中央提倡的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农村市场经济，改革税费体制，改革行政和事业管理体制，健全农村法制，加强对农民的培训等，目的就是引导农村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责任编辑 程 度）

台北故宫博物院，是1965年台湾当局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在台北市郊建中山纪念堂时，同时建成的。当年11月，中山纪念堂、故宫博物院同时宣布开幕。

自1933年，故宫古物南迁，跟随古物的一批学者和行家里手，押运着近两万箱故宫历代皇帝收集的无价之宝，在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往来跋涉一万多公里，未曾遗失或打碎一件古物。古物的六分之一计2972箱，约239000余件，1948年被运到台湾。在这战火纷飞的15年中，故宫国宝的沧桑历史，记载很少。而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于1982年采访了当时跟随古物的三位学者，撰写了《故宫国宝话沧桑》一文，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

美籍华人张君（笔者同学）寄我一份，现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1924年11月5日，中华民国政府限令18岁的逊清末代皇帝溥仪半日后离开紫禁城皇宫。溥仪离去后两周，一小批大学教授和学者由学生襄助开始点查宫内的珍宝。工作人员中那志良19岁，刚离开校门；吴玉璋20岁，是位大学生。几百万件古物都要清点登记，除了瓷器、玉器、铜器之外，还有一部共七万九千多卷的四库全书。清点工作进行了一年之久。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自明代中叶以来，不准老百姓擅入的紫禁城就此开放。到了1931年，日本侵占了东三省，他们一下子就距离北平只有240公里。政府通知博物院把最有价值的艺术品速行南运，以策安全。

要决定什么应该运走，什么要留下，是个艰巨的任务。那志良说：选件固然重要，如何保护古物不会因撞击、受潮、过干和白蚁为患而损坏

又是另一回事。最后我们把北平城内的古玩专家找来，教导古物包装的方法。装箱的工作差不多进行了一年多时间。1933年春才竣事，共装了19557箱，每箱1米长、50厘米高和宽。由火车南运，由若干工作人员押运。除了专家和武装守卫之外，列车上并没有其他客人。

1933年2月5日晚间，从紫禁城到车站沿途，日落时分就开始戒严。那志良回忆说：“他们吩咐我们，要等到天黑才启运。由几十辆板车轮流运往车站，由军队护送，沿途军警林立，板车

在熟悉的街道上行驶，街上空无一人，除了车子急驰的辘辘声之外，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使人有奇怪的感觉”。

大家连夜静静工作，把箱子都装上两列火车，黎明时分开车南下。一路只在添煤、添水时停车，那志良说：“每次停车，我们就下车沿着铁轨，由前跑到后，把每个车箱的封条，都检查一次。”

两天后，载运古物的列车到了浦口，停在靠边的轨道上。那志良说：“军队守卫列车，一

直守了一个月。因为南京没有适当地方收藏这些国宝。”最后，由水路把这批国宝运往上海。在上海存放了近四年。在这个时期，南京扩建朝天宫以贮存这批国宝。

1936年底，朝天宫扩建工作完成，工作小组也就留在南京办公，还计划举行展览会。但中日战争在1937年7月又爆发了。7月29日日军占了北平，这时南京也有危险。中国政府迁往长江上游2087公里外的重庆，并下令撤退古物。

同时运所有的古物根本不可能。工作人员分为三队。他们要尽快分途离开南京，到达目的地后，静候战争结束。

那志良随同第一队离开了南京。那队的80



箱古物由船和卡车运往 1000 公里外到达长沙湖南大学的图书馆。不久又接到命令要他们离开长沙。

“这真是英明之见”那志良说,“我们离开才不过一个月,湖南大学就被轰炸,夷为平地。”

几星期后,向西南走了 930 公里到安顺县,在城外找到一个天然洞窟。他们把洞窟加固,在洞里建办公室和贮藏库。至此这一队长途跋涉已经一年多了。

南京方面,杭立武当时是中英文化协会总干事,获委负责办理古物搬运。每箱都贴有装箱和点验者签名的封条,每个封条都照了像,每次开箱时,都要经过同样的手续。

杭立武说:“这时候南京市内人心惶惶,几十万人都在设法逃离南京,找运输工具和挑夫都极端困难。”不过杭立武终于设法包了一艘英国太古公司的船,把第二批古物运往汉口。

日军继续进逼,第二队又从汉口转移内地,到翌年秋季才到达陪都重庆。1939 年春,日机轰炸重庆,几乎炸中这些国宝。古物箱又再装船,这一队再向长江上游西行 500 公里到乐山去。他们到达宜宾还没有问题,可是在那里又需另找交通工具。船只难找而且光是把古物从原来的船上卸下再装上另外的船只,就花了近两个月之久,结果九月中旬才到达乐山。

最后一批 7000 多箱由吴玉璋和另外二人负责。他们设法在日军进城时恶名昭彰的“南京大屠杀”之前一个星期搭火车离开南京。南京市内日军奸淫虏掠血洗全城,屠杀无辜平民至少有 30 万人。

载运这批古物的火车,到了徐州停车添煤、加水。“我们的列车刚到站内停下,日本飞机就出现了。”吴玉璋回忆说,我们当时就知道迁运刻不容缓,而且越远越好。

第二天到了郑州,吴玉璋下车去和站长商量调拨火车事宜。等他回货运调车场时,见到几列车陷于火焰中。“我真急疯了”,他说,甚至于在追述这件事时,人还很紧张。“我找不到我们那列火车。向人打听,一个人说见到那列火车烧了,另一个说爆炸了,我觉得一切都完了!最后,我发现驻军已把火车开走,我后来又回到那列

车上。从那时起,我才知道大家和我们同样关心国宝。”

大约一星期后,奉令前往支援其他运送古物队的那志良在西安遇上了吴玉璋,两人一起到宝鸡去,因为吴玉璋所押运的那批古物,已经到了宝鸡。这批古物存放在两所大庙里,由地面到房顶堆得满满的。吴玉璋的家眷,这时也已逃出沦陷的北平,到达宝鸡。

宝鸡吃紧时,他们又要前往 170 公里外的汉中。其中要越过海拔 3000 米的秦岭。这时运输工具都要额外加钱。两地之间没有铁路,只能用卡车装运,每辆卡车至多能装载 20 箱左右。花了 48 天总共装了 300 多车,才把他们押运的古物全部运达汉中。可是这时汉中也不安全,一个半月后,他们又奉命把古物运往成都。

成都在 500 公里外。路上过河而没有桥,只好造木筏暂充摆渡。十个月后到达成都,发现成都的情况不理想。城市很大,地势平坦,没有坚固的楼宇,也没有山可以挖山洞。

“我们要找个可以安定下来的地方”那志良说,“一个可使我们安定过日子的地方。”古物再次启运,这次是运往 150 公里外的峨嵋县城,那里安谧,有很多庙宇。这一队就在峨嵋的那两座大庙里住下。一住就是七年。后来在成都开过展览会。他们开箱取出古物,首先取出清宫所藏几万本价值连城的古籍。这些古书必须要过过风。

1942 年,那志良自 1933 年便别离了的家眷——太太和三个孩子,从北平逃出与他团聚。“那好了”,他回忆说,“我们一家又在在一起了。”

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投降。经过 12 年离乱,古物终于可以回南京了。可是战后运输工具缺乏,不能冒险在崎岖的道路上运回古物。到 1947 年 3 月,三个队才离开战时的避难所,在重庆集合。

1947 年初夏,全部古物和人员终于由九艘轮船沿江顺流而下运回南京。他们立即恢复中断了九年的工作,把国宝运入朝天宫扩建的部分,开箱整理并且开设一个临时展览厅。

不论他们的生活多么艰苦,博物院工作人员始终团结一致,一心保护这批国宝。不管个人

的政治信仰如何,他们始终比肩抗日。但对共同的敌人作战几乎刚刚停止,蒋介石又挑起内战,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军事上占上风,又取得人民的支持,博物院的职员也不例外。

1948年徐州会战后,南京受到威胁,蒋介石计划在台湾建立最后立足点,于1948年11月决定将故宫国宝和南京中央博物院、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的藏品,及外交部部分重要档案也合并一起运往台湾。但当时可以运送这些珍贵古物的只有两艘军舰和一艘商轮,只能运送其中一部分,无法全部运走。不得不作进一步的决定。

1933年,他们从北平运出19557箱,这时只选出2972箱,大部分是清宫收藏的精华,包括历代名画及书法、清宫全部藏书和最精美的宋

瓷。总数约只是故宫国宝的六分之一。其余的不得不留在南京(其中大部分现在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到达台湾后,古物最初贮存在台湾中部工业中心台中市的糖厂仓库里。但这些仓库也不是储放国宝的理想地方,于是在50年代初,这批珍藏又迁移到附近一个名叫北沟的小山村。在北沟存放了差不多15年,直到1965年11月在台北市郊的孙中山先生纪念堂及故宫博物院新址建成并宣布开幕。

现今台北故宫博物院已成为亚洲著名展览馆之一。中国艺术文物藏品共有60余万件;书画5749件;善本书150688册,其中有历代重要刻本、佛经、藏文喇嘛经和满蒙文史籍。

(责任编辑 元璋)

## 代 购 代 邮

一个时期以来,函询季羨林、李锐、韦君宜等同志作品的读者日益增多。为方便读者,现就以下订购较多的书籍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 书 名                | 作者或主编      | 定 价   | 邮 费  |
|--------------------|------------|-------|------|
| 季羨林人生漫笔            | 季羨林        | 21.00 | 3.00 |
| 牛棚杂忆               | 季羨林        | 19.50 | 3.00 |
| 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 徐 葵 张达南 译  | 28.00 | 4.00 |
| 百年聚焦               | 史义军        | 59.80 | 6.00 |
| 世纪三伟人              | 龚育之等六人     | 28.00 | 4.00 |
|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 萧克 李锐 龚育之等 | 28.00 | 4.00 |
| 直面人生               | 戴 煌        | 19.80 | 3.00 |
|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 戴 煌        | 21.00 | 3.00 |
| 李锐反“左”文选           | 李 锐        | 22.80 | 4.00 |
|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 杨奎松        | 29.80 | 4.00 |
| 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         | 何 载        | 15.00 | 3.00 |
| 大转折的日日夜夜           | 张湛彬        | 80.00 | 8.00 |
| 毛泽东最后十年            | 陈长江 赵桂来    | 17.00 | 3.00 |
| 中华传统美德格言与故事        | 许启贤        | 23.00 | 4.00 |
| 石破天惊               | 张湛彬        | 29.00 | 4.00 |
| 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的自述   | 温济泽        | 22.80 | 4.00 |
| 思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            |       |      |
| 原上草                | 牛汉 邓九平     | 24.00 | 4.00 |
| 六月情                | 牛汉 邓九平     | 25.00 | 4.00 |
| 荆棘路                | 牛汉 邓九平     | 23.00 | 4.00 |
| (购买全套《思忆文丛》邮费7.00) |            |       |      |
| 海 丝                | 杜明明        | 28.00 | 4.00 |
| 龙文化与民族精神           | 鲁淳 王才 冯广裕  | 20.00 | 3.00 |

《温济泽的自述》 一个老共产党人的肺腑之言。本书纪录的有他亲见的许多中共党史重大事件,有他对友谊往来的政治风云人物。他对瞿秋白、李维汉、博古、周扬、胡乔木等人的追忆、评价,尤其引人注目。

《石破天惊》 记叙了以下内容:胡耀邦为什么要给“右派”平反;陈云为什么提出康生有问题;为什么只有290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华国锋是怎样离开最高权力顶峰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怎样一步一步被突破的。

《思忆文丛》 收集了1957年的文章200余篇。以此献给曾亲历和未亲历的读者,“以往鉴来”以期从这有骨、有肉、有血的材料中育出更多更富创造性和智慧的俊才。

欲购者可直接将书款汇至炎黄春秋杂志社。社址:北京东城区戏楼胡同1号,邮编:100007,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 天津市收容乞丐纪实

□ 周利成

乞丐问题是中国数千年来无法根治的痼疾。天津解放伊始,大量游民乞丐和散兵游勇涌进城来,他们声称,解放了,穷人翻身了,乞丐也可以挺直腰板,理直气壮地去向富人们讨要了。一些职业乞丐讨要手段强硬粗暴,按时定价,张口就要50元。而商号、店铺不了解政府的政策,对乞丐的强乞恶讨不敢违抗,因此,1949年5月,天津市人民政府为迅速恢复和稳定社会治安,在华北人民政府的指导下,对游民乞丐开展了大规模的突击收容和清理。

## 天津丐情

在天津活动的乞丐主要有丁门、韩门和祁门三大组织,以祁门的人数最多,活动最广,声势最大,其次是韩门,全市约有乞丐1.5万人。

天津解放伊始,有些乞丐错误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共产党来了,穷人解放”。加之,国民党特务到处散布“共产党来,富人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乞丐是无产者中的无产者,是新社会的大老爷,说出话来就是金口玉言,要到哪个商家都得给”等等,商家也不敢得罪乞丐,对他们的强乞恶讨也不敢违抗。这样便助长了乞丐的嚣张气焰,为迫使商人们“施舍”,乞丐有意在商铺门前“设防”,拦阻购物顾客进门,直到商人“出血”才予放行;对待不予施舍的店铺,他们采取砸玻璃窗、在店铺的门面上涂抹粪便等手段进行报复。由于他们的强讨恶要,有的商号店铺一天营业额竟不够打发“花子”的。福隆绸庄每天用于应付乞丐的费用约为四五百元,遇到年、节、假日,此项花费就得提高一倍;戴林春线店、永兴裕鞋铺的日营业额均为600余元,而应付乞丐的支出就得700元。因此,戴林春线店、华丰鞋店、庆兴钱庄等一批商号,纷纷被迫关门歇业。一家商店因乞丐太强硬而报到街道,街长将

乞丐申斥后又放出。乞丐便得到了报复的机会,他们跑到该商号的门前骂街、抹狗屎,躺在地上不让顾客进门,该商店终于吃不消了,经理亲自出来赔礼,如数给了钱,才温言暖语地送走了他们。后来各商家为减少麻烦,与乞丐们商定好,每条街由一个或几个乞丐头包下,每天各商家派一个代表将准备好的钱定时送到,这样乞丐便只需坐等收钱了。

据调查,每天每名乞丐收入多则三四百元,少则也要百余元,按100元计算,他们的支出是这样的:30元的饭费、20元的宿费、10元的香烟费,其余的或喝酒或嫖妓,或积蓄两日,第三日即可不出门讨要了。乞丐的收入比卖苦力蹬三轮的车夫及摆摊的小商贩要高出几倍,因此,天津市当时竟出现了一些下层劳动者竞相转业当乞丐的怪现象。

游民乞丐的活动,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慨,尤其是那些深受乞丐之害的商人更是对乞丐深恶痛绝。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联名上书人民政府,派代表到民政局,痛陈乞丐对社会的危害,迫切希望人民政府能彻底解决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给天津城乡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天津商会为支持政府对游民乞丐的收容工作,表示愿意捐资,筹措经费,协助政府共同清理。

## 收容准备

在收容游民乞丐之前，天津市政府结合肃清敌特和残匪的中心工作，首先收容了流窜至津的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1949年1月下旬，市公安局向下属各分局发出指示，要求立即开展对流亡人员的调查登记，并同时收容散兵游勇。同年3月18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彻底清理游勇散兵及其他匪军人员的决定》，至7月，共收容国民党军散兵游勇18970人。

三四月间，市政府对乞丐重点区一、四、七、九、十一诸区做了初步调查，组织公安、民政及有关社会团体对华北人民政府下发的《华北区城市处理乞丐暂行办法(草案)》进行了讨论，并结合天津实际情况研究了清理乞丐的具体意见。在经费问题上，在尚未决定是募集还是财政开支之前，先做募集准备，与商业界代表几次研讨，并大致制定了募集方案。经过三次修订，5月13日，华北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了《华北区城市处理乞丐暂行办法》，明令在城市中“严禁强乞恶讨及以乞丐行业授徒，或组织乞丐从中渔利等行为，违者由公安纠察队逮捕强制入所”，确定收容所的各项经费，由财政开支。《办法》公布后，全市立即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天津日报》、广播电台均发表消息，号召乞丐转业参加生产劳动。

5月21日，成立了有公安、民政、财政、法院、卫生、工商、工务、纠察总队、总工会、学联、妇联、青委会等单位组成的“天津市收容处理乞丐委员会”，在第一区罗斯福路230号开始办公，作为清理游民乞丐的专门领导机关，配备了干部。此后，又设置了5个临时收容所，分别收容各区乞丐。

5月25日，天津市收容处理乞丐委员会依照华北人民政府确定的“一面收容，一面处理，逐步肃清”的方针，在全市范围内对游民乞丐进行了突击收容。收容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5月25日至28日，主要收容了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乞丐和以授徒为业的职业乞丐，采用

动员自愿入所和强制入所相结合的收容方法。四天内共收容乞丐464名，(男448名，女16名)，其中青壮年和职业乞丐390名。根据前四天的收容情况，收容委员会发现全市乞丐的实际数量比预计的要少，5个收容所可以容纳当时滞留本市的所有乞丐，所以，从29日收容工作进入第二阶段，即开始全面收容，除青壮、职业继续收容外，凡老弱、残废及妇女乞丐，均在被收容范围。由于大部分乞丐离开天津或转业，至7月31日，全市共收容乞丐1594名，一时流动在市面上的乞丐基本肃清。

这1594名乞丐，既有失业工人、知识分子，也有逃亡地主、盗贼和娼妓。为便于管理，收容处理委员会将乞丐按性别、年龄、体力分成青壮年、老弱、残废、妇女、儿童5类，分别送到5个收容所，实行“分类编制，分所管理”的方法。

入所后，乞丐的思想波动很大。自动入所的，想让政府给找一份工作，进所后精神愉快，劳动积极，有些是听天由命，只要有饭吃饿不死就行。强制入所的顾虑较大，他们害怕当兵、害怕下煤窑、害怕骨肉分离。一些职业乞丐仍有“无一行不成世界”、“乞丐要饭天经地义”的思想，他们一入所就想伺机逃跑；有的不吃饭、不说话，有的妇女乞丐则整日啼哭，还有几名老年妇女跪在地上长久不起，要求回到自己的窝铺里。针对乞丐们的思想顾虑，委员会采用了“揭穿谣言，搞通思想，参加劳动，自食其力”的教育方针，明确指出：1. 不抓兵；2. 不拆散家庭；3. 保证吃得饱；4. 组织参加劳动也是为乞丐自己；5. 不是像日本一样抓苦工；6. 既往不咎，绝不追究乞丐过去的罪恶(因为他们怕被判罪)。采取上大课、分组讨论、个别谈话等教育方法。

在生活上最大限度地给予他们关怀。改正乞丐散漫无纪律和惰性恶习，提高其服从领导和自己管自己的自觉性。各收容所制定入所规则，规定乞丐入所后要服从领导，不得随便出门，遵守作息時間，不得随便大小便，保持所内清洁，禁止打架吵嘴。乞丐入所一律理发、洗澡，酌予补充、借给衣服、鞋、被等物，声明物品不作“恩赐”，将来要乞丐无利偿还，目的在于鼓励教育他们参加劳动。供给标准是：早晚两餐，初定

每人每天一斤半小米(柴菜在内)。向他们讲明过去行乞是受剥削受压迫的结果,寄生思想的耻辱,人要生存就必须劳动,不劳动者不得食。乞丐们通过思想教育与自身入所前后的对比,逐步提高了认识,树立起劳动的观念,并主动提出要与过去划清界限。第五收容所的职业乞丐宋雁和说:“刚要饭时被人打骂欺侮十分苦。日子长了学会耍赖,又拜了师父郭小小,在外面就不受气了。但受师父的打骂更厉害,要回来的东西得交给他,自己只得很少的钱。收容所真是好,吃喝都比外面强。”他主动检举了师父的罪行,并要求收教干部赶快将其收容管制。

委员会积极组织乞丐参加文娱活动,使他们从中受到思想教育。一些在旧社会专靠唱数来玉、打竹板进行乞讨的乞丐,在收容所内编写了新内容的数来宝,歌颂人民政府的英明伟大。让乞丐们组织起来,编成一支秧歌队,分别于6月5日、22日,上街演出,受到市民群众的欢迎,很多商户自发地拿出烟、茶、糖果招待他们,乞丐很受感动,他们说:“以前没有人把我们当人看,没有人理我们,现在我们也受到人民的欢迎。我们一定要好好接受教育改造,争取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新人,重新回到社会中来。”柴东洋行经理石架门(苏联人)说:“我在中国有40多年了,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游行,共产党是任何党不能相比的。在国民党时,他们不办正事,每天有很多乞丐来纠缠我,这还是小事,穷人无依无靠是大事。今天他们又有饭吃,将来又有出路,这都是共产党的德政呀!”

7月,委员会将有劳动力的青壮年乞丐近200人组织起来,编成两个劳动大队,队下设排,排下设班,分别赴芦台农垦局开荒和留在市内清理海河河槽垃圾,乞丐们逐渐树立起“劳动光荣,寄生可耻”的观念。

依照“一面收容,一面处理”的原则,分类分批地妥善安置处理乞丐。1. 家在外地的,动员返乡生产,组织成队,遣送回籍;2. 散兵游勇由纠察队及公安局送流散人员处理委员会;3. 无家可归而有劳动力的男子编成劳动大队;4. 无家可归的老、幼、残及妇女送生产教养院;5. 业经改造,有谋生能力的,可准其自由就业,市政

府给予便利;6. 家在本市,经短期教育后交由家人取保领回,从事生产;7. 职业乞丐及以乞丐行业授徒者,严加管教,有罪行的乞丐头儿送法院审判。其中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乞丐1218人,取保回家的345人,送生产教养院的88人,散兵游勇32人,死亡3人,潜逃58人,送法院2人。

8月1日,天津市收容处理乞丐委员会正式撤销,第一、第四两个临时收容所随即撤销,第二临时收容所改为劳动大队宿舍,为收容无家可归的老、弱和妇女乞丐,仍保留处理乞丐工作,由生产教养院负责。

此后,由于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加之连年自然灾害,天津街头再次出现游民乞丐,天津市生产教养院继续收容存留本市和从外地流入的游民乞丐7911人,并进行了妥善的安置和处理,从而使天津长期存在的游民乞丐问题基本得到根治。

(责任编辑 舒元璋)



街头行乞的男性乞丐

# 读《中国反贪史》

## 三 叹

读了《中国反贪史》，余有三叹焉。

### 一

一叹：贪官污吏何其多也。

贪污是腐败的核心，也是其主要的表现形式。我国以历史悠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奈的是，我国贪污犯的资格之老，在全世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夏、商、西周，号称“三代”，建立在广大奴隶血泪、枯骨之上的“家天下”政权，就其国家机器的完备来说，一代强似一代。但是，远在夏朝末年，贪贿风气已很严重。据《荀子·大略》记载，当时成汤求雨的祷词中，提及六件失政之事，三项便是贪贿问题。这是他鉴于夏朝骄奢淫逸、横征暴敛导致灭亡的教训，而有所警惕的表现。可是，到了商末，恶名昭著的帝辛——也就是殷纣王，大肆聚敛，奸佞费仲、恶隶都是大贪污犯。文王被囚于羑里监狱时，周人正是通过费仲，向纣王贿赂珍宝、美女、良马，纣王大悦，释放了文王，放虎归山的结果，最终导致殷商王朝的崩溃。与其相类似的是，春秋时，吴国太宰嚭受贿亡国，其教训也是广为人知的。被吴国打得“败鳞残甲满天飞”、岌岌乎殆哉的越国，“饰美女八人，纳之太宰嚭。”并进而煽情说：“你若肯帮助，还有更美于此者。”帮助什么？求和也。太宰嚭贪污了八位美女，并指望笑纳“更上一层楼”的越国漂亮姐，便鼓其如簧之舌，说服吴王夫差许越求和，从而吞下了致命的苦果：养虎贻患，越兴吴灭。

古汉语中有“贪墨”一词。墨，古义是不洁之称。历代贪官当然都是些一屁股屎、心黑如墨之徒。他们的贪婪峻刻、残民以逞，有时真出乎常人想象之外，简直成了笑话。据《五代史补》记载，五代时赵在礼在宋州做官，贪暴至极，百姓苦不堪言。后调往他处，百姓互相祝贺，说：“拔掉眼中钉了！”不料消息传到赵在礼耳朵里，他向上司要求，仍调回宋州，每岁户口，不论主客，都征钱一千，名曰“拔钉钱”，宋州父老哭笑不得。值得指出的是，有些贪官虽然心狠手辣，却满嘴仁义道德，俨然一尘不染，实际上，就像鹭鸶一样，“飞来疑似鹤，下处却寻鱼”。明朝有个贪官更堪称典型。明明想大捞一把，却装成分文不取，刚上任时，煞有介事地向神发誓说：“左手要钱，烂了左手，右手要钱，烂了右手。”但不久，有人送来百金行贿，他假惺惺地不收，说“我对神发过誓。”他的手下人当然知道这位顶头上司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赶忙凑上去说：“请以此金纳官人袖中，便烂也只烂了袖子。”这个贪官立即采纳部下的建议，赶忙将银子装进袖里，从此来者不拒，照收不误。（明·冰华生：《雪涛小书》）可见贪官是多么卑劣！

而某些贪官的胃口之大，伸手之勤、远、宽，用疯狂二字，也不足以形容。

据《旧唐书》卷82李义府传记载，此人“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亦即不笑不开口者；但对那些稍微对他有点抵触情绪的人，便动辄加以陷害，故当时人们说他“笑中有刀。又以

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这便是成语“笑里藏刀”的由来，李义府真是永臭不朽矣。但“李猫”也好，“笑中有刀”也好，李义府决非仅系猫态狼心、迫害政敌之笑面虎而已。更令人发指的是，他当上宰相后，贪污受贿，卖官鬻爵，连其母、妻、诸子、女婿，无不卖官，“其门如市”，“倾动朝野”。（《资治通鉴》卷200）呜呼，此“猫”，此“刀”，又何其毒也！现代国人对日寇的“三光”政策记忆犹新。但谁能想到，我国古人中竟有人实行过四光政策；不过，当时叫“四尽”。此人就是梁武帝时历任南谯、盱眙、竟陵太守的大贪官鱼弘。他常常得意忘形地对人说：“我为郡，所谓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麋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他娶了一百多个小老婆，“不胜金翠，服玩车马，皆穷一时之绝”（《梁书》卷28鱼弘传）。

不过，这些贪官比起封建社会后期权倾朝野的大贪官——如明朝的刘瑾、严嵩、魏忠贤，清朝的和珅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刘瑾被称为“立的皇帝”（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3），简直有与“坐的皇帝”正德爷并驾齐驱之势，其权力之大，可想而知。百官见他即不觉下跪，甚至有个叫邵二泉的无锡人，和同官某因公事往见刘瑾，刘瑾怒斥此人时，邵二泉竟吓得两腿发软，站立不住，尿都吓出来了。（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史四》）对于贪官来说，权力与贪贿是成正比的。权力越大，贪得越多。刘瑾垮台后，所抄家产的数字，据明代高岱《鸿猷录》记载，计：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元宝五百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两斗；金甲二；金钩三千；金银汤鼎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袭；玉带四千一百六十束；等等。这不能不是个惊人的数字！但是，倘若您读一读《天水冰山录》——也就是嘉靖时的权相严嵩倒台后的抄家物资清单，您就更会大吃一惊！其中黄金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一两六钱五分，纯金器皿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万一千零三十三两三钱一分，金嵌珠宝器册共三百六十七件，重一千八百零二两七钱二分，更有价值连城的古今名画手卷册页达三千二百零一轴卷册……真个令人眼花缭乱。至于明末恶名昭著的人

称九千九百岁的大宦官魏忠贤，被崇祯皇帝扳倒后的抄家数字，因为崇祯皇帝未予公布，至今仍是谜。但是，据《明史·樊玉衡传》记载，时人估计“籍还太府，可裕九边数岁之饷”。又有人估计，刘瑾贪污所得，折成银子是五百万锭，而“忠贤赃七百万锭（清·褚人穫：《坚瓠集》·广集·“刘魏合辙”）！需要指出的是，明代俸银不多，用现代的口语说，是低工资。洪武中定内外文武官员俸饷时，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而宦官月俸米只有一石。以后大体成为定制，纵然有所增加，数量毕竟有限，他们的贪污所得，比起工资收入，不啻是个天文数。至于和珅，野史传闻他被抄家的财物，达白银八亿两以上。这无疑是夸大了。据当代史家研究，和珅除了珍藏的文物字画，难以估算外，其他的财产，“当在一二千万两之谱。”（冯佐哲：《和珅评传》第301页）这同样也是个惊人的数字，难怪当时有人说他“富可敌国”。

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曾经指出：“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日知录》卷8“吏胥”）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官是蟹壳，胥吏是蟹脚，没有蟹脚，岂能横行？吏治的好坏，不仅事关朝廷形象，甚至关系到王朝的兴亡。三国时东吴末年，吏治大坏，百姓怨声载道，恨不得吴政权立刻垮台。故晋军伐吴时，孙吴军迅速土崩瓦解。晋人葛洪在总结吴国灭亡的教训时说，“用者不贤，贤者不用”，“不开律令之篇卷，而窃大理之位；不识几案之所置，而处机要之职；不知五经之名目，而殍儒官之禄。”（《抱朴子·吴失篇》）呜呼，吴国的官也吏也，竟一塌糊涂到这种地步，吴国又岂能不呜呼哀哉！就连一脑袋糨糊的昏君孙皓在临降前，也哀叹“不守者，非粮不足，非城不固，兵将背战耳！”（《三国志》卷48《吴书·孙皓传》）这是人心丧尽的必然结果。其实，早有史家指出，我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王朝，是亡于“刀笔之吏”，以后历代王朝的灭亡，都与此痼疾有关。明代胥吏多而滥，顾炎武曾痛斥曰“养百万虎狼于民间”（《亭林文集》卷1《郡县论八》）。有此百万虎狼在民间虎吼狼嗥、茹毛饮血，百姓在死亡线上的呻吟、呼号，可想而知矣！

二叹：清官何其少也。

翻翻廿四史，人们就会明白，有名有姓并且货真价实的清官，不过几十位。明末清初优秀的文学家、史学家张岱，在所著《夜航船》卷7“清廉类”，扳着指头数了很久，也不过只找出四十位清官。物以稀为贵，况人乎！这些清官的相关事迹，大部分都很感人。如：北齐彭城王攸自沧州召还，老百姓纷纷拿着食物欢送他，说：“您在沧州，只饮这里的水，从未尝过百姓的饭菜，今天我们谨献上粗茶淡饭。”高攸很感动，但也仅吃一口，不愿占百姓的便宜。又如：隋朝赵轨在齐州做官，后入京，父老送别，说：“公清如水，请饮一杯水，以代替我们献钱。”赵轨愉快地一饮而尽。80年代，有一出京剧《徐九经升官记》，后拍成电影，轰动一时。徐九经是确有其人的。他在江南句容当县令，任满后调走，百姓恋恋不舍，说：“公幸训我！”徐九经答道：“唯俭与勤及忍这三个大字。”他曾经在大堂上画了一棵菜，上题：“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无此味。”徐九经走后，百姓将他画的菜刻在石上，并写下勤、俭、忍三字，称为“徐公三字经”。这三个字，在中国政治史上实在是可圈可点。不能甘于清贫淡泊，当不了清官。战国时魏国的邺令西门豹，“清刻洁懿，秋毫之端无私利”（《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真是难得。他的治水投巫、破除“河伯娶妇”恶俗的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披鳞直夺比干心，苦节还同孤竹清。龙隐海天云万里，鹤归华表月三更。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草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2引《座右编》）——这是明代苏州人朱良写的歌颂海瑞的诗。这与一般颂诗，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因为：万历十五年十月（1587年11月），七十四岁的海瑞以老病之身卒于官舍后，他的同乡苏民怀检点其遗物，只有竹笼一只，内有俸金八两，旧衣数件而已。时人王世贞以九字评之：“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明·周晖：《金陵琐事》卷1）朱良亲眼目睹海瑞如此简朴的行囊，以及士大夫凑钱为海瑞买棺的情景，感慨万分，惟恐后世人不相信有

这等事，特地写下这首弔海瑞诗，以期与山河作证，让海瑞的两袖清风，长留人间。事实上，海瑞生前生活俭朴到一般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的私章用泥巴刻成，夏天睡在一张破席上，盖着夫人的旧裙，以至有道学家攻击他是“伪”，这无疑是对海瑞的污蔑，这种人是无法理解海瑞的。

清官少的原因之一，是难过家庭关。清官张玮曾经慨乎言之：“为清官甚难！必妻子奴仆皆肯为清官，而后清官可为，不必则败其守矣。”（清·余怀：《东山谈苍》卷3）难得的是，张玮家人都理解、支持他。张玮病歿京师后，其棺运抵毗陵（今常州），因无钱下葬，只能停于荒寺。家中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其妻患病，无钱抓药，后竟饥寒而死。惟其如此，不甘沉沦于腐败泥淖者，不得不挖空心思安抚子女。明代前期陕西三原人王恕，历任刑部侍郎、左都御史、吏部尚书等职，掌权五十余年，寿至九十三岁。他为人刚正清严，始终一致。他的儿子见他两手空空，面露难色。王恕对他说：“你怕穷是不？咱家历来有积蓄，不需要做官时像粮仓里的老鼠那样。”他引其子到后宅，指一处说：“这里是藏金的地方，有一窖金。”指另一处说：“这里是藏银的地方，有一窖银。”他死后，其子去挖掘，“皆空窖也”。（明·李中馥：《原李耳载》卷上）王恕为保持清廉品节，真是煞费苦心。事实上，历史上的著名清官，其妻、子无一不是甘于清贫者，有的人还能与其夫或父互相砥励。如婺源人江一麟，在地方做官有廉声，被调至京中任部郎。其妻便能常常“善善相规，施德于民”（清·龚炜：《巢林笔谈》卷2）。而反过来，倘若高官之妻儿、部下，成天念叨好吃好喝，穿金戴银，并与他人比较，说某人仅为七品小官，现已置下粮田千顷，某某仅为县主簿（相当于今之秘书科长），已置下绸缎铺、当铺、木材行；僚属则动辄说有权不用，过时作废，过了这村，便无此店，赶紧能捞则捞，反正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天网虽大，毕竟多漏。在这样的氛围中，为官欲冰清玉洁，又谈何容易！

清官的精神风貌，还不止于清廉自守。他们不惜丢掉乌纱帽，毁了所谓锦绣前程，甚至不惜牺牲身家性命，与贪官污吏、豪强权贵抗争；更有甚者，有的清官敢于批逆鳞，犯颜直谏，抨击

皇帝的误国政策、荒唐行为，这又多么需要无私无畏！如宋代的包拯，进谏时“反复数百言，言吐愤疾”，溅了仁宗皇帝赵祯一脸唾沫星，直到他将错误任命“罢之”为止（宋·朱弁：《曲洧旧闻》卷1）。这样的刚正不阿，难怪当时京师吏民畏服，称颂“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0）。又如明代，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度发展，皇帝被进一步神化，导致君臣隔阂，大臣见皇帝，竟以召对为可怪，一逢召对，便手足无措，只知道连呼万岁，赶紧磕头。而至明中叶后，某些大臣觐见时简直如坐针毡，甚至当场吓得昏死过去，大小便失禁。（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但是，偏有不怕死的清官，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批所谓龙（皇帝也）身上的逆鳞。海瑞骂了嘉靖皇帝后，备好棺木，诀别妻子，准备慷慨赴死，已为人们熟知；天启二年（1622）四月，御史帅众在奏疏中竟然敢于批评“内外朝万岁呼声聒耳，乃巫祝之忠”，这又需要何等的胆识！果然，天启皇帝阅疏后大怒，说“帅众不许朕呼万岁，无人臣礼！”（明·叶向高《蓬编》卷12）幸亏首辅叶向高多方保护，帅众才幸免于难。这种大无畏的气概，是“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的生动表现。封建社会的官吏，几乎无官不贪，枉法者不可胜数。海瑞等人能不贪赃枉法，仅此一条，已堪称出污泥而不染，香清溢远，流芳百世了。

但是，历史已进入21世纪，如果进一步用现代眼光审视清官，用一位著名史学家的话来说，“清官乃不祥之物”。当百姓手中无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时，才会在绝望中盼救星，呼唤青天大老爷能爱民如子。因此，最好的清官，仍然是老爷，最好的百姓，不过是儿子。什么地方百姓大呼包青天之日，一定是他们已经被侮辱、被欺凌之时。显然，清官是封建时代茫茫黑夜里的昨夜星辰，他们绝不代表未来。在健全的法制社会里，人们凭借法律来保护自己，而无需乞灵于清官。愿早日走出清官时代！

### 三

三叹：改革家怎能忘记脏乱死多门！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名垂青史的改革家，但

其中有些人，结局悲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出污泥而有染，忘记脏乱死多门。他们一方面从事政治、经济改革，一方面自己又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从而授人以柄，为反改革派的反攻倒算，打开了缺口。如西汉著名政治家、经济改革家桑弘羊，其盐铁官营专卖、设立平准、均输机构等一系列经济思想和措施，对以后我国封建工商业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但是，他居功自傲，处心积虑为自己的兄弟谋取高官厚禄，名将霍光反对这样干，他怀恨在心。贪欲恶性膨胀的结果，最后竟与上官桀等人勾结谋反，败露后被杀并灭族（《汉书》卷24下）。又如唐中叶著名经济改革家、两税法的主要创始人杨炎，对唐代乃至后世的封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的儿子杨弘业，在其庇护伞下，多次犯法，接受贿赂，走后门，通关节。杨炎本人，更利用宰相职权，仗势强压下属官员买卖私人宅第，高价估价，低价结算，从中谋利，当时的御史们认为，杨炎用权力谋来的差价就是赃物。他被罢官，贬至崖州，还没到达，就又被唐德宗派人处死。

明代改革家张居正的悲剧，更具有典型意义。

张居正的政治、经济改革，是以半途而废告终的。他病死不久，政局即迅速逆转：其官秩被追夺，家产被查抄，当政时起用的主要官员“斥削殆尽”，改革派的政治力量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呕心沥血实行的改革，基本上被一笔勾销。“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场政治大悲剧，其历史教训，是多方面的，深刻地警示后人，勿重蹈覆辙。改革失败的教训是，他固然惩治腐败，但未持之以恒；而更重要的是，在反对别人腐败的同时，自己却也在腐败。

张居正在改革的后期，几乎把全部精力用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是赋税制度史上划时代的变革。而在廉政肃贪、惩治腐败方面，并未持之以恒，一抓到底。对赋税改革的先驱、刚正不阿、与贪官污吏势不两立的海瑞，张居正反而觉得他过激，始终不予起用。《明史·海瑞传》说：“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

荐,卒不召。”而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自己不但行贿,也受贿。大宦官冯保是他的政治盟友、靠山,所谓“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明史》第305《冯保传》)。冯保贪财好货,张居正让其子张简修送到冯保家中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十万两,“其他珍玩尤多”(佚名:《冰山天水录》附录《籍没张居正数》)。需要指出的是,张居正在做官前,家中不过有田数十亩,家中余粮甚少,遑论金银;他当了内阁首辅后,虽是一品官,月俸也不过八十七石米,即使将他一辈子的官俸加在一起,至多不过折银两万余两。显然,他送给冯保那么多的金银财宝从何而来,是不言而喻的。而冯保后来垮台的主要罪状之一,便是贪污,说他家中所藏,抵得上天下贡赋一年收入,也确实在他家抄出金银百余万两,大量奇珍异宝。张居正依靠冯保这样的贪赃枉法者作为自己改革的政治盟友,无疑是授反改革的保守、顽固势力以把柄,成为他们打击改革派、扼杀改革事业的突破口。万历皇帝在没收了冯保的财产后,怀疑张居正也有大量财宝,“益心艳之”,这也是抄张居正家的重要原因。令人失望的是,从张居正家虽未抄出如万历皇帝想像的甚至超过冯保的巨额家产,但毕竟也有大量财富,折价约金银19.58万两,另有良田八万余顷。这决不是张居正的区区薪俸所能置办的,若非贪污受贿,怎能有如此家底!张居正的这种腐败行为,不但给自己抹黑,更重要的是给改革事业抹黑。很难设想,一个自身腐败的改革家能够把改革事业进行到底。

明朝前期的经济改革家夏原吉说过一句发人深思的话:“君子不以冥冥堕行”(《明史》卷149)。改革家更不应当稀里糊涂地自行堕落、腐败,从而被顽固、腐朽的政治势力,像“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要看为官清不清,就看宦囊轻不轻。同样是改革家的北宋范仲淹,位居要津后,若无宾客登门,吃饭仅有一种荤菜,妻儿的衣食,仅能基本自足(《宋史》卷314本传),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原则,不是仅仅用以教育别人的,自身就是个“吾道一以贯之”的忠实实行者。北宋的另一位大改革家王安石,生活更是十分俭朴,穿着普通服装,吃着家常便饭,衣服脏了不洗,脸有污垢未净,他都无所谓(《宋史》卷327本传)。守旧派攻击他是所谓“伪”,但休想捞到一根王安石贪污腐化的稻草。前述改革家夏原吉也曾蒙冤入狱,被抄家,但“自赐钞外,惟布衣瓦器。”(《明史》卷149本传)他们的高风亮节,永远是后世效法的楷模。

## 走出轮回

《中国反贪史》一书各章的末尾,都有一节“反贪启示录”,总结王朝灭亡的原因,反贪的经验教训。如秦汉:“秦汉大帝国,作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走向成熟的开端,无论是辉煌的事功和灿烂的文化,还是繁荣发达的社会经济,都达到了一个后代王朝长期难以企及的高度……然而,贪污腐败的问题就像帝国的孪生姊妹一样始终随着帝国的行程。尽管秦汉帝国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对反贪和澄清吏治进行了较大的努力,也曾取得了相当成就,但却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腐败的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吏治崩溃和政权瓦解的悲剧。”如魏晋南北朝:“一个政权的吏治清明与否关系到它的兴衰存亡……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再次证明了这一真理。”隋唐、两宋、元、明、清,虽然灭亡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但是贪污腐败,如蚁啮柱,久而久之,柱朽如渣,华屋遂轰然倒塌。“王朝初年狠抓反贪斗争→王朝中叶后反贪斗争渐渐有名无实→王朝末年贪污腐败猖獗,民不聊生,王朝灭亡→新王朝初年狠抓反贪斗争→王朝中叶后……”成了走不出的轮回。这样的周期率,正是历代王朝兴亡周期率的主要表现形式。今天,我们已进入21世纪,总结历代反贪斗争的成败得失,把反对贪污腐败的斗争进行到底,走出轮回,这是炎黄子孙的神圣使命。历史的警钟在长鸣!

(《中国反贪史》上下册,70万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王春瑜主编)

# 曹操焚书及其它

□ 李文林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建安五年春，即曹操、袁绍官渡相拒的第二年春，“绍众大溃，绍及谭弃军走，渡河。追之不及，尽收其辎重珍宝……（曹操）得许下及军中书，皆焚之。”小说《三国演义》中写的与这里记载的完全一样，说明历史上真有其事，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又把它再现于荧屏，给人的印象就更强烈了。

这里所写的是一些身在曹营或都城许昌的人，却与兴兵讨曹的袁绍暗通书信。实在说，这些人不是叛徒、内奸，至少也是些脚踏两只船的人。官渡之战，袁绍败北，他们的书信落到了曹操手里。按照常理，清查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曹操连哪些人写了信也不屑问一声，但令“付之一炬”。这“一炬”，不知保全了多少人的性命，保护了多少人才，或者说，赢得了多少人心！

想当年，多少人被“引蛇出洞”，说了一些错话（其实有的是逆耳忠言，或是对本单位领导的正确意见），于是被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政治上判了死刑；多少人由于屁大的一点历史问题，交待了无数次，调查了十几年；多少人因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影响了升学或就业；至于到了“文革”时期，更是帽子棍子满天飞，到处都搞逼供信，“黑材料”堆得比山高，许许多多的老革命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折磨致死，株连九族

……

看来，还是曹孟德高明。他对那些与袁绍暗通书信的人没有采取装袋子查处的下策，没有成立什么“肃反委员会”或“除奸办公室”。当有的人建议，把那些写密信的人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的时候，曹慨然自语道：“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他以情恕人，很理解那些与袁绍暗通书信的人的心态。试问，这一着与那“得而收杀之”或立案追查的招数相比，孰优孰劣？

不念旧恶，能容乃大。凡事向前看，不多纠缠既往，曹操就是这样一个气度恢宏的政治家、军事家，无怪乎他能吸引了那么多人才。连为袁绍写了讨曹檄文、骂过他祖宗的陈琳也能容得下，还有什么容不下呢？

曹操焚书的故事，知之者颇众，其原因当然是靠了罗贯中那部脍炙人口的《三国演义》。其实，这类以焚书而安定人心的故事，并不自曹操始，曹之前已有之。

《后汉书·光武纪》载：更始2年5月，刘秀攻下了邯郸，“诛王朗，收文书，得吏人与朗交往毁谤书数千章。光武不省，会诸将军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照此看来，曹操焚书很可能是效法刘秀的。但我们也不敢说刘秀是焚书的首创者，更不能说曹操之后就再没有焚书的事

了。

《资治通鉴》(卷288)载,五代时的郭威于乾祐二年(949年)攻克河中后,反复无常的李守贞自焚而死,“威阅守贞文书,得朝廷权臣及藩镇与守贞交通书,词意悖逆,欲奏之,秘书郎榆次王溥谏曰:‘魑魅乘夜争出,得日自消,愿一切焚之,以安反侧。’威从之。”看来郭威也是一个虚心听取建议并具慧眼的英才,如胡三省所评:“此岂一时倔强武人之所能及哉!”(见《资治通鉴》胡三省批注)

《明通鉴》(卷49)又载,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王守仁擒获了叛乱的宁王朱宸濠,“得濠簿籍,所记平日馈送姓名,遍于中外,多者累数万,少亦以千计……王守仁以簿籍连及者众,令焚之。”这一焚,又不知保护了多少人!

最有意思的是南朝刘宋时萧道成烧名片的故事。元徽二年(474)五月,桂阳王刘休范在浔阳叛乱,时任右卫将军的萧道成出兵至新亭平叛。萧设计杀死了刘休范,然叛军一时尚不知此事,故继续冲破官军防线,往都城建康进军,加之宫中有人造出了桂阳王已攻取新亭的谣言,更使市民惶惑不安。此时,许多投机者作了错误的判断,以为天下很快就是刘休范的了,便纷纷跑到新亭营垒,匆匆递上自己的名片,按《资治通鉴》(卷133)所记,“诣垒投刺者以千数”。谁知这帮人弄巧成拙,竟把名片投到了官军萧道成的营垒,风风火火表演了一场滑稽剧。值此混乱时刻,洞悉人心的萧道成当机立断,烧毁名片,登上城楼,安抚那伙“投刺者”说:“刘休范父子昨天已被我杀死,尸首埋在南岗下,我是萧平南(萧出守新亭时,加平南将军衔,故自称萧平南——笔者),不是刘休范……你们的名片我全都烧了,诸位尽管放心,不要有任何顾虑……”,给他们吃了定心丸,总算没有出现骚乱。

从刘秀到曹操,从曹操到萧道成,再到郭威、王守仁,世虽相远,其谋略却若合符节,此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惟其如此,才不屑于追究那些书信、簿籍、名刺等等东西,而把它们一烧了之。这一烧,究竟烧掉了什么,烧出了什么,则是那鼠肚鸡肠睚眦必报之辈想象不到的。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廉颇“失势

时,故客尽去;乃复为将,客又复来。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这位食客的话也实在够赤裸裸的,够不知廉耻的了,他非但毫不掩饰自己趋炎附势,反复无常的丑行,还振振有词地发表了一通“天下以市道交”的“宏论”,果如其论,世间还有什么真理、正义可言?天下还有什么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位食客的话,还是值得人们深思,应该引起人们重视的,因为“以市道交”者代不乏人,或者说大有人在,食客也罢,上述那些写密信、送厚礼、投名刺的人也罢,就说明了这一点。谄练这种世态人心,面对这种现实,能够泰然自若,才称得上是一个气度恢宏的政治家。刘秀、曹操等人的过人处也就在这里,而廉颇老将就有点差了。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复杂的。谁想到,连军阀吴佩孚还有一段焚书的故事呢。那是吴佩孚与张学良、阎锡山联合攻打冯玉祥的1926年,吴的将领靳云鹏正当节节胜利的时候,突然停战不前。原来靳受了冯的利诱,企图脱离吴而自领直系,而靳的几个部将也怀着得到地盘各霸一方的美梦,故亦竭力怂恿之。吴侦知这一情况后,采用其秘书长的计策,在保定软禁了靳云鹏。靳一被软禁,其部将便纷纷与吴写信,揭发靳的勾结反叛阴谋,以洗刷自己,诿过靳云鹏。面对雪片似的揭密信件,吴的秘书长成竹在胸,他召集全体官佐,传达吴的旨意说:“此次事变,大帅认为其责任不尽在有关各将领。主要的原因,是他远在汉口,北方情形复杂,又有人加以诱惑,才几乎铸成大错。现在已经矫正,靳总指挥亦正在反省,前事再不提了,希望大家安心工作。所有收到的揭发文件,大帅令悉数焚毁。”随即把那些揭密信件当场烧掉(见《山西文史资料》第二辑所载梁航标写的《阎锡山联合张冯倒曹吴和联吴倒冯》一文)。吴佩孚其人,历史早有定论,但古人不以人废言,我们也不应因人而否定其某些谋略。这位吴大帅在危急之际接受高参的建议,借鉴古人的经验,安定军心,挽救了一场危局,也不失为高明的一着。

(责任编辑 吴思)

# 胡均鹤与情报委员会

编辑同志：

《炎黄春秋》今年第一期发表的《胡均鹤在谍报漩涡中浮沉》一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这个人物从追求革命到背叛革命最后回归革命道路的曲折历程。其中提到：1949年初，他以国民党特务的身份主动寻找中共关系，表示愿意为革命效力以赎过去之历史罪恶；中共保卫部门本着既定政策对他的弃暗投明行动表示欢迎，将他作为工作关系，带他进上海参与肃反工作。这样做无疑是恰当的和必要的，既有利于肃反工作的开展，又有利于分化瓦解敌特力量，也有利于对胡本人的考察与改造。当时，还有一些投诚和自首登记的原国民党特务人员，领导上也是这样对待和使用的。

但在胡均鹤进上海后的安排与使用上却出现了问题与波折。为了加强肃反工作，公安局成立了一个“情报委员会”，调集一批保卫干部，担负侦察情报等重要机密任务。胡均鹤被任命为这个情报委员会的副主任，这显然是不恰当的。1951年，中

央公安部主要负责人到上海发现这事，认为“内外不分”，“用人不当”，向华东局主要领导人作了通报。其后，主要负责人、公安局副局长杨帆同志受到了严肃批评。胡均鹤和其他类似的几个人被调离，情报委员会也随之撤销。

对上述问题的批评处置，当时人们的认识是一致的，都认为是严重的工作失误。杨帆同志也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经过1952年公安部的一次会议，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结束。不幸的是，事隔三年多，“高岗饶漱石事件”发生后，这个问题被随意夸大，无限上纲，把原是一般的工作失误硬说成是“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特务分子”的“反革命罪行”。对当事人作了错误处理，从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了敌我界限。现在实事求是地回顾这一历史事件，当初批评与处理情报委员会的问题，包括对情报委员会有关人员的适当处置，并无不当，不应该否定。

以上是对《胡均鹤在谍报漩涡中浮沉》一文的一点补充，妥否，请知情者指正。

马林 2000.5.7

## 来信摘登

△徐光耀同志满怀激情和痛楚撰写的《昨夜西风凋碧树——忆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见今年第四期、第五期），生动叙述了他在整风反右派运动中的坎坷经历，发人深省，令人感叹。为了悲惨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我们要共同努力，奋发向上，建设富强、民主、繁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华。

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路9号 王纲

△贵刊今年第四期刊出《“法国通”李风白》一文，读后始知我国文化界还有这么一位多才多艺，对中外文化交流做出颇多贡献的专家（还应包括他夫人戴妮丝女士），作为读者，除感谢作者蒋国经同志外，特敬祝李风白夫妇健康长寿。

令人遗憾的是，文章把李风白的生年搞错了。据我推断，他出生于1930年，应是1903年之误。应予更正。

我是贵刊一位老订户，多年阅读使我眼界开阔，收益匪浅。但屡见文字上的错讹，令人遗憾。望作者、编者、校对共同努力，把差错压到最低限度。

读者 高景川

## 本刊更正

本刊第3期《毛泽东号召“进京赶考”回眸》一文，29页右栏18行“长达39年”应为“长达59年”。

第5期《宋希濂谈瞿秋白被俘就义内情》一文，作者应是汪东林。

谨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炎黄春秋》是纪实性综合月刊。面向现实，纵观历史，着眼国内，兼及海外，对古今中外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在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本刊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重大革命事件的经历者；有的是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对国内外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



# 炎 黄 春 秋

爱国团结 弘扬中华文化

求实存真 秉笔直书今古大事

**您**若错过了邮局2000年期刊的征订日期，欲订《炎黄春秋》杂志，请直接向本刊发行部办理订阅手续。没有时间限制，不另收邮费。

《炎黄春秋》每月4日出版，16开本，内文80页，60克双胶纸；彩封，157克铜版纸。每期售价4.80元人民币。

## 欢迎订购《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及近年合订本



**为**满足广大读者要求，本刊编辑部组织力量，从1995年以前45期的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了一套五卷本《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各卷分别为：《历史谜案揭秘》、《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名流写真》、《血荐轩辕》。

全套116.10元。另加书价的10%的挂号邮寄费，欲购请直接汇款。

(因存书不多，恕不拆套分卷出售)

**请**

购1996年至1999年合订本

1996年合订本：

简装：49元； 精装：52元

1997年合订本：

简装：49元； 精装：54元

1998年合订本：

简装：51元； 精装：56元

1999年合订本：

简装：51元； 精装：56元

(一律挂号邮寄，不另加邮费)

《炎黄春秋》发行部地址：

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电话：(010) 64072452 邮编：100007

#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文革”中胡风不肯揭发周扬**  
**国民党南运故宫国宝追记**

**难忘越剧大师尹桂芳**

**清末民初“五路财神”梁士诒**  
**读《中国反贪史》三叹**

ISSN 1003-1170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581/K 邮发代号：82-307 定价：4.80元